

南 華 大 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蔡東杰 博士

東亞權力平衡結構發展之研究



研究生：許 群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

# 南 華 大 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

##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東亞權力平衡結構發展之研究

研究生：孫 君 華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_\_\_\_\_

孫君華  
蔡智政  
蔡東星

指導教授：蔡東星

系主任(所長)：張子淵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25 日

## 摘 要

鑑於東亞區域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以及權力政治對於東亞局勢的宰制力不減反增，本文擬藉由對東亞權力政治的研究，尤其主要以權力平衡理論為研究途徑，並且以戰略三角理論充實上述研究途徑之內涵，期望將東亞甚至是國際社會未來的政治經濟發展可能走向，作一邏輯性的分析和預測。本文主要舉出三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戰略三角結構，分別是「美國－日本－中國」所組成之戰略三角結構、「日本－中國－東協」所組成之戰略三角結構、「中國－印度－俄羅斯」所組成之戰略三角結構，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上述三個戰略三角結構將依序成為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主要形態，東亞權力平衡結構發展最主要的動因是中國經濟和軍事的崛起以及美國霸權的衰退，在上述情勢持續發展下，「美國－日本－中國」－「日本－中國－東協」－「中國－印度－俄羅斯」的複合架構將成為東亞區域權力政治結構最有可能的發展軌跡，但除此之外，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是否可能恢復、在區域整合運動下制度化的「多邊安全機制」是否可能建立(尤其是在日本具有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實力和企圖的情況下)，亦是未來東亞權力政治結構不無可能的發展方向。

關鍵字：東亞、東亞區域、權力平衡、權力平衡理論、戰略三角、戰略三角理論、權力轉移、雁行模式、陸權、海權、中國崛起

# 目 錄

##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6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9

## 第二章 相關理論探討 13

第一節 權力平衡理論 13

第二節 戰略三角理論 21

## 第三章 「美國—日本—中國」三角結構 27

第一節 美日關係：主從關係下的各取所需 27

第二節 美中關係：霸權與權力轉移 34

第三節 日中關係：東亞霸權競賽的發展 42

## 第四章 「日本—中國—東協」三角結構 55

第一節 雁行模式與東亞經濟發展 55

第二節 日本與東協關係：雁行模式的具體實踐 58

第三節 中國與東協關係：威脅抑或機會 65

## 第五章 「中國－印度－俄羅斯」三角結構 77

第一節 中印關係：大國外交與睦鄰外交的實踐 77

第二節 中俄關係：形成抗美同盟關係 85

第三節 俄印關係：印度靈活外交的主導 93

## 第六章 結論 99

參考書目 105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分爲三個小節，第一節爲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爲研究途徑與方法，第三節爲研究範圍與限制。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國前國務卿 Henry Kissinger 早在 2004 年便於其所撰寫的文章中提到：「…當今的熱門話題（指伊拉克及其引發的爭議）與同時代的其他國際巨變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世界事務的重心正向太平洋轉移，幾乎所有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成員都在調整自己的角色」<sup>1</sup>。儘管現今東亞區域整合前景和中國崛起發展仍然充滿著相當多的不確定性，但無庸置疑的是，許多人們已經隱隱約約地感受到，世界權力的重心有漸漸從西方轉移到東方的趨勢，因此東亞區域研究當然也就愈來愈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事實上，東亞在二次大戰之後即持續在經濟發展上面有一枝獨秀的表現。首先，戰後儼然已經成爲一片廢墟的日本，在 Douglas MacArthur 將軍一手建立起來的政經制度底下，歷經了一連串徹頭徹尾的改革，很快於 1950 年代中期恢復了戰前的經濟水準<sup>2</sup>。1980 年代，日本的經濟成長達到高峰，其 GNP 在當時占世界一成以上、科技發展位於全球尖端、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sup>3</sup>。亞洲四小龍在 1980 年代繼日本之後興起，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新興經濟體（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NIEs）所創造出來的經

---

<sup>1</sup> Henry Kissinger, "The Global Order in Flux", *Washington Post*, 9 July 2004.

<sup>2</sup> 張啟雄，〈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歷史月刊》，第 190 期（2003），頁 61。

<sup>3</sup> 同前註，頁 65。

濟奇蹟為世界上其它第三世界國家豎立了標竿，證明發展落後的國家的確可以因為自身的努力而有機會擠身開發國家之林。東南亞各國在亞洲金融風暴前也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大量的外資湧入雖然造就了東南亞活絡的經濟，但是也促成了無可挽回的亞洲金融危機。「後起之秀」的中國在鄧小平 1992 年南巡之後，開始真正積極地融入國際社會<sup>4</sup>，本世紀初，中國藉由廉價土地和廉價勞動力等優良之生產要素吸引大量外資；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可以從其在 2004 年一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引進「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最多的國家可以見得<sup>5</sup>，該年中國吸收的外資金額達到 600 億美元<sup>6</sup>。資本和技術的引進使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也因此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美名。東亞在經濟發展上優異的表現，理所當然使其日益成為世人注目的焦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東亞經濟快速發展，和冷戰後東亞區域整合的相對遲緩<sup>7</sup>，皆無法單純以經濟角度切入即可以得到完整的解釋，國際政治因素或許可以為此不足之處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即使今日全球化現象和國際關係研究中新自由制度主義大行其道，欲瞭解東亞或預測東亞未來的發展，還是不能忽略對於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探討。

台灣的經濟發展成就一度讓國人深深地引以為傲，探究台灣經濟奇蹟產生的原因，可以發現其中有並非偶然的時空條件。金寶瑜在其所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一書中，對於台灣和南韓的經濟能夠在二次戰後快

---

<sup>4</sup> 中國雖在 1978 年即開始「改革開放」，但是直至鄧小平 1992 年「南巡」時喊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口號之後，反改革的左派勢力遭到遏止，經濟改革的腳步才真正邁開。

<sup>5</sup> 可參考聯合國貿易暨發展委員會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 出版之《2004 年世界投資報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

<sup>6</sup> 參考《中國統計年鑑》。

<sup>7</sup>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頁 10。

速發展，有國際政治經濟學角度的深刻解析；他認為：「…在美蘇冷戰時期中，台灣和南韓在美國全球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策略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們受到美國各方面的支持，而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只有在美國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實現。…在一般的情況下，一個經濟發展落後國家的貿易逆差只有兩個辦法可以解決，一個辦法就是盡量減少進口和增加出口，另一個辦法就是資本進口，…美援使得台灣和南韓不必從外面借外債，因此不會因為利息的負擔而妨礙了發展，這是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情況很不相同的地方。…到了七〇年代末當國際大環境開始轉變時，台灣和南韓的發展就遇到困難，不再能繼續沿著過去十幾年的發展方式，到了八〇年代它們的出口和經濟成長速度都慢了下來…。」<sup>8</sup>依據金寶瑜教授的說法，台灣和南韓所以能在經濟上有過人的成就，就國際層次而言，政治因素其實相較於經濟因素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如果全然由自由的市場機制來決定國家是否能成功地發展經濟，則台灣和南韓就未必能夠有機會脫穎而出。即使是現在，由於國際政治情勢已經和冷戰時期大不相同，台灣和南韓也無法複製過去的經濟發展模式再次創造經濟發展的奇蹟。

于宗先在歸納東亞經濟高速成長的原因時也有和上述類似的看法，其認為：「…在這種條件下，要發展經濟，必須依賴國際市場…恰逢國際市場開放，保護色彩不濃，競爭不激烈，所以出口貿易很順利…」<sup>9</sup>。事實上美國的「刻意包容」和台灣或南韓的經濟發展奇跡的確無法脫離關係，美國不僅提供資金給台灣和南韓，更重要的是，美國提供其龐大的國內市場，讓台灣和南韓的產業有成長的空間和機會<sup>10</sup>。

---

<sup>8</sup> 金寶瑜，《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頁 129-134。

<sup>9</sup> 于宗先，〈東亞經濟奇蹟會成為歷史陳跡？〉，《東吳經濟商學學報》，第 23 期（1998），頁 1。

<sup>10</sup> 蔡宏政教授在課堂上曾提及，東亞各國在冷戰區架底下的前緣地位致使其得以在美國的寬厚對待之下發展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政策，美國樂於提供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給這些東亞國家，藉此換得該區域的穩定與支持，東亞國家也因此在此短時間內，藉由特定的國際環境和自

至於蔡東杰教授則在其著作中提到：「儘管東亞部分國家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創造了快速發展的經濟成就，但其政治領袖們在區域主義發展方面卻似乎相對沉默…」<sup>11</sup>、「例如 Gilbert Rozman 甚至以『發育不良的區域主義』(stunted regionalism)來形容東北亞地區的狀況…」<sup>12</sup>、「…儘管相較於世界上的其他區域，特別是歐洲與美洲，在整合過程方面都已紛紛獲致明顯進展，而東亞卻依舊停留在『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倡議階段當中…」<sup>13</sup>，大體來說，東亞的區域整合發展確實相較於北美和西歐有遲緩的現象，不僅如此，未來東亞的區域整合是否能夠加快腳步，亦無法被樂觀的看待<sup>14</sup>。東亞區域整合發展遲緩最重要的原因，在區域外部因素方面，是美國不會坐視其位於東亞的政經利益在整合過程中逐漸消失，在區域內部因素方面，則是東北亞大國關係的不睦。

早於 1990 年，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 (Mahathir) 即曾經有過成立「東亞經濟會議」(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 的構想，其認為東亞國家應該組成以東亞國家為主要成員的區域性組織。此一倡議在當時雖然獲得大部分東南亞國家的迴響，但卻受阻於美國的反對和日本的保留，理由是此一組織的形成可能造成貿易壁壘，防礙經濟全球化的發展<sup>15</sup>。立意良善的 EAEC 在美國的壓力下當然無疾而終，和 EAEC 具有相同性質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 直到十五年後才成立。

---

身的努力，快速地達到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目標。

<sup>11</sup> 蔡東杰，〈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13 期 (2006)，頁 14。

<sup>12</sup> 蔡東杰，〈東北亞安全問題與區域治理機制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19 期 (2007)，頁 17。

<sup>13</sup>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頁 10。

<sup>14</sup> 蔡東杰，〈NAFTA 與亞太整合進程的互動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 17 期 (2002)，頁 30。

<sup>15</sup> 陳鴻瑜，〈2005 年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1 期 (2006)，頁 5。

根據蔡東杰的看法：「…東亞相較於其它區域具有更複雜的權力平衡內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東亞依然沒有從權力平衡的思維過渡到集體安全甚或是全球化（以個人為出發點之理想主義）思維之明確方向。即使「…William Hyland 等人主張『根基於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正讓位給以人權思想為主的理想主義』…<sup>16</sup>」，就現今的東亞國際情勢而言，似乎看不到現實主義有逐漸讓位給理想主義的跡象。東亞的大國關係在 1998 年北韓進行飛彈試射後朝向衝突面發展，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軍事競爭和政治衝突日益白熱化，日本追求國家正常化與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相互給予對方不小的壓力，這樣的情況頗有濃厚「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 的味道，日中兩個東北亞大國結構性的相互交惡關係，當然也影響了東亞的區域整合發展。

2005 年甫成立的東亞高峰會是東亞區域整合發展具有象徵性的一個里程碑，有趣的是，關於高峰會的研究和討論一覽無遺地突顯出美國因素和日中關係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羈絆。例如吳玲君在〈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多邊區域合作〉一文中提及：「雖然東亞高峰會受到各方重視，但是此一峰會未來的發展可能不會如預期般順利，主要的原因是組織鬆散、政治角力意味濃厚；…在政治角力上，東亞區域一向有中日兩國爭奪主導權的現象，東亞高峰會之前，雙方的雜音已出現<sup>17</sup>」；陳鴻瑜在〈2005 年東亞峰會評析〉一文中也提及：「美國對於東亞高峰會之倡議題出警告，擔心此一組織會變成以中國為核心的經濟集團…<sup>18</sup>」、「美國沒有參加東亞高峰會，引起各界關切；…但美國仍密切關注東亞高峰會的發展<sup>19</sup>」。確實，如

---

<sup>16</sup> 蔡東杰，〈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頁 9。

<sup>17</sup> 吳玲君，〈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多邊區域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144。

<sup>18</sup> 陳鴻瑜，〈2005 年東亞峰會評析〉，頁 5。

<sup>19</sup> 同前註，頁 10。

果要歸納出東亞區域整合發展的負面因素，大國間的政治角力將無可避免地被提出來成爲討論的焦點。

總而言之，鑑於東亞區域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以及權力政治對於東亞局勢的宰制力不減反增，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即是希望在東亞權力政治的研究中，窺見東亞甚至是國際社會未來政治經濟發展的走向。

##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可以用來研究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理論甚多，幾乎所有以現實主義爲基礎的國際關係理論都可以用來研究東亞權力政治結構，有趣的地方在於，不同的理論可以呈現出東亞權力政治結構不同的面向。例如蔡東杰分別以〈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和〈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兩篇文章分析東亞的權力政治結構，前者所採取的是權力平衡的角度，後者所採取的則是權力轉移理論的觀點，權力平衡是立基於現實主義觀念的國際關係理論，權力轉移理論則和現實主義的基本假設不盡相同<sup>20</sup>。兩篇文章是同一位學者以不同的研究途徑針對相同的議題提出看法，顯然地，兩篇文章所呈現出來的內容並不全然一致。

在〈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一文中，蔡教授以權力平衡作爲研究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途徑，並且以戰略三角充實權力平衡研究途徑的內涵，歸結出東亞正在進行的權力政治互動或隱然浮現的權力政治結構。蔡教授認爲：「…核子嚇阻傾向於提升國家在進行外交決策時的理性

---

<sup>20</sup> 陳欣之，〈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2期（2006），頁115。

程度，而全球化浪潮則在形塑互賴關係之餘，也推動了更多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因此這兩個變數可說既大大增強了三角結構的穩定性，也讓所謂新安全觀有機會與當前的國際結構接軌…儘管前述一連串新觀念的提出與討論，可說既反映出當前全球局勢的新變化，也指出一條未來國際關係發展的可能道路，但卻未必是個全然屬於進行式的政治現實…。在無政府狀態的假定前題下進行權力競爭，仍是當前國家處理彼此間關係的行為準則，至於所謂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則是多數國家所希望維繫的狀態；…我們雖然利用了現實主義中的權力平衡概念，但並不代表全然接受過去對此概念的傳統定義…由於當前國際關係比起以往的特殊性（國際非戰概念、核子嚇阻與全球互賴現象的存在），不僅讓人們得以避過『安全困境』的噩夢糾纏，也使中小國家獲得一定程度的參與空間。…隨著『中國崛起』態勢的日漸明顯，各個運作中的三角結構也隱然圍繞著中國而形成某種『複合結構』，從而使其運作內涵因彼此牽引而愈發複雜。…就短期（5-10年內）而言，美國（或美日同盟）仍將是主導東亞區域安全與穩定的最重要力量；但若是就中期（10-20年內）發展來看，在霸權衰退與區域化運動制約下，美國在此地區的影響力勢必將逐漸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以『中日爭霸』為主要戲碼的政經發展；最後，從長期看來，假如印度持續穩定發展的話（特別是屆時其人口數量可能超越中國，而成為全球最大國家），一來或許有機會以平衡者或調停者角色介入東亞體系，再者它也可能選擇與中國或日本結盟而改寫此區域的權力結構。至於由中小國家組成的東協既很難扮演關鍵角，而重心實際上不可能跨越烏山的俄國，則或者終究必須選擇成為單純的歐洲國家…<sup>21</sup>」。

至於在〈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一文中，蔡教授則以權

---

<sup>21</sup> 蔡東杰，〈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13期（2006），頁1-20。

力轉移理論作為研究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途徑，從歷史面著手，呈現和預測過去、現在、未來東亞的霸權更迭變化。蔡教授認為：「…在國際政治史上，所謂『強權』（great power）或『霸權』（hegemony）國家的存在儘管是相當普遍且自然的；…除了權力差距所彰顯的『相對客觀性』外，所謂霸權國家還須以實際行動，在『絕對主觀性』方面補足定義要求；事實上也唯有在這雙重條件均符合的情況下，進一步討論霸權結構變遷才是有意義的…大致來說，所謂『霸權結構』指的通常是某種呈現金字塔型的權力分配模型…在歐洲國家挾工業革命實力再度東來之前，時值清代中葉的中國無疑居於東亞地區的霸主地位；…英國霸權時期的來臨，既終結了長期以來由東亞國家自己來擔任區域霸權角色的時代，同時也暗示全球化浪潮對此地區所可能帶來的重大影響；…日本的擴張思想不僅融合民族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競爭的基本概念，同時還自我覆蓋了一層濃厚的道德色彩，亦即他們在亞洲大陸的擴張非但旨在協助日本與其週邊國家掙脫西方政經制度的桎梏，並且在更深的層次上希望能恢復天人間的和諧關係。…隨著美國決定全面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述局面同時扭轉，至於東亞也再度被區域外力量拉進全球化浪潮當中。…中國不僅擁有挑戰美國霸權的客觀條件，甚至也有著準備加入競爭的主觀積極作為…<sup>22</sup>」。當然，東亞的區域結構變遷未必如現實主義者所預料般充滿火藥味。無論全球利益等普世主義價值將取代國家利益的角色，在理性選擇的自利主導下，國家也應該會更傾向於透過制度化的途徑來解決紛爭。至於這是否將是東亞國家的最終選項，則有賴於我們做更進一步的觀察。<sup>23</sup>

當然，除了權力平衡和權力轉移理論的角度之外，還有很多的研究途徑可以研究東亞的權力政治結構。例如蔡明彥教授在〈東亞安全秩序建

---

<sup>22</sup> 蔡東杰，〈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2005），頁103-15。

<sup>23</sup> 同前註，頁120-121

構：霸權穩定、權力平衡與多邊機制的思辯〉一文中，也另外以霸權穩定和多邊機制的途徑為東亞的權力政治結構提供了若干解釋<sup>24</sup>。本文在研究途徑的選擇上，和蔡東杰教授的〈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一文相同，即是以權力平衡作為研究東亞權力政治結構的途徑，並且以戰略三角理論來構築權力平衡研究途徑的內涵。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以「文獻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為主。以相關理論對於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及時之國際關係第一手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最終融會貫通而具有脈絡地將文章堆砌而出。在作法上，筆者首先訂出文章的題目和架構，然後初步判斷為文時所需的資料，並進行資料收集的工作，待資料收集完成後開始閱讀並理出心得，在為文的同時隨著文章的走向進行上述工作的修正，直至文章完成為止。本文希望能以先前學者所著相關文章之深知卓見為基礎，跟隨著前人的腳步，在時局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中，整理和延伸出東亞地區國際政治局勢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走向，期待能在巨人的肩膀上，於時間和空間上擁有至高點，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小小的貢獻，也為東亞區域在此一時間點上的權力平衡結構發展，作一個完整而詳實的釐清。

###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文的研究範圍在時間上並不作特定的劃分，在地域上則限於東亞地區。要說明的是，由於不同的角度對於東亞範圍的界定可能不盡相同，所以在作研究之前，本文必須先明確界定東亞的範圍。

---

<sup>24</sup> 蔡明彥，〈東亞安全秩序建構：霸權穩定、權力平衡與多邊機制的思辯〉，《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頁1。

根據蔡東杰對於東亞範圍的界定，東亞在地理位置上指的應是東北亞五個政治實體，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北韓、台灣；中南半島上五個國家，包括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東印度群島六個國家，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汶萊、東帝汶等十六個政治實體所涵蓋的區域，基於權力政治層面上的思考，美國、俄羅斯、蒙古、澳洲、紐西蘭、印度等對東亞有潛在政治影響力或位於東亞周邊位置的國家即使並不真正位於東亞，亦應該被視為東亞國家而納入討論<sup>25</sup>。

本文在研究限制方面主要有二。一是無法在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研究途徑上有更進一步深入討論；二是無法在「霸權穩定論」的觀點上有更多著墨。

承襲自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新自由制度主義<sup>26</sup>，相較於現實主義更重視國際關係中除了民族國家之外的其它行為者；更加重視國際關係中的互賴關係<sup>27</sup>。在全球化盛行的今日，或許以新自由制度主義解釋國際社會的各種現象，應該可以得到更加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是本文依然選擇以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來探究東亞的國際關係走向。這是由於就實際層面而言，國際關係終究有其現實面的考量，以強調軟權力（soft power）著稱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師 Joseph S. Nye 在其著作不忘提醒美國不能完全放棄硬權力（hard power）的使用，足見在處理國際關係的事務上，現實主義依舊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sup>28</sup>，何況，承如前述，權力政治就東亞的國際關係而言

---

<sup>25</sup>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頁 5。

<sup>26</sup>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3），頁 82。

<sup>27</sup> 同前註，頁 21

<sup>28</sup> Joseph S. Nye, Jr. 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台北：左岸文化，2003）。

具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就國際關係研究的角度而言，儘管以權力思維作為核心價值的現實主義隨著國際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受到愈來愈多的質疑和批判，但是對於為數頗多的國際關係研究者而言，其依然是一套相當具有說服力與解釋力的概念<sup>29</sup>。

東亞作為一個區域長期以來由單一霸權領導的特色頗為鮮明。戰後美國無疑是東亞唯一霸主；後冷戰時期「一超多強」國際格局下美國依然擁有東亞的領導地位；未來是否由中國擔負起東亞的區域霸權角色在現今看來似乎不無可能，因此，學者們在研究東亞的權力結構時，霸權穩定的觀點成為一個相當適切之研究途徑。要說明的是，儘管霸權穩定論提出的初衷是呈現「全球」政治經濟活動之真貌，但是一般而言，學者們相信，以霸權穩定論來解釋「區域」的政治經濟活動亦應該有其適用性。由於霸權穩定論對於東亞研究具有相當的適切性，本文不以霸權穩定論而以權力平衡理論為途徑來研究東亞的權力結構，即成為本文另外一個主要的研究限制。

本文另一個在研究上面的限制，即是必須承認，傾向負面而沒有彈性的權力政治解釋，是本文在對現實情形作論述的過程中，所難以避免會造成的缺憾。

---

<sup>29</sup> 蔡東杰，〈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頁 17。

## 第二章 相關理論探討

### 第一節 權力平衡理論

1648 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Treaty of Westphalia) 奠定了現今國際社會的基本形貌，根據和約中「主權獨立」的原則，各個國家皆對外具有自由獨立之國家存在本質，並對內擁有至高無上之統治力量<sup>30</sup>。在主權國家的原則確立之後，對於他國意圖不明所產生的疑慮，以及國際之間的無政府狀態 (anarchy) 使各國爲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不得不競奪權力，征戰不斷的結果，十七世紀歐洲各國開始以「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的概念來追求無政府狀態底下的和平與穩定<sup>31</sup>。

國際關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爲一門獨立學科，草創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受到理想主義 (idealism) 的影響甚鉅，美國總統 Wilson 在戰後所提出的「十四點和平計畫」(Peace Program of Fourteen Points) 充滿規範的色彩，被認爲是當時國際關係理想主義的代表<sup>32</sup>。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證明了以理想主義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有其盲點，事實的發展重創了理想主義在國際關係學科中的地位，現實主義 (realism) 學派在此時抬頭，以另外一種角度重新詮釋國際互動<sup>33</sup>，從此奠定其在國際關係學科當中的主流地位。

---

<sup>30</sup>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 3-4。

<sup>31</sup> 林碧炤，〈論權力平衡〉，《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 (1991)，頁 3；十七世紀「強國當道與小國配合」的局面成爲國際社會維繫秩序的最佳選擇，是在「主權最高」而國家間彼此不能管轄的情況下，尋求平衡的唯一選擇。

<sup>32</sup> 張亞中主編，前引書，頁 11。

<sup>33</sup> 同前註，頁 13。

所謂權力平衡理論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一般性理論，在談此一理論之前，不能不先瞭解國際關係學科中的現實主義概念<sup>34</sup>。現實主義承襲自 Thucydides、Machiavelli、Thomas Hobbes 等西方哲人的思想<sup>35</sup>，相較於自由主義，現實主義對人性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但並非人性本惡）。《波羅奔尼撒戰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的作者 Thucydides 在西元前五世紀時曾經說過：「我們所作所為究竟是對是錯，都必須從權力觀點來加以論斷，因為強者能作他們想作的事，而弱者只能默默承受結果。…在如此危險的環境中，是無法獲取公正與榮譽的」<sup>36</sup>。其在當時似乎已經體認到權力與公平正義在現實世界中的不協調關係。Machiavelli 在 1513 年撰著《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將現實主義的見解發揮得淋漓盡致；他認為在現實的世界裡，好人並不是成功與否的判準，重點是統治者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堅強的鬥爭力，才能確保社會安定與國家安全<sup>37</sup>。而 Thomas Hobbes 於 1651 年所著的《巨靈》(Leviathan)亦是政治哲學名著，其以利己主義與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入手，認為自然狀態是「人人為戰，且人人為敵」的狀態，最弱小的行為者，也有殺死最強大的行為者之能力。霍氏對於自然狀態的假設來自於其對人性的三個認知：競爭（資源有限）、缺乏自信（攻擊為最佳之防禦手段）、追求榮耀（虛榮心）<sup>38</sup>。

傳統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Hans J. Morgenthau，其所著的《國家間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影響現實主義相當深遠的一本名著，Morgenthau 曾提出現實主義的六項原則，分

---

<sup>34</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復興崗學報》，第 78 期（2003），頁 108。

<sup>35</sup>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0），頁 39-42。

<sup>36</sup> 同前註，頁 39-40。

<sup>37</sup> 同前註，頁 40。

<sup>38</sup>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頁 64。

別是：

- (1) 如同一般社會，政治由植根於人性的客觀規律所支配。
- (2) 協助政治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範疇中找到其方向的主要標的是利益的概念，又可以界定為權力。
- (3) 現實主義並不是固定或一成不變地將利益的主要概念定義成權力。
- (4) 一般的道德原則不能適用於國家的行動。
- (5) 政治現實主義反對將個別國家的道德標準變成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原則。
- (6) 政治現實主義堅持政治領域的自主性<sup>39</sup>。

Morgenthau 認為，「協助政治現實主義在國際政治間找到其出路的主要觀點是利益的概念，並以權力一詞界定」<sup>40</sup>；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的為何，「權力永遠是其直接目的」<sup>41</sup>。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Kenneth N. Waltz，其進一步地將結構的概念引入到國際關係的領域之中。有別於古典現實主義的觀點，Waltz 認為國家在國際無政府的狀態之中並非追求權力的極大化，生存是國家最優先的考量，權力僅是生存目的之手段<sup>42</sup>。儘管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理論不盡相同，絕大部分的現實主義者對於國際政治的本質，還是具有一些共同的核心信念：

- (1) 國家是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行為者。
- (2) 無政府狀態為國際生活顯著的特徵。
- (3) 假定國家尋求權力或安全的極大化。
- (4) 假定國家在追求權力或安全的過程中通常會採取或多或少的理

---

<sup>39</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頁 109。

<sup>40</sup> 同前註，頁 108-109。

<sup>41</sup> 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頁 66。

<sup>42</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頁 108-111。

性決策。

(5) 基本上同意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會依靠威脅或使用武力以確保他們的目標。

(6) 相信國際系統的面貌，特別是國家間權力的分配，是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基本模式的最重要原因<sup>43</sup>。

要說明的是，現實主義者並不重視以國家間的合作來達到生存的目的，這是由於「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的誘因甚於「絕對利益」(absolute gains)，國際合作固然對各國皆有利，但競爭壓力和合作獲益的不對稱性削弱了國家對於國際合作的興趣。冷戰之後，國際環境的改變使現實主義遭到很大的挑戰，全球化、經濟互賴、國家解構等新現象一再考驗現實主義對當今國際情勢的適用性，但是就如同 Robert Gilpin 所認為，世界經濟的全球化與多國合作角色的增加並無損於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首要地位，國家依然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行為者<sup>44</sup>。

權力平衡很早就出現在人類的歷中當中，希臘時期，雅典和斯巴達領導各邦相互抗衡的局面，被認為可以看見權力平衡的影子<sup>45</sup>。1300年到1494年的義大利半島出現了具有國際政治意義的權力平衡，威尼斯和米蘭拉攏拿不勒斯、佛羅倫斯等城市相互競爭。1600年之後，「權力平衡」一詞開始出現在歐洲國家的外交文件當中，成為國家政策的描述及外交人員的溝通工具，十七世紀「強國當道與小國配合」的局面被認為是當時國際間維持秩序的方法，此一方法不是最佳的選擇，而是唯一的選擇。直至十九

---

<sup>43</sup> 同前註，頁 110。

<sup>44</sup> 同前註，頁 111。

<sup>45</sup> 林碧炤，〈論權力平衡〉，頁 2；Thucydides 所著之「波羅奔尼撒戰史」對於雅典各邦的競爭情況有精彩的描述。

世紀，權力平衡持續是政治人物維持國際和平所奉行不悖的準則<sup>46</sup>。

權力平衡的意義甚多，很多學者皆提出過此一看法。Inis L. Claude, Jr. 曾言：「權力平衡的問題不在於它不具任何意義，而在於它擁有過多的意義」，Ernst B. Haas 認為權力平衡造成的誤解太多，主要原因是它的概念內涵沒有得到適當的澄清，林碧炤認為人們常對權力平衡產生誤解，是由於權力平衡作為一項政策、現象、解釋各有其不同的內涵<sup>47</sup>。

國際關係學者們在定義權力平衡時，往往會因為切入角度之不同而有截然不同的定義。例如林碧炤便從法律、歷史、政治三個研究途徑來探討權力平衡的概念：

首先，在法律的觀點上，Hedley Bull 認為在世界政府沒有出現前，權力平衡是維持國際秩序的必要存在，畢竟國際社會需要維持秩序，沒有秩序，國家就沒有活動的空間，其它的目標就無法達成。其次，在歷史的觀點上，F. H. Hinsley 認為權力平衡是歐洲的歷史產物，有其理想主義的思想淵源，既是國家互動的自然結果，也有在國際之間朝向規則化發展之趨勢，後者的說明和 Bull 的觀察有雷同之處。Hinsley 認為權力平衡具有下列特質：

- (1) 權力平衡是歐洲在國家呈現多元化的自然演變結果。
- (2) 對秩序的渴望和動亂的恐懼使權力平衡被普遍接受。
- (3) 權力平衡隨著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武器性質而有所改變，但是國家對於權力平衡也愈敏感和愈注意。

至於 Edward V. Gulick 對於權力平衡的解釋，則著重於十九世紀的歐

---

<sup>46</sup> 林碧炤，〈論權力平衡〉，頁 3；以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平衡一直是十九世紀政治人物維持國際和平的準則，具有相當大的指導力量。

<sup>47</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頁 111-112。

洲外交史，其認為權力平衡存在的最關鍵條件是體系中具有共同認知、追求共同目標、使用共同手段。歐洲外交所呈現出的妥協、彈性、多元、理性評估等特質，是權力平衡得以發展的基礎。

第三，在政治的觀點上，國家被認為有追求權力的本性，只要各國力量相當，對於維護秩序有共同瞭解，權力平衡即會出現。在 Haas 的思維脈絡下，權力平衡包含四個主要範圍：

- (1) 一般性的描述，即溝通的媒介，有時具有指令性的意涵。
- (2) 一種制度或體系，權力平衡制度由會議外交演變而來，未來的發展是聯合國；權力平衡體系指的是具有平衡作用的國家活動空間，權力平衡體系與國際政治並存。
- (3) 一種意識型態或對外宣傳，是決策者的信念，決策者會因此合理化某些政策。
- (4) 一種分析國際關係的概念工具<sup>48</sup>。

謝奕旭認為：「權力平衡是一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在追逐權力的互動過程，而此一過程是尚未發生戰爭與衝突前的狀態」<sup>49</sup>。應該可以充份表達出權力平衡的政治面向。從政治的觀點看待權力平衡，可以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面向。主觀的權力平衡是盡量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權力不平衡，客觀的權力平衡則是國際社會追求均勢的現象。Morton Kaplan 認為權力平衡具有幾項基本規則：

- (1) 各個成員可以各自增強本身的力量，但是盡量爭取以談判而非軍事手段解決衝突，但是亦不會排除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 (2) 戰爭的結果不應該致使某一個成員遭到消滅。
- (3) 抑制超國家組織的倡導或出現，堅決反對任何集團或單一國家取得支配的地位。

---

<sup>48</sup> 林碧炤，〈論權力平衡〉，頁 7-11。

<sup>49</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頁 134。

(4) 成員應隨時組成同盟來反制任何取得優勢或支配地位的企圖。

(5) 寧願戰爭也不會放棄增強力量的機會<sup>50</sup>。

Kaplan 所認為的權力平衡是一種信念和政策手段，應該是偏向主觀的權力平衡。如同 Nicholas Spykman 所言：「若與敵人的力量相等就沒有安全可言，只有比敵人稍微強一些才有安全。如果一個國家的力量被其它國家的力量完全抵銷，就沒有行動的可能性，只有在能夠自由運用相對多出來的那一份力量時，國家才有機會做出充滿自信的對外政策」。可見主觀的權力平衡並不真正追求權力平衡。現實主義大師 Morgenthau 認為，「權力平衡是由若干自治武力組成之系統內的穩定，當均勢受到外在武力或組成系統之一個或其它份子的擾亂而產生改變時，系統會傾向於重新建立原始的均勢或新的均勢」，Morgenthau 將權力平衡視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狀態或機制，其所認知的權力平衡應該就是偏向客觀的權力平衡。權力平衡存在某些缺點，Morgenthau 曾經歸結出權力平衡的缺失，在於：

(1) 不確定性—沒有完全可以信賴的方式來測量既存的權力。

(2) 不真實性—國家領導者追求優越以補償自身的不安全感，國家並不追求平衡。

(3) 不恰當性—國際體系的穩定與信心並不來自於均勢，知識和道德亦會影響國家的行為<sup>51</sup>。

的確，權力本身原本即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概念，權力難以有明確的估算和衡量，學者們對於權力的看法往往也不盡相同。平衡的概念亦同於權力，平衡也同樣被認為是無法形容與測量的<sup>52</sup>。權力平衡因此具有不明確的特性。權力平衡的另一項缺點是無法考慮到國家內部的需求，國家的行為當然不會全然是外在環境的反射，國家行為的產生除了考慮國際環境

---

<sup>50</sup> 謝奕旭，〈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頁 114。

<sup>51</sup> 同前註，頁 127。

<sup>52</sup> 同前註，頁 130。

的因素之外，也必須要考慮到國內的需求。在第三世界國家，國家的需求和領導人的需求往往有較大的重疊性，在民主國家，國家的需求則和民意的需求較為符合<sup>53</sup>。再者，國家也並非都會採取自助或結盟的方式來面對威脅，國家也可能採取其它的方式或選擇不予理會來因應威脅<sup>54</sup>。除此之外，無法預測事件發生的時間，亦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權力平衡先天上無法克服的限制<sup>55</sup>。最後，如果持權力平衡的概念來處理國際事務，難以避免「安全困境」的產生，權力平衡思維下所產生的行動，不但無助於化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緊張，反而助長了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抗。

權力平衡的面向相當多，將權力平衡視為理論時，則其解釋的是國際政治中國家競逐權力的某些現象，要說明的是，並不是所有國家競逐權力的現象都適用於權力平衡理論。理論不可能是十全十美，因此也不可能對現象進行完整的解釋。權力平衡理論猶如其它社會科學的理論一般，當我們在用其解釋國際關係現象時，並沒有好與壞或對與錯的問題，有的只是適用與不適用的問題。通常理論經過時空的轉換，以往樹立的典範不一定全然適用，尚須不停的經過修正，方能使理論更趨完善、更具解釋力與說服力。蘇聯的瓦解亦不能斷定權力平衡理論已經失去預測的效用，要探討的是蘇聯崩潰的原因是否與現實主義的假設與前題發生矛盾之處。上個世紀末，中國隨著經濟的成長不斷擴充其軍備、美國在追求與中國進行「合作」(engagement)之餘，尚且不忘對其「圍堵」(containment)<sup>56</sup>，而日本邁

---

<sup>53</sup> 同前註，頁 123、129、131-132；Waltz 主張：「國家與政治家的行為是不確定的」，權力平衡解釋的是國際關係的結果，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外交政策；權力平衡理論無法說明理性的決策過程是如何產生的，即國家如何採取自制的措施，不會無限上綱、漫無目的的發展軍備和挑起戰端

<sup>54</sup> 同前註，頁 131；實力較為弱小的國家更有可能採取其它方式而非以尋求自助的方式來面對威脅。

<sup>55</sup> 同前註，頁 123；華滋認為，現實主義的理論比較能夠說明什麼事將會發生，較不能說明什麼事將在什麼時候發生。

<sup>56</sup> 美國的對華政策由「圍合」(conengagement) 漸漸走向「圍堵」(containment)，美國將中國設定

向「正常國家」的腳步，似乎也因為不自主的因素而顯得日益急迫<sup>57</sup>，這些均顯示出今日以權力平衡理論分析東亞的情勢，依舊有其無可取代的解釋力。

## 第二節 戰略三角理論

「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是冷戰時期國際關係學者們用來檢視美國、蘇聯、中國三方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架構，以「戰略三角」來分析美國、蘇聯、中國在互動過程中的政策產出，可以使學者們在當時得到一些方便的結論。Lowell Dittmer 是首先將「戰略三角」加以理論化的西方研究者<sup>58</sup>，其以「賽局」(game)的概念引入「戰略三角」之中，使「戰略三角」跳脫出政策的層面，進一步具有理論層面的價值和內涵。

Dittmer 認為「戰略三角」依據三方相互間友善(Amity)或敵對(Enmity)的關係，可以分成「三邊家族」(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Romantic)、「結婚」(Marriage)、「單位否決」(Unit-veto)等四種類型，三邊家族型代表三方均維持正面友善的關係、羅曼蒂克型代表主要的一方(pivot player)與另外兩方(two wings)維持友善的關係，與主要的一方維持友好之另外兩方則呈現相互敵對的關係、結婚型是兩方維持友好的關係，並與第三方交惡、單位否決型則是三方交惡的局面<sup>59</sup>。在 Dittmer 所列舉的四種三角類型當中，三方均處於敵對的單位否決型只是一種邏輯上的推理，並不會在事

---

為「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並非是對中國釋出善意的表現，反而是以更高的層次(由美國制約中國轉成世界制約中國)來約束中國的行為。

<sup>57</sup> 國際社會希望日本能夠承擔更多的責任，不僅僅只是金錢的支出；中國的日益崛起及中日關係的結構性衝突使日本不得不充實自身的軍事實力。

<sup>58</sup> 蔡東杰，〈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 13 期（2006），頁 5。

<sup>59</sup>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台北：時英出版社，2002），頁 24。

實上存在。四種類型中普遍存在的是結婚型和羅曼蒂克型，Dittmer 認為前者較後者穩定，因為後者主要的一方並不容易維持其樞紐的地位（pivot position）。Dittmer 的「戰略三角理論」事實上並不是一套嚴謹或相當具有解釋力的理論，一來在其所舉出的四種類型中，單位否決型和三邊家族型並不真正適合以三角關係解釋，二來有些事實存在的三角關係也無法明確的歸類於四種類型中之任何一種，例如美、蘇、中在 1969-1971 年時處於轉變時期的互動過程，三者則是理論並無法說明國家對外政策改變的原因，例如 1949 年中、蘇共同對抗美國的「結婚型」戰略三角，為何在往後的 1969 年之後會演變成爲蘇聯尋求和美、中同時發展關係的「羅曼蒂克型」戰略三角？<sup>60</sup>由於 Dittmer 的「戰略三角理論」並不充份和完善，國內學者在其後對於「戰略三角理論」有一些更進一步的補充和延伸。

吳玉山認為，在「戰略三角」中，任何兩個行爲者之間關係的影響因素，可以分成「內部因素」(endogenous factors)與「外部分素」(exogenous factors)兩個部分，「內部因素」指的是雙方在安全、經濟、意識型態等方面相互作用之影響，「外部因素」則指的是雙方個自和第三者之間關係之影響。吳玉山以正(+)負(-)號表示三邊相互間之關係，將「戰略三角」區分爲「三邊爲正」、「二正一負」、「二負一正」、「三邊爲負」等類型<sup>61</sup>。在吳教授的分類中，「正號」即等同於狄氏之「友好」、「負號」即等同於於狄氏之「敵對」、「三邊爲正」等於「三邊家族」、「二正一負」等於「羅曼蒂克」、「二負一正」等於「結婚」、「三邊爲負」則等於「單位否決」。吳教授亦依「戰略三角」中任一方的所在位置，分別定義出樞紐(pivot)、朋友(friend)、夥伴(partner)、側翼(wing)、敵人(foe)、孤雛(outcast)等角色，並將角色按照優越程度排序爲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主

---

<sup>60</sup> 同前註，頁 26

<sup>61</sup>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9)，頁 341。

張戰略三角中除了「樞紐」外的任何一方必然會有追求「提升角色」的動機<sup>62</sup>。

羅致政以社會心理學中的「結構平衡理論」(Structural Balance Theory)來分析美國在兩岸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以此進一步地闡釋了「戰略三角理論」。羅教授和吳玉山教授相同以正號代表友好關係，以負號代表敵對關係，並以「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的結構平衡要求，說明在三角結構中，擁有偶數個負號時，表示結構平衡而穩定，擁有奇數個負號時，則表示結構不平衡與不穩定。根據羅教授的論點，其認為雙方由對抗轉為友好可能會在兩種情況下發生，一是在雙方面臨共同敵人時，另一種則是在雙方共同爭取第三者之友誼時。美國在研究中即是扮演兩岸共同敵人或共同朋友的角色。羅教授的研究有一個前題，即結構平衡者必須有夠強的國力，才能夠真正成為平衡者的角色，也就是說，美國必須持續其和中國的相對優勢，才能夠積極扮演兩岸關係中結構平衡者的角色，如此使得羅教授的研究有了不盡完善之處<sup>63</sup>。

包宗和亦對「戰略三角」有深入的研究，其認為「戰略三角」之三方有互動的規則存在，這些規則即是：

- (1) 三方基本上處於既合作又對抗之情形。
- (2) 己方利於與他方合作，不利於他方對抗。另外兩方之合作與對抗會間接造成己方的受損或受益。
- (3) 另外兩方中之一方若對另一方的影響力與支配力變大，則強勢一方將日益壯大，最終成為不利於己方的二元對抗局面。

---

<sup>62</sup> 同前註，頁 341。

<sup>63</sup>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頁 33。

包教授結合吳玉山教授之研究，借用吳教授對於「戰略三角」中各個角色的定義，即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以效益計算方式，計算出上述角色的效益。效益計算方式如下：

(1) 三方中任何兩方的友善關係以「+1」分表示，敵對關係則以「-1」分表示。

(2) 三方中任何一方之效益等於己方與另外兩方雙邊效益之加總，減去另外兩方之雙邊效益。

包教授以此計算方式，得出「戰略三角」中各個角色之效益，樞紐位置的效益是+3、朋友位置的效益是+1、夥伴位置的效益是+1、側翼位置的效益是-1、敵人位置的效益是-1、孤雛位置的效益則是-3。依據角色效益的大小，我們即可以得知角色的優劣順序，即：「樞紐>朋友、夥伴>側翼、敵人>孤雛」。

在「戰略三角」中，任何一方如欲提升己方的角色，則可以改變任何一雙邊效益的方式，來達成改善自身處境的目的。例如孤雛只要改變任何一雙邊效益，就可以進階成爲敵人或側翼。以此類推，孤雛若要提升自身的角色成爲夥伴或朋友，則要改變二個雙邊效益，孤雛若要成爲樞紐，則必須同時改變三個雙邊效益。另外，在「戰略三角」中，當某兩方之力量差距過於懸殊時，另一方則有可能作出對自身最有利但卻違反上述規則的選擇<sup>64</sup>。包教授將「戰略三角」中之三方關係以量化的方式呈現，使得理論有了更爲明確的架構<sup>65</sup>。

國內學者對於「戰略三角」的研究，基本上還是以 Dittmer 的模式爲基礎來加以延伸，並且在結論上也有相當的一致性，例如包宗和教授之研

---

<sup>64</sup>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342-347。

<sup>65</sup> 吳東林，。《巨變中的強權戰略》，頁 34。

究似乎可以視為是吳玉山教授之研究的量化解釋，又例如包宗和教授認為兩翼角色會朝向朋友角色方向發展，亦和羅致政教授的「結構平衡理論」有相互呼應之處。學者們在「戰略三角」的研究上有高度的相似性，或許是因為他們都持有相同的一套邏輯，只是在解釋時有個人的獨到見解之處罷了。學者吳東林認為，上述三位學者只將研究的範圍限制在個別國家的角色和對外政策的分析上，難免會有遺漏和缺失之處，在國際政治現象的解釋上，也會產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疑慮<sup>66</sup>。吳東林應該是希望「戰略三角理論」可以有更高的視角，對於國際關係的現象亦可以有更加完備的解釋力，本文以戰略三角理論分析東亞的權力平衡結構，應該算是呼應了吳東林的期許。

---

<sup>66</sup> 同前註，頁 34。

### 第三章 「美國—日本—中國」三角結構

#### 第一節 美日關係：主從關係下的各取所需

美國和日本的外交素來即有和強者結盟的特色<sup>67</sup>，歷史上美日關係的分分合合由此而產生有趣的觀察視角，世紀之交中國崛起使得美日關係再起變化，由近期美國和日本的外交文件中可以窺見美日關係的走向。

日本自 1853 年被美國以「炮艦外交」打開關閉自守的門戶之後，隨即放下身段，全盤接收西方文化。初踏入西方世界的日本在當時並未選擇以美國為國家發展的模仿標竿，而是朝向海洋霸權英國看齊。明治維新之後，日本開始與英國同進同出，英國的海軍強大，日本的海軍力量也跟著強大。1894 年，「帝國海軍」於甲午戰爭中出乎眾人意料地重挫「北洋艦隊」，日本自此稱霸東亞。1902 年，英國和日本進一步結成英日同盟，日本的國際地位因此大大提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為避免遭到英日同盟的夾擊，藉由「華盛頓條約」的簽定巧妙以英、美、法、日四國同盟取代英日同盟，美國在表面上佯稱四國同盟，實際上則是孤立日本，英美交好的結果使日本轉而選擇和陸地強權德國增進關係，日本陸軍日益強大，取代海軍原本在國內的地位。1940 年，日本和德國、義大利締結軍事同盟。1941 年，美國和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交手<sup>68</sup>。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美國推上自由世界的霸主寶座，日本淪為戰敗國，國際地位跌入谷底，經濟亦瀕於絕境<sup>69</sup>。美日關係卻在戰後翻轉，由敵對轉向結盟。

---

<sup>67</sup> 周學佑，〈後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發展新趨勢〉，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研究報告（2006），頁 10。

<sup>68</sup> 陳維斌，〈誰是戰爭加害者？戰後六十年美日之間的葛藤〉，《當代》，第 218 期（2005），頁 35-39。

<sup>69</sup> 齊康，〈從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看美日關係的演變〉，《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62 期（2000），頁 58。

美國對戰後日本的經濟復興政策，成爲美國推行全球冷戰戰略的必然結果<sup>70</sup>。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對於迅速擴展的共產勢力日益感到束手無策。1947年，曾任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代辦的 George F. Kennan 以匿名「X」於《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發表一篇名爲「蘇維埃行爲的根源」的文章，建議美國以「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 將蘇聯限制在既有的勢力範圍內。Truman 政府從善如流，美國於 1947 年 3 月拋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對共產勢力進行圍堵封鎖，施行冷戰政策<sup>71</sup>。

美國自 1945 年 8 月開始軍事占領日本，在 Douglas MacArthur 統治初期，日本經濟的振興由於美國的刻意限制進行得並不順利，直到 1948 年左右，日本經濟依舊停留於戰爭破壞和混亂之中。國際形勢在 1947-48 年出現轉折，中國大陸的赤化以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日趨高漲，迫使美國因爲全球戰略所需，不得不更改對日政策，由控制轉向扶植日本，希望藉著重振日本經濟以使遠東地區能有一個堅實的反共堡壘<sup>72</sup>。韓戰爆發後，美國更加確定日本在東亞圍堵蘇聯擴張政策中的戰略地位及重要性。美國擔心戰事擴大及共產主義擴張，甚至要求日本重新武裝以擔負日本自身的防衛工作<sup>73</sup>。1951 年，美日雙方在「舊金山和約」簽字後五個小時於美軍第六司令部簽定「美日安保條約」(Security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sup>74</sup>。1952 年，日本依舊金山和約之規定獨立<sup>75</sup>。美日

---

<sup>70</sup> 鄧峰，〈美國對日本經濟復興政策的演變〉，《美國研究》，第 2 期 (2002)，頁 47。

<sup>71</sup> 佟鐵林，〈冷戰後美日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第 3 期 (2002)，頁 50。

<sup>72</sup> 齊康，〈從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看美日關係的演變〉，頁 59。

<sup>73</sup>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 (2002)，頁 18。

<sup>74</sup> 同前註，頁 24。

<sup>75</sup> 陳維斌，〈誰是戰爭加害者？戰後六十年美日之間的葛藤〉，頁 40。

安保條約成爲日後美國結束軍事占領日本和確保在東亞軍事部署以圍堵蘇聯的安排<sup>76</sup>。

日本在戰後初期安於美國的統治，在冷戰格局形成後則更遵循「吉田原則」(Yoshida doctrine)，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全力發展經濟。依據「盟軍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s)的規劃，日本在戰後推動非軍事化、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其後一連串措施包括解散日本軍隊、廢除政教合一、鼓勵組織工會政黨、解散財閥、農地改革...等<sup>77</sup>，「非戰憲法」的制定，更使得日本喪失對外交戰的權利。吉田原則是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爲日本所設立的安全戰略架構，吉田原則主張戰後日本與美國發展密切軍事安全關係符合日本利益。在發展經貿爲重心的吉田原則下，日本安全政策層面主要有兩項措失：(1)與美國建立美日安保體系，提供美軍基地作爲防衛日本與東亞區域的前進軍事部署。(2)建立自衛隊，作爲協助日本本土防衛的自衛武力。吉田強調振興日本經濟，安全則追隨美國腳步<sup>78</sup>。

美日同盟雖然讓美國最終完成其全球冷戰戰略，讓日本成功發展成經濟強國，但是冷戰時期的美日關係並非毫無扞格。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修正成爲「美日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Japan)，美日關係自此開始呈現政治上依賴經濟上競爭的局面<sup>79</sup>。1971年，Henry Kissinger在美國未知會日本的情況下密訪中國大陸，對日本造成本當大的震撼<sup>80</sup>，此次事件突顯日本在外交上的被動具有風險。1980年代初期，日本強盛的經濟

---

<sup>76</sup>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頁 25。

<sup>77</sup> 張啟雄，〈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歷史月刊》，2003 年 11 月，頁 61。

<sup>78</sup>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頁 16-18。

<sup>79</sup> 齊康，〈從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看美日關係的演變〉，頁 60。

<sup>80</sup> 張啟雄，〈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頁 64。

力達到頂峰，美日之間的「貿易大戰」一觸即發。1980年代中後期至1990年代，由於冷戰格局的鬆動和崩解，美日關係進入「同盟漂流」時期，經濟上的競爭削弱了政治上結盟的意義。冷戰後的美日關係可說是第二次戰後的美日關係之延續和發展<sup>81</sup>。中國在世紀末的崛起使美日關係面臨根本性變化的挑戰。美日同盟於1994年開始有「再定義」的問題<sup>82</sup>。1995年2月，美國國防部提出俗稱「奈伊報告」(Nye Initiative)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報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EASR)，明確指出美國的亞太政策將作出重大的修正，美國不再以日本經濟上的挑戰作為美國的主要威脅，而將焦點置於中國的軍備擴充上<sup>83</sup>。1996年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Japan-U.S.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 Alliance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和1997年的「美日安保防禦新指針」(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不但重新定義美日同盟關係，亦使得美日兩國再度建立起緊密的安全合作關係。

從美國和日本近期公佈的一些國防和外交之官方文件中，可以窺見美日關係因應中國崛起而產生的變化。例如2000年的「阿米塔吉報告」(INSS Special Repo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由於大部分撰文者在報告發表之後隨即進入Bush政府當中任職而受到重視<sup>84</sup>。該份報告對於亞太安全形勢和日本的作用皆予以重新定義<sup>85</sup>：「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完備軍力，並且是民主陣營中的一員，日本依然是美國和亞洲聯繫的基石。美日同盟是美國全球安全戰略的

---

<sup>81</sup> 佟鐵林，〈冷戰後美日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頁50。

<sup>82</sup> 蕭新煌、李明峻，〈變動的東亞與台灣因應策略〉，《亞太研究論壇》，第28期(2005)，頁280。

<sup>83</sup>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2)，頁85。

<sup>84</sup> 廖竹慧，2007年，〈從「阿米塔吉報告」觀察美國對亞洲政策之演變〉，頁1。

<sup>85</sup> 孫承，〈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與美日同盟〉，《國際問題研究》，第2期(2005)，頁44。

核心…；美國和日本同時在亞洲面臨著不確定的安全環境-就美國而言，有新的領導地位問題，就日本而言，有政治、經濟、社會的變遷問題。同時中國和俄羅斯在政治、經濟上的不確定性、朝鮮半島問題、預期將被延宕的印尼問題，皆是美國和日本共同的挑戰，…美國和英國的特殊關係可以是同盟的借鑑。…新世紀之初，無法抵抗的全球化力量和後冷戰時期亞洲的安全機制是美國和日本複雜而新生的挑戰，兩個國家如何回應，是獨自面對亦或是共同面對，將同如過去一般顯著地影響新世紀亞太地區的安全和穩定」。顯然，美國在新世紀之初依然認為日本是其和東亞能夠維繫的基石，美日同盟關係也依然是美國全球安全策略的核心，美國和日本在充滿不確定的亞洲安全環境中有各自必須面對的問題，美國期許日本能夠更加獨立自主，並且能夠扮演「東方不列顛」(Britain of the East)的角色，在全球化和後冷戰格局的新世紀之初，美日兩國對於新環境的因應如何抉擇，將一如以往地對亞太的政治、經濟、安全環境具有一定影響。

2006 年美國國防部的「中國軍力報告」(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顯示出美國對於中國崛起的肯定和期待：「中國快速崛起成為區域政治和經濟強權並且懷有全球性的抱負是今日戰略環境中的重要因素；一個對區域或全球而言具有顯著性的多重意涵。美國歡迎一個和平並且繁榮的中國。美國的政策是鼓勵中國對健康和成功的全球體系負起更大的責任，並且成為一個盡職的國際利益關係參與者，如此中國亦可以從中獲得巨大的利益<sup>86</sup>」，「…中國經濟快速成長伴隨著軍事擴張，已經促使中國成為一個全球策略日益增長的區域強權。然而，中國的發展路徑和未來仍然充滿著不確定性。如同布希總統在 2006 年國家安全戰略中所稱，美國『試圖鼓勵中國為其人民採取對的策略選擇，並且防備其它的可

---

<sup>86</sup> Se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6*, 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Executive Summary.

能』這個策略並不是美國所獨有；其它區域行爲者亦是如此，理所當然地防備不確定性的因素」。美國雖然對於中國崛起持正面的態度，但是美國亦點出中國在崛起的同時應該負更起更多的責任，並且作出正確的策略選擇，減少不確定性的因素。

2006 年的「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QDR) 中，美國直指中國是所有正在浮現的強權中，最具潛力的軍事競爭者，大量投資於軍事而意圖不明，東亞區域的軍力平衡結構因此已經置於險境：「…作爲一個主要的新興強權，中國有最大的潛力與美國作軍事競爭，並且有足以抗衡美國傳統軍力優勢和破壞美國各種戰略的軍事科技」、「中國持續大量投資於軍事，尤其在戰略收集和境外投射能力改善方面…刻意掩飾中國在安全方面的各個面向。外界對中國的動機和決策或不對稱地投資於其軍事現代化的作爲所知甚少…」、「中國軍事增長的速度已經將區域軍事平衡置於險境」<sup>87</sup>。

無獨有偶，日本近期的「防衛白皮書」(Defense of Japan White Paper) 和「外交藍皮書」(Diplomatic Blue Book) 對中國崛起所採取的立場和美國幾乎相同，2006 年的防衛白皮書中提到：「…尤其近年來，中國在貿易價值上已經有實質的增加，也因爲大量吸納外資而達到戲劇性的經濟成長。中國已經在世界經濟上有其地位並且現今很多國家皆希望和中國建立更深一層的經貿及互利關係，…在軍事方面，中國穩定成長而成爲亞太地區過人的政治經濟強權。其軍事發展走向成爲區域內其它國家所矚目的焦點」<sup>88</sup>，「…中國向來不公佈其實際的裝備情況、改革進度、部隊的人員配置、主要軍事操作和訓練，或者國防預算的細部分析」、「官方數據顯示中

---

<sup>87</sup> 同前註，頁 29。

<sup>88</sup> “Defense of Japan 2006 White Paper,”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p.40.

國的國防預算每五年增加一倍，如同前述般龐大的國防預算支出在過去的 18 年有 13 年是如此…如果中國在未來持續如同過去般以每年約 15% 的增長率增加其國防支出，其官方公佈的國防支出將明顯地於 2008 年超越日本的國防預算」<sup>89</sup>。2007 年的外交藍皮書中則提到：「東亞其它較為顯著的議題還有中國不透明的軍事現代化和國防支出增長，…日本希望中國找到和國際社會的交往之道，並且力促中國在考量到外援和其它議題的情況下，能夠持續融入於國際建制之中」<sup>90</sup>。日本顯然對中國相對不透明的軍事增長頗有微詞，亦對中國驚人的軍事增長速度感到憂心。儘管日本「歡迎」(welcome) 其加入國際社會，但是也「鼓勵」(urge) 它能夠融入國際建制之中。

誠如前述，美日兩國的外交素來即有和強者結盟的本質。二次戰前的美日關係因此呈現出處處對立的局面，二次戰後的美日同盟關係亦因此而有穩固的基礎。冷戰時期，就美國而言，復興日本是其推行全球冷戰戰略的必然結果，就日本而言，在美國的保護下全力發展經濟是其保障國際地位和維持國家發展的必然選擇。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格局丕變，中國在世紀末日益浮現成爲具有全球性抱負的區域強權，美日關係亦因此產生相應的變化。從美日兩國近期公佈的一些國防和外交相關文件中可以窺見中國崛起爲美日關係所帶來的變化。「阿米塔吉報告」接續美日同盟關係的調整，定調日本爲「東方不列顛」，美日關係因此進一步提升。而美國近期的 QDR 和中國軍力報告與日本近期的防衛白皮書和外交藍皮書對中國採取一致的口徑，一方面肯定中國崛起的事實，一方面異口同聲地對中國快速而不透明的軍事成長表示憂心，並鼓勵中國更加融入國際社會，在獲得好處的同時亦要承擔義務。顯見中國崛起爲美日關係帶來了正面影

---

<sup>89</sup> “Defense of Japan 2006 White Paper,” The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p.44.

<sup>90</sup> “Diplomatic Blue Book 2007,”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Executive Summary.

響，美日兩國選擇藉由彼此結盟以捍衛自身位於東亞的國際政治權力，而不是選擇和新興強權妥協並分享權力，美日關係依然在變動的國際情勢下達到了二次大戰後最佳的狀態<sup>91</sup>。

## 第二節 美中關係：霸權與權力轉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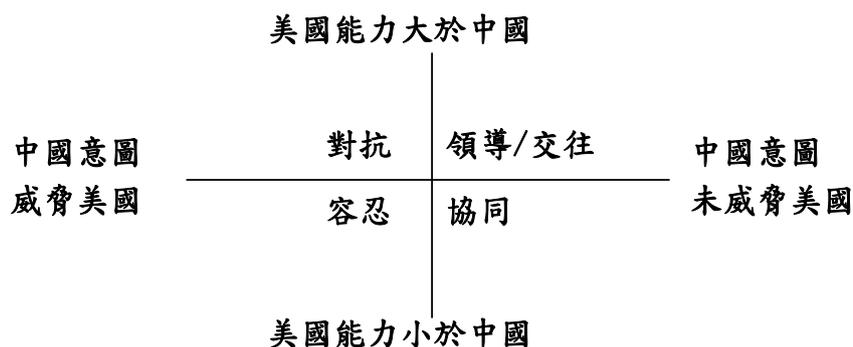
或許從美國的對華政策和最近常為學者們所提及的所謂「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可以更貼切的呈現出美中之間的關係。美國的對華政策呈現出美中之間不對稱的一面，「權力轉移理論」則解釋中國崛起下美國對於霸權興衰的疑慮。

根據 John P. Lovell 提出的戰略設計邏輯，一個國家在設計對另外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時，會對該國的「意圖」和「能力」進行評估。當 A 國強於 B 國而又與 B 國具有共識時，A 國會對 B 國採取「領導」(leadership) 或「交往」(engagement) 的互動模式；當 A 國強於 B 國而與 B 國不具有共識時，則 A 國會對 B 國採取「對抗」(confrontation) 的互動模式。相對而言，當 A 國弱於 B 國，而與 B 國具有共識時，則 A 國會對 B 國採取「協同」(concordance) 的互動模式；當 A 國弱於 B 國而又與 B 國不具有共識時，A 國則會對 B 國採取「容忍」(accommodance) 的互動模式<sup>92</sup>。

---

<sup>91</sup> 蕭新煌、李明峻，〈變動的東亞與台灣因應策略〉，頁 280。

<sup>92</sup> 蔡明彥，〈布希全球戰略中的「中國因素」：矛盾認知與雙軌戰略的形成〉，「第四屆全球戰略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 年，頁 42-43。



不論從國際政治層面的那個角度觀察，美中關係皆顯得甚為疏遠。就傳統地緣政治而言，美國和中國的領土分屬東、西，美國是海權的代表而中國是陸權的一員；就意識型態而言，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與美國與歐洲或其它亞洲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很不相同，共同利益不多，價值觀也甚為歧異<sup>93</sup>；就權力位階而言，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霸權國，是「跨坐在地球上的巨人」<sup>94</sup>，而中國儘管發展速度和潛力驚人，卻依然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sup>95</sup>。上個世紀末的「中國崛起」(Rise of China)多少觸動了美國對於「霸權興衰」的敏感神經，也使原本對立中帶有空洞的美中關係因此更加具有討論的意義。

Clinton 在 1992 年總統選舉時，曾經批評老 Bush 的對華政策是在驕縱中國，是「磕頭」與「擁抱獨裁者」的表現<sup>96</sup>。儘管初期對於中國採取「不假辭色」的態度，Clinton 政府的對華政策基本上還是以全面交往為主，美

<sup>93</sup> Richard Bernstein、Ross H. Munro 著，許綏南譯，《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頁 40。

<sup>94</sup> Joseph S. Nye, Jr. 著，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台北：左岸文化，2003)，頁 41。

<sup>95</sup>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曾在 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的演講中提到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

<sup>96</sup>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文化公司，1999)，頁 117。

中關係因此被定位為所謂「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美國對於中國採取友善的態度無非是希望藉由全面交往的方式，協助中國融入國際體系，促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具有正面意義的一份子<sup>97</sup>。就美國國內而言，柯林頓政府也希望藉著美中雙邊貿易振興國內經濟。「一個穩定、強大和繁榮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sup>98</sup>因此具有幾分真實。

小 Bush 在競選首任總統時，曾經批評過 Clinton 政府不該將美中之間定位為「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其認為美國和中國稱不上是「夥伴」關係，應該以「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來形容美中關係較為適宜<sup>99</sup>。入主白宮之後，Bush 總統一如預期對中國採取較以往強硬的立場。美國首先挑戰的即是中國最敏感的神經—台海問題。2001 年 4 月美中軍機擦撞事件發生後，美國於 4 月 24 日公佈了自 1992 年以來最大的一筆對台軍售清單，其中包括 8 艘柴油動力潛艦、4 艘紀德級(Kidd)驅逐艦和 12 架 P-3 反潛機等先進武器，總金額超過 40 億美金<sup>100</sup>。不論此筆軍售清單中武器的質量是否突破美國歷來對台軍售之慣例<sup>101</sup>，美國主動地、大動作地售予台灣在質量上均屬空前的武器成為無庸置疑的事實。Bush 本人在同時間接受美國廣播公司的訪問時也語出驚人地表示，將「不計代價」(whatever it took)地協助台灣自我防衛<sup>102</sup>。不僅如此，陳水扁總統在同年五月出訪友邦

---

<sup>97</sup> 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頁 81、83。

<sup>98</sup>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頁 117。

<sup>99</sup> 張子揚，〈中國崛起與美國反應：兼論對美中台三邊關係之影響〉，《第四屆全球戰略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頁 52。

<sup>100</sup> 冷曉玲、倪峰，〈布希上臺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當代亞太》，第 7 期（2001），頁 4-5。

<sup>101</sup> 楊仕樂、卓慧苑，〈美國小布希政府對台軍售之分析：維持兩岸軍力平衡〉，《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6 期（2003）。

<sup>102</sup> 小布希於 2001 年 4 月 25 日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的訪談，被問及台海相關問題時，曾表

時過境美國，獲得前所未有的高規格接待，不但在紐約「過境停留」三天，亦會晤了紐約市長和美國國會領袖。或許是過份刺激，美國國務卿 Colin Powell 在七月訪問北京時態度有所緩和，表示不再以「戰略競爭者」形容中國，並希望能在人權、貿易、禁止武器擴散等問題上加強和中國的對話與合作，與中國建立「建設性合作關係」(Relations of Constructive Cooperation)，避免美中關係陷入僵局。

「911 事件」發生之後，美國改變全球戰略佈局，「反恐」成爲首要重視的議題<sup>103</sup>。美國在反恐議題上需要國際社會的幫助，中國成爲美國積極爭取支持的國家之一。2001 年 10 月，Bush 和江澤民藉由 APEC 年會在上海首次會晤，小布希以「坦誠、建設性、合作」(candid, constructive and cooperative)的「3C」關係作爲美中關係未來發展方向的期許。2002 年 2 月，Bush 藉由亞洲之行訪問北京，再次確立了美中之間的「建設性合作關係」<sup>104</sup>。2002 年 10 月，Bush 對於到訪的江澤民重申美中之間的「3C」關係。2003 年 12 月，Bush 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訪美時以「外交夥伴」(partners in diplomacy)來稱呼中國<sup>105</sup>。美中關係在 Bush 第一任期末達到最佳。2004 年之後，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隨著中東戰事的底定又轉趨強硬<sup>106</sup>。

依據 Powell 的解釋，「建設性合作關係」的落實，就是「在能夠合作之處合作，在有歧見處對話，在嚴重歧見處，使對方明瞭歧見的根源，從

---

示會「不計代價」地協助台灣自衛(Whatever it took to help Taiwan defend themselves)

<sup>103</sup> 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調整〉，頁 79。

<sup>104</sup> 同前註，頁 89。

<sup>105</sup> 林文程、林正義，〈台灣修憲與台美中三角關係〉，《台灣民主季刊》，第 3 卷第 4 期（2003），頁 144。

<sup>106</sup> 李毓峰，〈從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看美中戰略競爭〉，《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3 期（2005），頁 48。

而尋求解決之道」。由此可見，美國自始至終都沒有要忽視美中之間歧見的打算。事實上，美國雖然在反恐戰爭中尋求中國的協助，但是對於人權問題、禁此武器擴散、飛彈防禦系統，甚至台灣問題上，皆沒有明顯讓步的跡象。美國國防部一直視中國為潛在的軍事威脅。Donald H. Rumsfeld 在 2002 年的對總統及國會年度報告中，暗指中國將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軍事競爭者」(Military Competitor)<sup>107</sup>。由於中國崛起的速度出乎美國的預料，小布希政府從第二任期開始，對於美中關係的處理採取愈來愈強勢的態度與作為。在美中貿易失衡問題上，美國明確而強烈地要求人民幣採取浮動匯率並且升值；在北韓核武與六方會談停擺問題上，美國對中國的不盡責表現出不耐煩的態度<sup>108</sup>。2004 年 2 月的布胡會期間，美國以高姿態回應中國的善意<sup>109</sup>，不但未給 2003 年上台後初次到訪的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最高規格的接待，亦未在此次會談中與中國取得任何實質的共識，小布希更於會後的記者會中，當著胡錦濤的面，捨棄外交禮節，直言美中雙方具有「歧見」(disagreements)<sup>110</sup>。

從近期美國國防部和國會等單位新出爐的幾份官方文件中，可窺見美國對中國不減反增的疑慮。在 2006 年 2、5 月所公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國軍力報告」中，五角大廈針對中國的軍力發展作出評估，認為中國相當有可能和美國進行軍事競爭。中國具有「軍事擴張」(Military Expansion) 的建軍本質，並隱瞞實際軍事支出的金額數字<sup>111</sup>；中國可能持

---

<sup>107</sup> 許志嘉，〈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調整〉，頁 88-90。

<sup>108</sup> 李毓峰，〈從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看美中戰略競爭〉，頁 48-49。

<sup>109</sup> 中國在布胡會前為了營造出良好氣氛，刻意作了很多會前準備，例如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在胡錦濤訪美之前先一步赴美完成了幾項採購案，總值超過 160 億美元。

<sup>110</sup> 張子揚，〈中國崛起與美國反應—兼論對美中台三邊關係之影響〉，頁 59。

<sup>111</sup> 同前註，頁 60。

續投資於高技術不對稱軍事力量，包括太空反制戰<sup>112</sup>。

歸結 Bush 政府之後的美國對華政策，可以發現美國在新世紀之初依然具有調整美中關係基調的主導權。柯林頓政府一度以「領導、交往」模式和中國互動，以「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定位美中關係，試圖藉由合作創造美中兩國的共同利益。Bush 政府對於中國整體國力快速發展深懷戒心，選擇主要以「對抗」模式和中國互動。儘管「911 事件」提供美中關係改善的空間，但是美中基調卻未有一刻改變。從 Bush 第二任期起，美中之間的蜜月期即告結束，美國又恢復到採取「疾言厲色」的態度，這明顯可以從近期美國有關對華政策的官方文件中看出。事實上，美中之間的綜合國力依然差距甚遠<sup>113</sup>，即使從軍事支出亦可以明確看出雙方實力的差距。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SIPRI）於 2006 年 6 月 12 日所公佈的報告中顯示，2005 年美國的軍費總支出約 4782 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佔全球總軍費支出的 48%，同年中國的軍費總支出排名全球第五，約 410 億美元，尚不及排名第四，軍費總支出約 421 億美元的日本<sup>114</sup>。

以權力轉移理論解釋美中關係，呈現出美國和中國之間更加對等的另一個面向。美國霸權衰退與中國崛起皆是有所根據的事實存在，因此「權力轉移理論」的焦點難以避免地落在美中關係上。

美國霸權的衰退或許並不會呈現在數據上，似乎很難以數據證明美國有任何國力衰退的跡象。多位學者為美國的衰退尋找出路和答案，Joseph S.

---

<sup>112</sup> 參考丁樹範於和平論壇中之發表；

[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2:5&webitem\\_no=1640](http://www.peaceforum.org.tw/onweb.jsp?webno=33333332:5&webitem_no=1640)

<sup>113</sup> 李毓峰，〈從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看美中戰略競爭〉，頁 55。

<sup>114</sup> 參考自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中心（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所發表的資料；[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trends.html](http://www.sipri.org/contents/milap/milex/mex_trends.html)

Nye Jr.認為「硬權力」(hard power)的過份使用是導致美國霸權陷入發展困境的原因；George Soros 認同 Nye 的看法，並進一步以「泡沫經濟」的觀點解釋霸權的傾頹；Brezinski 主張美國應該做到漸進而有秩序地失去霸權位置，並塑造一個更具有共同利益的國際社會，使超國家組織得以取代傳統的國家體系<sup>115</sup>。不論上述學者的看法如何，他們的著作皆突顯了美國霸權無以為繼的窘境。

	貿易進出口總額	GDP	外匯存底	外商直接投資 (實際利用外資)
1978 年	206.4 億美元	3624.1 億人民幣	1.67 億美元	—
1998 年	3239.5 億美元	78345.2 億人民幣	1449.6 億美元	454.63 億美元
2004 年	11545.5 億美元	136875.9 億人民幣	6099.32 億美元	606.3 億美元

相較於美國霸權的衰退，中國的崛起則更顯得有跡可尋。依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顯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各項經濟指標均有驚人表現。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迅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在 1978 年時僅有 206.4 億美元，「改革開放」二十年後，中國 1998 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已有 3239.5 億美元，2004 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突破一兆美元，達到 11545.5 億美元。就「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而言，中國在 1978 年、1998 年、2004 年分別為 3624.1 億人民幣、78345.2 億人民幣、136875.9 億人民幣，GDP 的快速增加顯示中國的經濟在三十年之中有了相當成長，與「改革開放」初期相較起來，今日中國的 GDP 增長了四十倍之多。就外匯存底而言，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外匯存底亦急遽累積，直至 2006 年 2 月，中國的外匯存底

<sup>115</sup> Zbigniew Brzezinski 著，郭希誠譯，《美國的抉擇》(台北：左岸文化，2006)，蔡東杰教授推薦序。

更已經直逼外匯存底首位的日本，達到八千五百餘億美元。不僅如此，中國目前也已經成爲美國預算赤字最大的融通國家<sup>116</sup>。

A. F. Kenneth Organski 和 Jacke Kugler 於 1980 年合著的《戰爭總帳》(War Ledger)是權力轉移理論的完整建構。1996 年，由 Kugler 主編的《均勢與戰爭》(Parity and War)中，明確指出中國終將成爲美國霸權的挑戰者。權力轉移理論因此成爲美中之間霸權更迭微妙關係的呈現。

權力轉移理論並不如同現實主義的理論一般假設國際間是無政府狀態(anarchy)，其主張國際體系的特徵是階級狀態(hierarchy)，此一階級狀態由「主宰」(Dominant Power)、「強權」(Great Powers)、「中等」(Middle Powers)、「弱小」(Small Powers)四個階級的國家所組成。換句話說，國際政治權力事實上集中於少數國家之手。由於各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發展速度並不一致，也由於各個國家對於權力分配的認知並不相同，該理論認爲，當對於現狀不滿的「挑戰者」(國力超過主宰國家 80%以上)出現時，衝突即有發生的可能。典型的情況是：強權創造並維持國際現狀，崛起強權對現狀不滿並設法改變現狀，如果防衛者與挑戰者無法協調，戰爭便有可能一觸即發。

權力轉移理論認爲，衡量國家權力大小的指標分別爲人口、經濟生產力、政治力三項因素，每一項因素會在不同的時期對權力造成影響，人口數量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人口因素對於權力的影響是長期性的；經濟成長的改變相對之下較爲快速，經濟因素對於權力的影響是中期性的；政治力可以在短時間內高度運作，政治因素可以對國家權力造成立即而明顯的影

---

<sup>116</sup> 可參考《中國統計年鑑》。

響<sup>117</sup>。在金字塔狀態的權力結構中，理論上國際衝突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階層，中小型國家間亦有可能存在著彼此對立的情勢，畢竟權力問題無所不在。基於發起對抗對於權力的需求，國際間爆發衝突的情況就有可能呈現出由下層結構逐步往上層結構遞增的趨勢<sup>118</sup>。

倪樂雄認為：「中美之間的敵意根源於兩個因素，一是意識型態的對立；二是正在崛起的強國與現存強國的對立……以往歷史表明，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只要符合上述一種，敵意和衝突就很難化解。不幸的是，這兩種勢同水火、互相誘導的對立都被中美關係所包括<sup>119</sup>」。確實，美國的單邊主義已經讓美國的領導力處於失靈邊緣，中國龐大的人口規模以及持續的經濟成長也已經大大增加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政治影響力，一旦中國崛起達到某種程度（例如中國於 2025 年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而作為防衛者的美國和作為挑戰者的中國在意識型態上無法協調，唯一的解決方法將有可能是又一場的霸權戰爭。

### 第三節 日中關係：東亞霸權競賽的發展

日中關係相較於美日關係或美中關係更為複雜，其一是日中兩國之間有糾葛難解的「歷史問題」；其二是日中之間的利益衝突因為傳統地緣政治關係顯得直接而急迫；其三則是日中關係相當程度地受到國際環境的約束和限制。

---

<sup>117</sup> 向駿主編，《2050 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台關係之迷思》（台北：博揚文化公司，2006），頁 46-55。

<sup>118</sup> 同前註，頁 246。

<sup>119</sup> 倪樂雄，〈中美衝突的本源因素及不確定性〉，《二十一世紀評論》，第 67 期（2001），頁 27。

基本上，日本和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歷史上的日中關係長期和睦而友好<sup>120</sup>。1895 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由於國家發展所需而對中國展開一連串兇殘的侵略行徑，自此兩國關係走向猜忌和怨對。

十九世紀後半葉，由於日本和中國對於「西力東漸」的局勢變化採取不同的應對措施使雙方走向不同的道路，彼此日後的交惡關係亦在此埋下伏筆。日本在受到西方文明的衝擊後順應時勢、改弦易轍，由傳統社會快速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日本是一個自然資源貧乏的島國，在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的過程中，對發展所需的基本要素包括技術、資本、天然資源、市場等均十分渴求，在自身地理環境條件無法提供上述需求的情況之下，對外擴張以從鄰國身上獲取所需即成爲日本唯一的選擇。中國當然是日本對外擴張的最好目標，中國鄰近日本、天然資源豐富、人口眾多，且又積弱不振，日本沒有理由不對中國產生覬覦之心。1894-1895 年的甲午戰爭改變了日中之間的權力關係，大戰開始之前，兩國不論從人口數量、經濟規模、國土面積、軍事實力等各方面作比較皆予人勝負難以睨料之感，但是戰爭結果卻出乎眾人意料，清帝國幾乎可以用「不堪一擊」來形容，明治維新後日本在動員和作戰方面的效率證實已經不是當時顛頑不前的中國所能比擬<sup>121</sup>。甲午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實力更加壯大，侵略中國以成就自身發展成爲對日本極爲合理的選擇。1937 年開始的日本侵華戰爭是今日日中歷史問題的癥結所在，總計在八年抗戰期間，中國軍民傷亡超過 3500 萬以上，經濟方面的損失逾 6000 億美金<sup>122</sup>，中國人民在此期間所受到的痛苦和磨難更是難以言計。

---

<sup>120</sup> 林代昭，《戰後中日關係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18。

<sup>121</sup> 梁玉國，〈中日敵對與和解的根源〉，《歷史》，2003 年 11 月，頁 72。

<sup>122</sup>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第四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 756。

日本和中國對於 1937 年至 1945 年這一段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問題在主觀認知上向來有明顯的差異，這連帶造成了雙方對於戰後日本應該負起那些責任也因此產生歧見。日中之間對於歷史問題的爭議在 1982 年開始逐漸浮上檯面，該年中國因為日本有意修改教科書中對於侵華戰爭性質的解釋而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1985 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不顧國內外輿論的反對，率領內閣成員和 172 名國會議員參拜靖國神社<sup>123</sup>，這是戰後首次日本首相公開以官方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此次事件當然又再度引起中國的強烈抗議。日本長期不振的右翼勢力在新世紀之初掌握了日本國內的政治權力，小泉純一郎出任日本首相之後，其年年參拜靖國神社的舉動一方面無疑討好了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一方面卻也觸怒了包括中國在內各個曾經受到日本侵略的東亞國家。2002 年，中國在小泉第二次參拜靖國神社後隨即中斷了日中之間的首腦互訪，但是小泉仍舊未因此停止其參拜行動。

2004 年，已經劍拔弩張的日中關係再度急轉直下。首先，中國球迷在亞洲盃足球賽後因為中國敗給日本憤而鬧事，日本國旗在此次事件中被焚燒，日本輿論對此呈現出普遍的反感。隨後，中國的漢級核子潛艇又被發現入侵日本海域，使日中風雨飄搖的關係更是雪上加霜。2005 年，日本自民黨發表一份新的政策綱領，對於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動予以支持，此舉暗示了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在日後有可能制度化和常態化，之後，中國又在日本外相訪問中國期間前後爆發遍布多個省份的大規模反日遊行，民眾抗議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教科書淡化侵略歷史、日本政府接管釣魚台燈塔等行為，失控的情緒導致日本外館、日本企業的

---

<sup>123</sup> 楊植珍、張利，〈中日關係中的歷史因素〉，《池州師專學報》，第 19 卷第 6 期（2005），頁 69。

人員受到爆力攻擊，日本認為此次事件是中國默許，日本輿論對中國採取罕見的嚴厲撻伐<sup>124</sup>。日本向來認為教科書修改和靖國神社問題是內政問題，其它國家無權加以干涉，中國則對於日本處理歷史問題的態度不甚滿意，將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舉止視為軍國主義復辟。日中之間的歷史問題進一步昇華成為對立情緒下的民族主義。

權力的競逐和資源分配的主導權息息相關，愈有權力者對於資源分配的結果就愈有發言權。日本和中國是同樣位於東北亞的兩個大國，地理位置的相近使得兩國在資源爭奪上更為直接而難以妥協，資源爭奪往往離不開權力作用，隨著中國在上個世紀末的崛起，日本和中國在權力競逐以及資源爭奪方面日益白熱化。

對日中兩國而言，可動用資源的來源向來有著高度的重疊性，這一點最早從日本在二次大戰時發動侵華戰爭以成就其自身國家發展即得以看出，日本侵略中國最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將中國東北和華北的優質煤礦運回國內以為己用。日本和中國於 1972 年建交，之後雙方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共同開發中國的礦產資源，日本提供大量資金和先進技術開採中國的油田和煤礦，興建港口和鐵路交通，確保中國內陸的石油與煤碳可以順利運往日本，實現日本能源供應穩定、進口多元化的目標。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以及對資源的需求日益增加，日中兩個大國在能源取得方面逐漸呈現出競爭容易合作困難的局面，中國在 1993 年成為石油淨進口國，日本在中國和印度減少對日石油出口的情況下，被迫更加依賴從中東進口石油，日中雙方今日同樣面臨著石油供應來源過份單一化的困境，皆希望擺脫過度依賴從中東進口石油的局面。在資源有限而慾望無窮的情況底下，日本和

---

<sup>124</sup>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頁 156-160。

中國以石油為主要的各項資源爭奪終究勢必會排擠到對方獲取同樣資源的空間<sup>125</sup>。

日本和中國石油爭奪戰的白熱化從兩個具體事件中得以看出。2001年9月，中國和俄羅斯簽署「中俄關於共同開展鋪設原油管道專案可行性研究工作總協定」，計畫鋪設由俄國安加爾斯克到中國大慶的輸油管線，即是所謂的「安大線」，該計畫原本預計在2003年開工，並於2005年開始投入營運；2003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訪俄，與俄國總統普丁簽署「俄日能源合作計畫」，中俄「安大線」計畫由此生變，其後日中上演了一場西伯利亞石油輸出的爭奪戰，直至2004年，日本在此拉鋸戰中占了上風，中國被俄羅斯告知「安大線」計畫終止，中國怪罪日本在此事件中的中途介入。日本向俄國開出的條件相當優厚，日本承諾俄國將提供50億美元修築石油管道、10億美元建設石油管線沿線城市，另外75億美元計畫探勘西伯利亞其它地區的石油。其實不僅在西伯利亞，在中東、中亞、北非、南美，日本與中國爭奪石油的意圖亦十分明顯。日本無論在能源供應或能源運輸航道上的脆弱性更甚中國，中國崛起後對能源需求程度的大幅提升更是加深日本此一脆弱性的一個主因<sup>126</sup>。

日本和中國第二個石油爭奪的具體事項，是東海油源爭議。東海是一片由日本、中國以及韓國三個國家所環繞的半封閉海域，現在已知東海大陸架蘊藏著非常豐富的天然資源，包括水產、石油、天然氣以及其它的珍稀礦藏，推斷東海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含量與黑海相當，約72億噸<sup>127</sup>。

---

<sup>125</sup> 李昌新，〈略論中日關係中的能源因素〉，《東南亞研究》，第5期（2005），頁11-14。

<sup>126</sup>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頁160-164。

<sup>127</sup>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21期（2006），頁61。

由於東海海底三分之二為大陸架，海域劃界不僅涉及專屬經濟區的劃分，亦涉及大陸架的劃分<sup>128</sup>，加上日本和中國對於釣魚台的主權問題長期相持不下，致使東海海域如何劃界的問題在一時半刻難以解決。日本和中國似乎都認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解決東海問題的正確選擇，然而實際上的執行卻是困難重重<sup>129</sup>。由於中國已經早先一步在東海大陸架上開發了平湖、春曉、殘雪、斷橋、天外天等七個油氣田，這些油氣田多位於日中東海中間線附近，其中春曉天然氣田離中間線更只有 5 公里遠，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對中國在東海建設天然氣開採設施一事格外關注，日本認為在該地區的油氣田開採具有「吸聚效應」，會造成日本的利益損失，日本一方面主張中國「片面地」建設春曉油氣田之行爲已經違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一方面呼籲中國停止油氣田的開採並提供探勘紀錄，此外，日本也自行派遣調查船到東海海域進行調查，開始設立自己的天然氣項目。日本政府允許兩家日本公司在東海地區進行天然氣鑽探，使得日本與中國之間在東海油氣田上的衝突愈演愈烈<sup>130</sup>。

能源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要害，更重要的是，能源亦扮演著國家軍事安全的支柱角色，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和能源息息相關，也因此國際關係與能源之間亦具有緊密的互動關係。日本和中國是否能在能源分配問題上由權力關係走向合作關係，對於今後東亞地區國際情勢的變化有著深遠的影響。

日本與中國的互動關係受到國際體系結構的影響甚鉅，尤其美國在日

---

<sup>128</sup> 孫國祥，〈再探東北亞安全：東海海洋爭端的和平解決〉，「第四屆全球戰略與台海安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頁 107。

<sup>129</sup> 柯玉枝，〈近期中日衝突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2 期（2005），頁 22。

<sup>130</sup>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頁 62-63。

中關係上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新世紀之初，日中關係的另一個挑戰來自於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日本和中國勢必爲了維護自身利益的極大化而爭取成爲東亞經濟整合的主導者，如此使得兩國之間充滿矛盾和衝突。

二次戰後東北亞地區第一個軍事結盟產生於中國與蘇聯在 1950 年 2 月 14 日所簽定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Sino-Soviet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sup>131</sup>，該條約的簽定以及韓戰的爆發逆轉了美國的對華政策，美國放棄與中國接觸而選擇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韓戰之後，二次戰後初期有限的日中雙邊貿易在美國的主導下被禁斷<sup>132</sup>。1951 年「美日安保條約」的簽定使得東北亞美日對抗中蘇的格局隱然成形，日中兩國關係就在兩極對立的國際情勢下被完全隔絕。1971 年美國的「乒乓外交」和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密訪大陸開啓了自由主義陣營與中國再度接觸的大門，外交向來具有彈性的日本火速於 1972 年 9 月 29 日與中國簽署建交聯合聲明，中斷了二十年的日中關係由此再度出發。1980 年代，日趨和緩的冷戰情勢加上激烈的美日經濟競爭使得美日關係進入「同盟漂流」時期，日中關係也同時由於「歷史教科書問題」、「光華寮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等等爭議顯得和而不悅<sup>133</sup>。冷戰結束後，中國於世紀末的崛起態勢日益明顯，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一度備受考驗，歷經了 1990 年代的再定位過程，今日以美日同盟作爲東亞安全環境支柱的大方向已然確立，日中關係因此已難以有突破性的發展。

冷戰結束之後，中國一度對美日安保體系抱持著模稜兩可的態度，一

---

<sup>131</sup> 邱坤玄，〈中國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2004），頁 4。

<sup>132</sup> 鄧峰，〈美國對日本經濟復興政策的演變〉，《美國研究》，第 2 期（2002），頁 52。

<sup>133</sup> 邱坤玄，〈中國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頁 8。

方面，中國不希望美國和日本依然藉由美日同盟牢牢握住東亞的國際政治權力，另一方面，中國也承認美日安保體系在兩極體系瓦解後，東亞可能呈現「權力真空」的情況下，確實有其穩定東亞區域安全環境的作用。1996年「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和1997年「美日安保防禦新指針」提出之後，中國開始對於美日同盟關係有所警惕<sup>134</sup>。中國以「美日安保防禦新指針」中有關「日本周邊」(areas surrounding Japan)如何界定的問題質疑美日的立場，美國和日本對於「日本周邊」的解釋則採取模糊策略，主張「日本周邊」是一個「事態」而非「地理」的概念<sup>135</sup>。中國對「日本周邊」定義問題的堅持以及美日對該爭議的相對低調處理突顯出一個事實，即美日同盟關係似乎是隱而不宣地在對中國進行圍堵策略，這使得東亞地區無法擺脫遏制與反遏制的體系框架。2000年提出的「阿米塔吉報告」和其後美國和日本的相關外交文件中均證實美日同盟關係確實日益緊密。儘管日本可以選擇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但是快速且持續不斷增長的中國軍力仍然使其倍感威脅，最能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選擇，應該還是如二戰結束初期一般配合美國的需求，將自己鑲嵌入美國的全球戰略之中。

東亞區域整合的發展相對於西歐和北美起步較晚，過程和前景在現今看來亦不順利也無法樂觀。日本、亞洲四小龍國家、東南亞國家在戰後發展出具有產業垂直分工合作的實質經濟關係。日本藉由例如 ODA 等各種形式的資金和技術輸出，在戰後順利維繫住其戰前對於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力。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使東南亞國家意識到在全球化浪潮之下，經濟問題必須要區域內各個國家通力合作才能得到解決，故希望日本能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帶動東亞的區域主義發展<sup>136</sup>。日本當時鑑於外部有美國

---

<sup>134</sup> 王少普，〈中國的崛起與對日關係〉，《世界經濟研究》，第12期（2003），頁6。

<sup>135</sup> 楊永明，〈美日安保與亞太安全〉，《政治科學論叢》，第9期（1998），頁292-295。

<sup>136</sup> 蔡增家，〈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頁51。

壓力、內部有農業上的顧忌，對於這項提議並沒有積極正面的回應。相較於日本的漠視，中國在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的外交舉措贏得東協國家的好感，中國不但沒有讓人民幣貶值<sup>137</sup>，反而還以援助國的姿態對東協國家提供資金，協助他們渡過危機<sup>138</sup>，這讓東協國家對於中國看法大為改觀，先前東協國家對於中國的崛起深感不安，認為強大的中國對自身發展是一種威脅，如今東協各國開始認為中國的崛起未必不是一個機會。

2002 年 11 月 4 日，東協國家和中國簽署「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預計於 2010 年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AFTA)。中國如鴨子滑水般地與東協建立起更緊密的經貿關係震驚了區域內其它國家，日本似乎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很快在 2003 年 10 月和東協簽署「日本和東協全面性經濟夥伴架構協定」(Framework for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2003)，並且於同年 12 月的「日本與東協建立夥伴關係三十週年紀念高峰會」上和東協共同發表「東京宣言」(Tokyo Declaration for the Dynamic and Enduring Japan-ASEAN partnership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03)，日本進一步揭示將與東協致力於實現「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提升東亞經貿、政治、安全各個領域的合作關係，並目標於 2012 年完成和東協 FTA 的建立。至此，日本和中國競逐東亞區域主義發展領導者的態勢已至為明顯。

---

<sup>137</sup> 陳欣之，〈東亞經濟整合對台灣政經之影響〉。《南華大學第二屆亞太學術研討會「東亞區域整合對台灣安全與發展之影響」論文集》，2004 年。

<sup>138</sup> 楊志恆，〈中國反制美日安保戰略之對日策略分析〉，《中國事務》，第 8 期（2002），頁 33。

2005 年 12 月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召開的第一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可以視為是東亞區域整合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首屆東亞峰會受人矚目的一個焦點是美國的缺席，美國一直是東亞權力結構中最重要的一個角色，將美國排除於東亞峰會之外，也等於宣示東亞要真正走出自己的道路<sup>139</sup>。除了美國的缺席之外，東亞峰會另外一個受人關注的焦點是日本和中國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發展主導權的競奪，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力量大幅擴張之後，欲成為東亞區域霸權的企圖十分明顯，中國不但挑戰日本在東亞的絕對優勢，亦希望將美國的勢力徹底逐出東亞<sup>140</sup>；日本一直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領航者，儘管日本並沒有明顯對東亞國家展現出政治上的影響力，但是東亞各國的發展無疑還是深深受到日本的影響，日本在 APT 中對於中國巨大的影響力感到孤立無援，EAS 再度為日中兩國提供了另外一個政治角力的平台，日本自然不會想在此再度屈居劣勢。

在 EAS 決定召開時，日中兩國之間的競爭態勢已經十分明顯，例如參與國的爭議，中國認為未來東亞共同體的建構應由 APT 主導，不希望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俄羅斯等「境外」者加入 EAS，澳、紐被中國視為是美國的分身，印度則會牽制中國對於東協的影響力；日本則急欲將澳、紐、印等國拉進 EAS，企圖削弱中國在「ATP 架構」下的主導權<sup>141</sup>。在馬來西亞、泰國、中國等國的堅持下，美國最後並沒有受邀參加首屆的 EAS，但是在日本和新加坡的斡旋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等國則順勢加入了 EAS，俄羅斯亦以貴賓身份與會，讓原本旨在凝聚東亞區域意識的 EAS 後來發展和原先預期不盡相同，由封閉轉而開放，實際上突破了中國欲將 EAS 視為自身發揮場域的企圖。日本和中國在 EAS 中的政治

---

<sup>139</sup> 吳玲君，〈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邊區域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141。

<sup>140</sup>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2005），頁 50。

<sup>141</sup> 吳玲君，〈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邊區域合作〉，頁 144。

角力另外可以由兩國皆對東協主導 EAS 的權力表示尊重可以見得，EAS 的主辦國由東協國家而非 EAS 全體國家輪替擔任，其目的即是化解日、中之間關係過度緊張而引發的可能衝突<sup>142</sup>。日本亦大動作倡議實現東亞共同體，決議設立總額一億美金所謂的「東協綜合支援基金」，試圖以此強化與東協關係，抗衡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對東協不斷擴大的影響力<sup>143</sup>。

綜觀美國-日本-中國三角關係，可以理出幾點心得：首先，美日關係自二戰後即脫離不出「美主日從」的特性，此一特性雖然在 1980 年代由於美日的「同盟漂流」關係及日本的「脫美返亞」聲浪而有所鬆動，但是在 1996-97 年「美日同盟再定義」之後，此一特性又再度被日本確立並予以加強，世紀之交中國崛起更使得美日關係進入到二次戰後最佳狀態；其次，美中關係雖然有「霸權興衰」與「權力轉移」的迷思，但是由現今美中之間的對應關係來看，美國主導美中關係的態勢依然十分明顯，中國在短期內仍舊無法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美國在其官方文件中對中國有許多的要求和限制，間接呈現出美中關係的不對稱性。

再者，日本和中國自 1972 年建交之後，兩國之間的關係即一直時好時壞，無法有突破性的發展，新世紀之初，日中關係甚至每況愈下，日相參拜靖國神社及教科書修改所引發的歷史問題、西伯利亞及東海的油源之爭、美日同盟對於中國崛起的隱性圍堵、東亞經濟整合的龍頭之爭等，讓日中關係一而再，再而三的面臨考驗，未來亦難以有樂觀的預測。將美國-日本-中國三角關係套入戰略三角中，由於美國在美日關係和美中關係中具有主導權，並且在日中關係難以改善的情況下坐穩「羅曼蒂克」型中一方與另外兩方交好的有利位置，預料未來美國將重拾早先 Kissinger 等人的

---

<sup>142</sup> 陳鴻瑜，〈2005 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1 期（2005），頁 11。

<sup>143</sup> 同前註，頁 7。

主張，對日本和中國採取平衡政策，以便在東亞獲取最大的利益。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的不確定性讓美國的威脅感大增，在主觀的權力平衡是盡量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權力不平衡之前題下，美國選擇鞏固美日同盟，並且對中國採取交往和圍堵的兩手策略，似乎是明顯而合理的選擇。

## 第四章 「日本—中國—東協」三角結構

### 第一節 雁行模式與東亞經濟發展

戰後東亞的經濟發展奇蹟引起世人側目，學術界試圖以各式各樣的理論來說明東亞的經濟發展成就，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即在 1993 提出「東亞奇蹟：經濟成長與公共政策」(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專題研究報告，試圖解釋「表現優異的亞洲經濟體」(High-performing Asian economics, HPAEs) 何以能在經濟表現上脫穎而出<sup>144</sup>。儘管學者對於「雁行模式」(flying-geese model) 的看法不一，但是不可否認，以雁行模式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過程有其適用性。

雁行模式由日本學者赤松要 (Kaname Akamatsu) 於 1930 年代提出，雁行模式的內容主要有二：

(一) 世界上所有國家依工業化與經濟成長分成先進國、中間國、跟隨國三個階層，國家在這三個階層之中位置並不固定，彼此不斷競爭。先進國努力維持領先，促成和後進國之間的產業結構異質化，後進國則努力迎頭趕上，促成和先進國之間的產業結構同質化。如果先進國不能持續產業升級，甚至被後進國超越，那麼後進國就會成為先進國，甚至成為雁首。

(二) 全球各國並不在同一雁行編隊裡面，全球依區域分成三個編隊，分別是歐洲、美洲和東亞。美洲的雁首為美國、歐洲的雁首為西歐國家、東亞的雁首則為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可以略分為三個階段，分成是「進口階段」、「國內製造階段」、「出口階段」<sup>145</sup>。

<sup>144</sup> 蔡東杰，〈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全球政治評論》，第 7 期 (2004)，頁 2

<sup>145</sup> 王佳煌，〈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 (2004)，頁 7-8。

不同的學者對於雁行模式有不同的定義。對於雁行模式還有另外一種解釋：同一產業在不同國家間依序興衰的過程，以及不同產業在同一國家中依序興衰的過程。亞洲國家雁行模式的經濟發展型態是以日本為雁頭，東亞新興國家(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為雁身，中國與東協各國為雁尾。日本發展西方國家即將喪失競爭力的產品，當日本發展到技術成熟，加上生產要素也產生變化時，這些產品在日本的競爭力開始轉弱，接著東亞新興國家自日本轉移技術或自行開發，開始生產這些產品，當東亞新興國家發展到成熟，這些產品又至更落後的國家發展。與此同時，日本的產業升級，東亞新興國家的產業亦升級，呈現出「井然有序」的發展。雁頭永遠是日本，後面跟著南韓和台灣等，然後再是中國和東協，如此每個國家產業皆順利升級和轉型。在發展的過程中日本不但不擔心南韓和台灣緊追在後，反而因為南韓和台灣的發展增加日本零件的出口，創造日本更多的貿易順差<sup>146</sup>。

雁行模式在實踐的過程中可以歸納出幾個重要的關鍵：

- (1)「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對照 World Bank 對於東亞經濟奇蹟中「國家政策」(policies)與「經濟長成」(growth)之間關係的解釋<sup>147</sup>，政府確實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2)「競爭」的概念。指的是產品由低附加價值往高附加價值逐步發展的工業升級過程。
- (3)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間的合作。亞洲開發中國家之間根據彼此的

---

<sup>146</sup> 朱雲鵬、林美萱，〈雁行理論是否仍適用於東亞發展〉，《國家政策論壇》，第2卷第3期(2002)，頁162。

<sup>147</sup> World Bank, *The East Asian Miracl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102.

比較優勢進行合作，所有結構內國家依照先天稟賦與後天努力，儘可能爭取較為優越的位置。

(4)「工業升級」是雁行模式的目標。特別是對備受追趕壓力的領先者而言，一旦優勢不再，便必須設法透過國際投資來刺激進步並維繫地位<sup>148</sup>。

儘管雁行模式似乎可以貼切地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過程，但是雁行模式在被東亞實踐的過程中並不是沒有外在條件的配合。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領域中，很多左派學者並不認為經濟可以獨立於政治作用之外。雁行模式即是在冷戰格局和美國霸權的國際環境中被實踐。儘管日本在東亞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確實扮演其領頭雁的角色，是各國資金和先進技術的主要來源，但是日本從來就不是東亞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美國始終消費著東亞出口量的 40% 以上。冷戰格局迫使美國對東亞國家開放其國內市場，而美國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亦確實創造並維持了一個有利於貿易的國際環境，提供小國「搭便車」的機會。東亞各國在自身努力及國際環境的配合下，一方面實踐了雁行模式，一方面創造了東亞經濟奇蹟，就某種程度而言，美國在此其間具有關鍵性的地位<sup>149</sup>。

不過，部分學者對於雁行模式是否適用於解釋東亞的經濟發展奇蹟表現出「不置可否」的態度，他們認為雁行模式強調的是日商跨國生產網絡的作用，但是事實上日商在東亞新興工業國家投資生產的過程中，並不願意轉移技術、不願意在當地採購，日商在大東亞地區的生產網絡具有階級剝削性質，勞工工資因此被壓抑、終身雇用制因此動搖，更重要的是，台灣、南韓變成以日本為核心的半邊陲國家，東南亞國家則變成以日本為核

---

<sup>148</sup> 蔡東杰，〈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頁 4-6。

<sup>149</sup> 同前註，頁 8。

心的邊陲國家。雁行模式是一個中程理論，其目的是瞭解、剖析一個區域內的國家如何因為工業化的過程、技術層級和經濟發展層級的落差而形成動態的、彼此競爭的階層架構<sup>150</sup>。對於雁行模式持正面或反面意見並沒有對錯問題，僅是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已。

學者一般從三個現象觀察雁行模式是否解構，分別是日本經濟泡沫化、亞洲金融風暴、中國經濟崛起。要說明的是，不同的學者對於雁行模式有不同的定義，他們對於雁行模式是否解構的看法亦因此產生分歧。例如有些學者認為日本經濟的持續衰退可以視為是雁行模式的式微，有些學者則認為日本經濟是否持續衰退並和雁行模式是否式微沒有根本直接的關係，雁首落後不表示雁行編隊瓦解，僅是表示有新的雁首出現，日本不必永遠是大東亞地區產業發展的「火車頭」。無論如何，對於雁行模式是否式微的觀點亦如同上述對於雁行模式持正反意見一般，並沒有對或錯的問題，僅僅是切入的角度不同而已，而不論從那一個現象觀察或解釋雁行模式是否式微，也都還有待時間慢慢驗證。

## 第二節 日本與東協關係：雁行模式的具體實踐

東南亞的三個特性使其成為列強覬覦的對象。一是其具有樞紐性的地理位置，二是其本身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三是該區域內沒有支配性的強權存在。二次大戰期間，東南亞各殖民地和當時獨立的泰國被統一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作為「大東亞共榮圈」中資源供給的角色，日本和東南亞區域的生產分工關係自此奠下基礎，此一經濟上實質緊密的結合即使在日本戰敗後依然被牢牢的維繫住。

---

<sup>150</sup> 王佳煌，〈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頁 4-5、9-10。

東南亞北接科技、工藝發達並且經濟活絡的東北亞，東迎海洋軍事強權美、澳、紐，西鄰印度次大陸和中東產油區，一直以來即是貿易、軍事的主要交通要道。東北亞由中東進口石油唯一的海上航線即是借道東南亞，這使得東南亞海上航線的穩定與否影響東北亞各國的發展甚鉅，再者，東南亞的海上要道亦對美國的全球軍事佈局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美軍自西太平洋進入印度洋和波斯灣兩地即必定要通過東南亞的海上要道，事實上，東南亞亦一直是美國在冷戰前或冷戰後進行圍堵政策時所不可或缺的一環<sup>151</sup>。

東南亞的礦產資源不但豐富並且種類繁多，在 ASEAN 各國所出產的原物料中，橡膠占全球總產量的百分之八十、錫礦占全球總產量的百分之六十算是最大宗，其它像是木材、煤、鐵、鋅、銅等，ASEAN 各國也都有一定的產量<sup>152</sup>。東南亞亦出產石油，印尼、馬來西亞、汶萊皆出產石油，印尼是波斯灣以東最大的石油輸出國，亦是全世界最大的液態天然氣輸出國，日本和印尼一直維持良好外交關係部分原因是由於印尼出產石油和液態天然氣。

東南亞小國林立，各個國家間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均有著多元化的發展，東南亞各國除了地理上的鄰近外，在歷史文化、殖民過程、意識型態、政權本質、對外關係上均有不同的經驗<sup>153</sup>，由於區域內呈現多樣化、未經充份整合的特色，加上自衛或自治權免受外來強權侵犯的機制遲遲未予建立，自殖民時期開始，東南亞即一再淪為列強的勢力範圍，即使

---

<sup>151</sup> Zalmay Khalizad 等著，《美國與亞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1），頁 211-212。

<sup>152</sup>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出版公司，1992），頁 6-7

<sup>153</sup> 同前註，頁 3-5

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該區域依然沒有脫離受到外來強權支配的命運，例如美國介入韓戰和越戰並且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蘇聯勢力進入越南、中國崛起並且適時填補蘇聯自金蘭灣撤軍後所造成的東南亞「權力真空」狀態等等<sup>154</sup>，在在皆顯示東南亞和外來強權的掙扎和抵抗仍然持續進行著<sup>155</sup>。短期內東南亞由境外強權主導區域內國際事務的格局不易改變，各國對威脅的認知不一致是一個重要原因，例如越南和菲律賓視中國為迫切的威脅、印尼視中國為潛在的威脅、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則對中國持友善的態度<sup>156</sup>。

「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成立於 1967 年。在美國的驅使下，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五國外交部長於曼谷集會，並正式發表所謂「曼谷宣言」(Bangkok Declaration)，宣告東協正式成立。根據「曼谷宣言」所揭櫫的要義，東協成立的目的是在於：

- (1) 以鞏固東南亞國家富足與穩定的平等合作精神為基礎促進區域的經濟成長、社會進步、文化發展。
- (2) 以維護區域內的正義和法治精神和聯合國憲章促進區域和平與穩定。
- (3) 在經濟、社會、文化、科學、行政等各個領域上具有共同利益之處加強協作和互助。
- (4) 在教育、學術、科學、行政等各個領域上藉由訓練和研究的形式達成互助。

---

<sup>154</sup> 參考戴萬平、吳靜茹、顧長永，〈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互動〉，《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 (2003)，頁 205。

<sup>155</sup> Wayne Bert 著，《熟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5)，頁 215-216。

<sup>156</sup> Zalmay Khalizad 等著，《美國與亞洲》，頁 218-235。

- (5) 在農業和工業上更有效協作，擴展貿易，包括國際貿易的學習、運輸和溝通技能的改善以及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 (6) 發揚東南亞。
- (7) 藉由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以及在共同目標的基礎上緊密維持利益上的合作，並且在彼此之間尋求任何可能更加緊密的合作關係。

儘管「曼谷宣言」中對於東協成立的宗旨並沒有附予太多的政治意涵，但是不可否認，東協成立的初衷很大部分是為了抵抗共產勢力的滲透，在中國的支持下，東南亞各國內部均長期受到程度不等的共黨叛亂活動或分離主義運動所困擾。

東協成立的前十年中，在組織制度化方面並沒有任何進展，在「東協模式」(ASEAN Way) 被提出並漸漸確立之後，<sup>157</sup>東協將所有東南亞國家納入其中的期望才逐步得以實現，在經歷了三十餘年的努力之後，汶萊於 1984 年加入東協；越南於 1995 年加入東協；寮國與緬甸於 1997 年加入東協；柬埔寨亦最終於 1999 年加入東協<sup>158</sup>。在柬國加入之後，東協成爲一個總人口 5 億、總面積 450 平方公里、國民生產毛額約 6850 億美元、貿易總額達 7200 億美元之真正代表全東南亞區域國家的國際組織<sup>159</sup>。

很多學者認爲日本和東亞地區的關係可以「雁行模式」加以解釋，因此日本和東南亞區域的關係亦可以在此脈絡底下被討論。戰後，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承接起其在戰時和東南亞的經濟關係，於 1950 年代開始透

---

<sup>157</sup> 蔡增家認爲，所謂 ASEAN Way 是一種不干預政策，它不單只是對東協之外的事務採取不干預政策，亦對東協內部各成員國之間，屬於內政的事務不予以干預。

<sup>158</sup>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第 24 期（2005），頁 10-11。

<sup>159</sup> 黃奎博，〈冷戰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協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15 期（2000），頁 185。

過戰爭賠償、外援、投資等途徑將東南亞納入其經濟勢力範圍<sup>160</sup>。日本和東協的關係可以視為是雁行模式的實踐，而實踐的方式可以從三個面向加以討論，一是海外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二是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三是貿易<sup>161</sup>。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和東南亞重新恢復關係的起點是戰爭賠償問題。戰後，日本處於美軍占領的狀態，日本的對外賠償問題亦由美國政府與占領當局完全掌握，日本政府沒有獨立對外交涉的權利，只能通過與美交涉，盡可能爭取減少日本的賠償負擔。冷戰情勢的發展以及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致使美國改變對於日本對外賠償的態度，日本因此得以逐步削減戰爭賠償，甚至放棄賠償。美日在賠償問題上的「不賠償主義」引起東南亞國家極大的不滿，日本的賠償問題阻礙了媾和條約的締結。美國怕在美蘇對峙的情勢中失去東南亞，即「勸說」日本以「勞務賠償」代替「現金賠償」。勞務賠償固然是戰爭被害國極力爭取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其亦是美國欲借賠償問題恢復日本和東南亞的生產連結關係，以成就美國東亞戰略的產物<sup>162</sup>。

日本政府的 ODA 計畫源於日本對東南亞的戰爭賠償問題。日本政府將戰爭賠償與對外經濟援助聯繫在一起，藉由對外援助，日本一方面補償被害國的戰爭損害，一方面達到以經濟手段對東南亞國家發揮影響力的目的。東協成立前後，日本對東協國家的 ODA 增長迅速。直至 1970 年代中期，日本對東協國家的 ODA 有兩個特點：首先，日本對東協 ODA 增長速

---

<sup>160</sup> 蔡東杰，〈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頁 7。

<sup>161</sup> 蔡增家，〈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5 卷第 4 期（2002），頁 76。

<sup>162</sup>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2006），頁 26-33。

度高於日本對世界各國 ODA 增長速度；其次，日本對印尼 ODA 增長速度最快。1970 年代中期之後，上述情況有所翻轉，日本對世界各國 ODA 增長速度高於其對東協 ODA 增長速度，日本對泰國 ODA 增長速度亦超過其對印尼 ODA 增長速度<sup>163</sup>。如此改變顯示出：一來日本對東南亞的 ODA 不再側重其戰爭賠償的意涵，二來日本對東南亞的 ODA 不再只考量經濟因素，而是經濟、政治與戰略目的並重。

日本在戰後奉行貿易立國原則，其和東協的貿易關係亦成爲雙方外交關係的基礎。早期日本與東協的貿易關係基本上是一種垂直分工的貿易關係，也就是說，東協國家對日本出口礦產資源，日本則對東協國家出口製成品，由於產業分工關係互補，雙方的經貿關係自然十分密切。日本與東協的貿易發展在 1980 年代中期呈現大幅攀升趨勢，一般認爲這和「廣場協定」(Plaza Accord)後日元大幅升值有直接關係。隨著日本本身產業結構的改變，日本從東協進口製成品的比率也顯著增加。1986 年，日本對東協貿易進口總額中，製成品占 8.0%，1991 年，製成品所占的比率上升至 29.8%，1999 年，該比率更上升至 61.3%，2003 年，該比率則爲 59.2%。日本從東協進口的製成品，主要以機械設備爲主<sup>164</sup>。在區域整合浪潮下，日本與東協的貿易關係更趨緊密，如今東協是日本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區，而日本則是東協除了其內部國家貿易之外的最大出口國<sup>165</sup>。

日本私人企業在戰後不久旋即回到東南亞地區投資。基本上日本私人企業以礦產業作爲其對東南亞國家直接投資的對象，東南亞各國亦需要加強資源開發和擴大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經濟發展，故雙方得以各取所需進行

---

<sup>163</sup> 趙晨，《東南亞國家聯盟》（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4），頁 195-197。

<sup>164</sup>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頁 61-68。

<sup>165</sup> 蔡增家，〈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5），頁 105。

發展。1950 年代後半期，日本私人企業到東南亞地區投資的趨勢開始有了明顯的增長，1960 年代中後期，由於日本政府放寬了對外投資的限制，使得日本私人企業對於東南亞的投資又更大規模的擴展，1970 年代，日本政府出於能源供給的戰略考慮，大幅度增加對東協國家礦產能源方面的投資，其中尤其以對印尼的投資為最，廣場協定之後，日本超越美國成為東協最大的投資國<sup>166</sup>，1990 年代之後，日本對東協的 FDI 不再增加，日本在製造業方面的投資多轉移至中國大陸<sup>167</sup>。

儘管日本和東協的經濟關係實質而緊密，但是雙方在政治上或安全上的關係卻顯得生疏而乏善可陳，日本不介入東協事務太深顯然有其「美國因素」和「歷史因素」的考量。

日本在戰後依吉田原則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全力發展經濟，1990 年代初期，日本朝向「正常國家」的主張被提出，小澤一郎倡言要改變日本「經濟一流，政治三流」的「小腦袋恐龍」形象，擺脫戰後日本「重經濟、輕軍事」的「商人國家」路線<sup>168</sup>。日本在政治上的「不作為」態度自然也反應在其對東協的外交上，在美國的亞太軍事安全體系中，處於冷戰前緣的日本在安全方面與東南亞並未發生直接關係，日本外交向來以美日同盟為其軸心架構，日本對東協採取「被動外交」的態度因此不難理解。隨著美日同盟的發展日亦緊密，未來日本對東協的外交是否會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化被動為主動，仍然須要進一步的觀察。

---

<sup>166</sup> 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頁 73-78。

<sup>167</sup> 蔡增家，〈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頁 87。

<sup>168</sup> 蔡東杰，〈後冷戰時期台日特殊關係發展分析〉，《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3 卷第 2 期（2007），頁 189-192。

早在東協成立之初，日本即對東協表現出漠視的態度，1967年8月東協成立時，日本官方沒有作出任何的評論，同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向國會報告其東南亞訪問之行時，亦通篇沒有提到東協這個名詞，日本官方文件中出現東協這個名詞，是在東協成立五年之後。日本和東協的外交關係在1970年代開始產生劇烈的變化。1970年代前期，東協國家反日情緒高漲，1972年曼谷發生抵制日貨的示威遊行，風潮瞬間遍及全國；1974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協時在各地引發反日示威活動。導致東協國家反日情緒漫延的因素頗多，但是日本政府決定以社會文化交流的方式，逐步消除東協國家政府與人民對於日本的隔閡。

1970年代中期，由於中南半島情勢日益緊張，日本對東協再度再度釋放出誠意和善意。日本首相三木於1975年公開發表談話，強調東協在促進東南亞區域穩定方面具有極積作用。1970年代末期，日本拋出「福田主義」，表示將抱持三項原則與東協國家交往，此三項原則分別是：（1）日本不作軍事大國；（2）日本與東協將在「心心相印」的基礎上建立相互信任的關係；（3）日本以平等地位出發與東協國家發展合作關係，同時努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礎上促進與中南半島國家的關係，進而為東南亞區域的和平與繁榮貢獻一己之力。「福田主義」首次明確地規範出了日本與東協關係的總體架構<sup>169</sup>。福田主義提出後，基本上日本和東協國家之間的「歷史問題」已經被某種程度的消弭。

### 第三節 中國與東協關係：威脅抑或機會

中國與東協關係緩和於1970年代；接觸於1990年代；在1997年亞

---

<sup>169</sup> 趙晨，《東南亞國家聯盟》，頁177-187。

洲金融危機後產生質變，由對等走向中國主導。新世紀之初中國與東協日益緊密的關係其來有自，就中國而言，中國的「睦鄰外交」必須要有東協的參與才能完善，就東協而言，中國在安全上給予東協承諾、在經濟上給予東協遠景，東協更可以藉由中國牽制日本，因此東協逐漸將中國視為「機會」而非「威脅」。

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敵對關係於 1970 年代開始有所緩和，美國的「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以及中越關係的惡化，促使雙方關係有此轉變。英國宣佈撤回蘇伊士運河以東駐軍以及美國推行尼克森主義之後，一直受到英美保護的東南亞國家利時間失去安全上的依靠<sup>170</sup>；1971 年，東協主動提出「和平、自由、中立區」(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ZOPFAN) 主張，表明東協國家將致力於「確保東南亞成爲一個和平、自由、中立的區域，並且不受到境外強權任何形式的干預」<sup>171</sup>；東協此一宣示某種程度上暗指其將和各個大國保持一定距離的外交關係，這使得中國降低了對東協的猜忌。1970 年代中後期，中國和越南的關係日益惡化，中國因此更加有意改善和東協國家的關係，越南入侵柬埔寨並且試圖稱霸中南半島的舉止被中國視爲是對其極大的挑釁<sup>172</sup>。1974 年，馬來西亞率先和中國建交，1975 年，菲律賓和泰國亦隨後跟進，新加坡和印尼考量國內的政治和軍事情勢因此延緩了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sup>173</sup>。

中國和東協國家啓動一系列的交流與接觸始於 1990 年之後。1989 年東歐變天局勢以及 1991 年蘇聯垮台，一度讓中國政權岌岌可危，「天安

---

<sup>170</sup> 同前註，頁 26-27。

<sup>171</sup> See <http://www.aseansec.org/1215.htm>.

<sup>172</sup> 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頁 22。

<sup>173</sup> 黃奎博，〈冷戰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頁 174-176。

門事件」一夕之間摧毀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致使中國遭受國際社會的孤立，北京在與西方關係嚴重倒退的情況下不得不選擇和東亞國家增進關係<sup>174</sup>。1991年，中國國務院總理錢其琛受邀參加東協部長會議，這是中國和東協關係加強互動的開始；1994年，「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成立，中國以諮商夥伴的身份受邀參加；1995年，中國與東協建立針對政治與安全對話的「資深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1996年，中國開始參加東協的「後部長會議」(Post Ministerial Conference)，雙方關係由諮商夥伴升格至「全面對話夥伴」(Dialogue Partner)。

1997年，中國和東協關係更進一步深化，不但設立「東協-中國聯席合作委員會」(ASEAN-China Joint Cooperation Committee)以確認雙方的共同利益、促進雙方聯合計畫的運作，並且召開第一次非正式的「東協-中國高峰會議」(ASEAN-China Summit)，江澤民親自參加此會議並於會後簽署「聯合聲明」<sup>175</sup>。中國與東協關係如此迅速的發展促成了隨後「東協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機制，以及新世紀東亞區域整合浪潮的開展。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中國與東協關係再起變化，由對等走向中國主導。亞洲金融風暴一方面觸動了東亞區域整合的反省，一方面也突顯了中國崛起的事實。金融危機雖然重創了東南亞各國卻未給中國帶來太大的影響，這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超越原本處於領先的東南亞；中國在金融危機的處理上也顯得「負責任」，相較於美國的「不介入」態度，中國

---

<sup>174</sup> 黃奎博，〈冷戰後中國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頁199。

<sup>175</sup> 楊永明，〈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之政府間多邊對話機制〉，《政治科學論叢》，第11期(1999)，頁178-180；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頁23。

在金融危機中充分扮演「公共財」(public goods) 提供者的角色，不僅維持人民幣不貶值以避免東南亞各國的災情雪上加霜，並且不遺餘力地對東南亞各國提供金援資助。不少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國際建制的發展必須由霸權國家(hegemony)來帶領和維持，區域主義的發展亦是如此<sup>176</sup>，在區域整合聲浪日益高張以及中國崛起現象日益明顯之際，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符合霸權國家應有的形象，使其更加接近東亞區域霸主的位置。

1997 年開始的 APT 儘管也可以看作是三個「東協加一」(ASEAN Plus One, APO) 的集合體<sup>177</sup>，但是中國在 APT 機制下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則無庸置疑<sup>178</sup>。2000 年中國總理朱鎔基在新加坡主動提出中國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2001 年東協在與中國的雙邊會談中正式呼應該項提議，雙方並且於 2002 年簽署了「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ASEAN and PRC)，預定於 2010 年完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提高東協國家合作的意願，中國在談判的過程中展現大國風範，主動給予東協國家很多的禮遇措施，諸如提前開放市場、提供四個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更優惠的關稅等<sup>179</sup>。中國和東協一連串區域整合機制的倡議，也迫使日本必須正視東亞區域整合的需求，儘管日本緊跟在後，但是中國依然能夠在實質上取得規則制訂的優勢<sup>180</sup>，在國際關係中，往往只有霸權才能夠取得制度上的優勢。2003 年 10 月，中國與東協十國簽署三大重要宣言，分別是「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係」、「東南亞友好合作

---

<sup>176</sup>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 (2005)，頁 2。

<sup>177</sup> 林若雲，〈評析中國於東亞高峰會之角色〉，頁 9。

<sup>178</sup> 吳玲君，〈東亞高峰會議與亞太邊區域合作〉，頁 142。

<sup>179</sup>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頁 16-19。

<sup>180</sup>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 (2005)，頁 50-52。

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以及「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雙方關係因此進一步臻於另一個新境界<sup>181</sup>。2005年首屆「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EAS)召開之際,美國對於EAS之倡議亦提出警告,擔心EAS成爲以中國爲核心的經濟集團<sup>182</sup>。

中國和東協日益緊密的關係其來有自,就中國而言,中國崛起後最重要的就是在經濟上持續發展,在安全和政治上防範美國的圍堵;就東協而言,東協在金融危機後最重要的就是恢復蓬勃的經濟發展,中國則是東協最大的安全威脅。

中國基本上自1989年之後即以「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爲自身的經濟發展營造和平、穩定的環境。在大國外交方面,北京採取「韜光養晦」的作法持續改善和各個大國的外交關係;在睦鄰外交方面,北京一直不斷強調「中國只會做睦鄰、安鄰、富鄰的事」,避免中國崛起爲鄰國帶來太大的壓力。中國執行睦鄰外交主要考量有三:一是爲了防範美國在東亞地區對其採取「圍堵策略」,中國必須爭取東亞地區的主導權,以「有所作爲」的策略抗衡美、日兩國在東亞地區的勢力。二是爲了穩定邊疆衝突,例如「台獨」和「藏獨」,如果能將台灣成功排除在區域協定的談判之外,就能避免台獨勢力的進一步擴張。三是希望藉由東亞經濟整合,避免失去利用外商資本、技術、先進市場管理的契機<sup>183</sup>。東協在中國的睦鄰外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國認爲東南亞各國在地理上與中國鄰接,與東南亞維持和睦關係對中國南邊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sup>184</sup>。

---

<sup>181</sup> 林若雲,〈評析中國於東亞高峰會之角色〉,頁3。

<sup>182</sup> 陳鴻瑜,〈2005年東亞峰會評析〉,頁5。

<sup>183</sup> 吳瑟致,〈中國與東協建立經貿合作之策略研究〉,《中國研究》,第39卷第8期(2005),頁90-91。

<sup>184</sup> 李國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經背景分析〉,《立法院院聞》,第31卷第11期(2005),

東南亞一度是全球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出口導向的東南亞面臨外資嚴重退縮的窘境。由於政治動盪不安、市場開放不足，東南亞的經濟潛力極限已為外資所摸透。外國投資與產品外銷市場具有連帶關係，東協各國赫然發現自己在失去外資之餘，也失去了外資後面的外銷市場。不僅如此，東協對於西方國家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及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也表現出明顯的憂慮，東協作為一個經濟集團在實力上仍然太過薄弱，沒有辦法面對來自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競爭<sup>185</sup>。東協曾經多次主動提出和日本共組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卻在 2001 年 9 月終於遭到日本的無情拒絕，因此當中國主動向東協招手，希望和東協共組自由貿易區時，東協也在別無選擇之餘，於 2001 年的 APO 雙邊會談中正式呼應中國的提議。朝正面方向來看，東協和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可以為東協帶來更多機會，東協加中國的人口總和有 17 億，預估未來 10 年人口還會再增加到 20 億，市場潛力遠大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而中國加入 WTO 後，亦能為東協帶來更廣泛的商機<sup>186</sup>。東協和中國維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亦帶給東協國家意外的好處，例如中國於 2002 年與 2003 年分別簽署了「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和「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TAC)，對東協國家在安全方面釋出善意；例如日本原本因為考量國內外因素，遲遲不願和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鑑於中國和東協共組自由貿易區的計畫已然成形，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不得不於 2002 年和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宣言<sup>187</sup>。

---

頁 75。

<sup>185</sup> 李國雄，〈東協擴張性的區域主義中的中國角色〉，《國際關係學報》，第 17 期（2002），頁 3。

<sup>186</sup> 張如倫，〈「東協十加一」的戰略意涵〉，《國防雜誌》，第 17 卷第 8 期（2002），頁 39-42。

<sup>187</sup> 金榮勇，〈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頁 43。

東協對中國的崛起並非全然不感覺到威脅。儘管中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並且對於東亞的區域整合作出貢獻，但是中國的國力在區域內與其它國家相較懸殊，對於中國霸權崛起的疑慮無可避免地要被引發出來<sup>188</sup>。事實上中國在這方面盡了很多努力，近年來「中國威脅論」的內容逐漸由「安全威脅」演變成「經濟威脅」，甚至有人已經不再視中國為威脅，因而有了「中國機會論」<sup>189</sup>。

東協國家對於中國所造成的安全威脅看法並不一致。菲律賓、越南與印尼等三個國家對中國的戒心尤為嚴重，菲律賓、越南因為南沙主權問題與中國正面衝突，南沙主權問題的爆發，主要源自於南海附近海域被探測到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南海周邊國家為了爭取石油所帶來的經濟利益，紛紛對此區域聲稱擁有主權，菲律賓、越南、中國三國之間因此互相具有敵意。依據美國「能源資訊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的預測資料顯示，中國將於2020年時在石油方面百分之七十仰賴進口，在天然氣方面百分之五十仰賴進口，中國對於南海主權的爭取可以說勢在必得，南海不但是中國海路運油的必經之地，南海水域下蘊藏的大量石油和天然氣，亦多少可以緩解中國能源供不應求的窘境<sup>190</sup>。印尼為了爭取東南亞區域的領導地位對中國的擴張行為感到不安與不滿，印尼是東協之中人口最多、領土最廣的國家，在東協一直被默認具有「龍頭」的地位，隨著東協開始重視經濟合作，身為東南亞政治大國的印尼當然極力想在區域經濟整合的談判上擁有主導權，中國採取睦鄰政策並且挾其龐大的經濟

---

<sup>188</sup> 陳俊仁，〈新霸權的崛起或新橋樑的建立？論中國與東南亞國協國家的未來與發展〉，《華岡法粹》，第34期（2005），頁182。

<sup>189</sup> 吳德美、曾聖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2005），頁59

<sup>190</sup> 張如倫，〈「東協十加一」的戰略意涵〉，頁46。

力量與東協建構經濟合作關係，與印尼在政治上產生利益衝突，雙方似乎在東南亞主導權的競爭上互不相讓<sup>191</sup>。

中國崛起對於東協所造成的經濟威脅相較安全威脅更多地被人們所討論。中國經濟崛起對東協國家所造成的經貿威脅主要研究的是雙方對於 FDI 的競奪以及雙方在外銷市場上面的競爭。中國在生產要素上的成本優勢早已不是東協國家所能與之競爭，儘管東協國家在外資吸引上受到中國「磁吸效應」多少影響難以估計，但是誠如日本駐金邊外交人員所言：「中國讓人望而生畏。中國經濟一直蓬勃發展。中國是十三億人口的龐大市場，而東協加起來不過五億人，還不到中國人口的二分之一。東協擔心中國搶去外資。在他們眼裡，中國是特大的競爭對手，不是夥伴」<sup>192</sup>。

具體而言，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東協的 FDI 是中國的兩倍，但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四年後，中國的 FDI 已經反倒過來是東協的兩倍，而此一趨勢還會再擴大<sup>193</sup>。不僅如此，就中國與東協之間相互投資而言，中國的表現也讓東協國家頗感無奈。東南亞的大型華人企業由於地緣及血緣關係等因素，在中國對外開放後快速進入中國市場，對中國投資不論在規模和項目上皆逐年擴大<sup>194</sup>，反觀中國對東協國家的投資即顯得乏善可陳。中國只吸引外資卻缺乏對外投資的作法讓東協國家頗有微詞，儘管中國也派出一些商務考察團前往東南亞進行考察，並且建立投資的管道和雙邊合作的途徑，但是中國對東南亞的投資額還是微不足道，中國在此方面力猶未逮的主要因素是中國私人擁有大資本者少，主要仰賴集體資本和國營企

---

<sup>191</sup> 吳瑟致，〈中國與東協建立經貿合作之策略研究〉，頁 97。

<sup>192</sup> 蔡佩蓉，〈從區域主義的實踐論中國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8 卷第 12 期（2002），頁 52。

<sup>193</sup> 張如倫，〈「東協十加一」的戰略意涵〉，頁 40。

<sup>194</sup> 吳德美、曾聖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頁 64。

業資本，這類企業在海外投資受到許多限制<sup>195</sup>。截至 2006 年上半年止，東協在中國的投資達到 400 億美元，但是中國在東協的投資卻只有 10 億美元，相差達到 40 倍，如何在投資項方面加以平衡，是中國必須考慮的問題<sup>196</sup>。東協產品和中國產品互補性低而競爭性高致使東協在外銷市場上無法與中國產品競爭，東協面對面地與中國競爭發達國家的出口市場<sup>197</sup>，而中國在產業結構鏈上的位置在未來似乎很有可能走在東協的前面。

中國經濟崛起當然不會只帶來壓力而不帶來機會。儘管很多東亞國家擔心中國經濟崛起將會帶來「排擠效應」，但是面對中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並且找出因應之道還是各國所不得不努力的方向，誠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 2005 年 5 月 24 日於東京舉辦的論壇上所言：「抵制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影響是徒勞的」<sup>198</sup>。對於東協國家而言，中國經濟擴張固然帶來 FDI 的磁吸效應、失業、財政赤字等經濟衝擊，但是藉由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東協也可以擁有中國廣大市場的商機<sup>199</sup>。2002 年中國與東協宣佈將於 2010 年之前成立自由貿易區，預估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的設立，將可以使東協在 GDP 方面有所增長。藉著和中國的經濟整合，東協有更好的條件吸引歐美和日本資金到東協投資，東協企業也可利用中國優良的生產要素和廣大的市場而有更佳的獲利，更重要的是，東協許多天然資源如礦產、石油及天然氣都會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而增加對大陸的輸出<sup>200</sup>。除此之外，農業進口關稅和旅遊限制降低後，東協的農業和旅遊業部門也將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

<sup>195</sup> 陳鴻瑜，〈東協的區域佈局和策略〉，《國際關係學報》，第 20 期（2005），頁 183。

<sup>196</sup> See [http://www.wretch.cc/blog/BiRong&article\\_id=10872737](http://www.wretch.cc/blog/BiRong&article_id=10872737).

<sup>197</sup> 黃朝翰，〈東盟-中國關係：一種經濟視角〉，《外交評論》，第 89 期（2006），頁 52。

<sup>198</sup> 同前註，頁 56。

<sup>199</sup> 吳德美、曾聖文，〈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頁 58。

<sup>200</sup> 李國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經背景分析〉，頁 79。

首倡「和平崛起」理論的中國著名學者鄭必堅一再強調：「中國不會對外輸出發展模式」。中國以不輸出經濟成功發展經驗回應世人「模式威脅論」的質疑，足見由「誰」引領經濟發展關係著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結構。東亞戰後的發展被視為是雁行模式的實踐，中國經濟崛起對於雁行模式的挑戰牽動著日本和中國在東亞的權力關係。

部分認為中國即將取代日本成為東亞新霸主的學者認為，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成長並非只是一個國家興起，而是一個新結構的誕生。一些相關評論或報導可以充實此一論點。英國「倫敦經濟學人」以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與過去東亞那種以日本為模型循序由農業而工業、由低等加工而高等加工、由勞力密集而資本密集的軌跡完全不同，中國毋寧更像是 19 世紀美國那種全方位、高爆式的成長模式，一方面有極低度的工業和農業，但同時也有與全球頂級科技掛鉤的產業；世貿組織祕書長蘇巴猜表示，中國進入世貿後，直接外資可望由過去年平均 400 億美金增至 500 億美金，到 2008 年則可能達到每年 1000 億美金的水準；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指出，中國進入世貿後，不消 10 年就可超越德國、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sup>201</sup>。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崛起確實很有可能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突破東亞雁行模式發展。

事實上，在東亞區域整合以及中國經濟崛起下，東亞區域確實有由原本井然有序之國際勞務分工被迫朝向更激烈之產業競爭發展的跡像<sup>202</sup>，中國的經濟規模遠比日本和其它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大得多，其發展也理應和

---

<sup>201</sup> 張如倫，〈「東協十加一」的戰略意涵〉，頁 39-42。

<sup>202</sup> 蔡東杰，〈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頁 14-15。

這些東亞鄰國不太相同<sup>203</sup>。儘管如此，中國是否能夠在未來成爲東亞發展的領航者依然受人質疑，主要由於日本製造業依舊具有「尖端」地位以及日本在區域整合浪潮中大有「後發制人」的態勢。除此之外，中國經濟崛起雖然確實促成了東亞經濟發展的某些改變，但是中國究竟是在「體系結構變遷」的情況下成爲東亞霸主，還是在「體系次序重構」、「區域霸權更迭」的情況下成爲東亞霸主，亦或是其它可能，應該也是另外一個可以在未來五至十年間繼續追縱觀察，並且加以研究討論的議題<sup>204</sup>。

---

<sup>203</sup> 王佳煌，〈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頁 22。

<sup>204</sup> 蔡東杰，〈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頁 17。

## 第五章 「中國－印度－俄羅斯」三角結構

### 第一節 中印關係：大國外交與睦鄰外交的實踐

中國和印度在第二次大戰後一度因為意識型態相近而友好，印度於 1950 年 4 月 1 日與中國建交，也是第一個與其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由於同屬第三世界國家，又有類似的殖民遭遇，冷戰初期中印之間多了一份相知相惜的情誼，對外關係上雙方也有一致的看法，中國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在精神上面有所雷同<sup>205</sup>，1955 年的「萬隆會議」(Asian-African Conference) 中，印度和中國同聲倡議亞非發展中國家大團結，一時間「不結盟運動」風起雲湧，中印兩國也在強調民族獨立的共識上建立起堅實的友誼基礎。

不過，中印外交上的友好關係在 1950 年代末期產生變化，由於西藏問題和邊界問題一直僵持未解，雙方關係急轉直下。1959 年，印度對西藏問題表示同情並支持達賴喇嘛的作為引起中國強烈不滿，雙方矛盾因此尖銳化、公開化。1960 年，周恩來為了邊界劃分問題赴印度進行會談，由於雙方立場差距過大，談判並無明顯結果，其後，中印邊境地區的形勢日益惡化。1962 年 10 月，解放軍和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東西段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雙方並且相互撤回派駐大使。自此，中印關係變成敵對狀態，不僅相互指責和爭吵，在國際事務中亦互持對立立場，彼此派駐層級降為代辦級，邊界地區亦武裝大量部隊並經常發生小規模衝突<sup>206</sup>。中印戰爭後，

---

<sup>205</sup> 周茂林，〈大象東進-後冷戰時期印度的戰略思維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4 期（2004），頁 19。

<sup>206</sup> 吳頌彬，〈中國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中國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2005），頁 76-77。

有長達十年的時間，雙方關係可用對峙來形容，中國將印度視為西南方的一個隱憂，開始藉由支持巴基斯坦來制衡印度，中國出售武器給巴國並協助其發展飛彈及核武，印度在國防安全上壓力倍增，中印關係也因此更加惡化<sup>207</sup>。1970 年代中期之後，雙方關係開始有日益回穩的跡象，藉由互訪以及各種協議的簽署，雙方在邊境穩定和經貿合作方面持續有所進展。

中印關係於 1998 年再度遭遇考驗。印度在該年進行了 5 次核試，表面上是針對巴基斯坦而來，實際上則可能針對中國。印度國防部長 George Fernandes 在核子試爆後公開宣稱，中國是印度的「潛在頭號威脅」，印度總理也在致 G8 的信函中指稱：「有一個核武國家與印度接壤，其曾武裝侵略印度並協助另一個鄰國發展核武，加劇彼此間不信任的氣氛」。<sup>208</sup>印度核子試爆的原因在於其對中國的猜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中國在南亞的平衡政策讓印度懷恨在心，印度認為中國和巴基斯坦「全天候」的關係是巴國所以勇於挑戰印度的原因<sup>209</sup>。中國為了謀求周邊地區的穩定與國際社會的支持，在此次事件中一直維持低調並且積極尋求與印度修補關係。<sup>210</sup>

事件發生後中國也改變其南亞政策，和印巴採取等距的外交關係。特別是在台海危機和美中一連串的衝突過後，中國不希望南亞的不穩定又造成其安全上的負擔。中國在印度核子試爆後不斷強調其無意恢復核試，並且反對西方國家對印度實施經濟制裁，最重要的是，中國並未召回大使或是降低雙方關係層級，中印關係因此沒有完全破裂。中國駐印度大使周剛在印巴核試後聲明中國對印度不構成威脅、不謀求霸權，並且強調中國主

---

<sup>207</sup> 鄭榮新，〈中國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之影響〉，《陸軍月刊》，第 41 卷第 478 期（2005），頁 105。

<sup>208</sup> 吳頌彬，〈中國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頁 77-78。

<sup>209</sup> 張雅君，〈印巴核武試爆後中國的南亞安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00），頁 21。

<sup>210</sup> 鄭榮新，〈中國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之影響〉，頁 112。

張全面、徹底地裁軍，反對核武擴散。1998年7月，周剛在接受印度國際中心邀請演講時指出：「中印兩國是文明古國，有能力克服目前暫時的困難，推動中印早日回到健康軌道」<sup>211</sup>。印度在核試後也改變其安全策略，放棄以對抗思維處理國家安全問題。具體上，印度傾向和美國接觸，也期望在巴基斯坦問題方面謀取與後者和解的可能，對於中國所釋放出的善意亦作出積極的回應。

中印關係在1998年的轉折之後快速升溫。2003年，中印關係進一步提升，雙方簽署「兩國關係原則和全面合作宣言」，確認將發展長期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印度在宣言中承認西藏自治區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此一宣言為中印兩國在新世紀發展睦鄰友好關係奠下了基礎<sup>212</sup>。

就中國而言，中國在世紀之交的經濟和軍事崛起已經造成美國的隱憂，面臨美國的防範和圍堵勢所難免。學者張亞中認為，美國在地緣政治上以「遏制」戰略來防堵中國的對外擴張。中國如果想突破地緣政治的遏制壓力，在軍事上必須有足以與美國及日本相抗衡的武力；在政治上必須得到周邊國家的支持。中國考量到國家發展的延續，幾乎沒有條件與任何國家為敵<sup>213</sup>。中國在外交上對印度採取「睦鄰政策」，在安全上則積極和印度建立「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CBMs)；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是必要的條件，印度作為中國鄰國和崛起中的大國，自然在中國外交中占有重要份量。

---

<sup>211</sup> 張雅君，〈印巴核武試爆後中國的南亞安全政策〉，頁29。

<sup>212</sup> 吳頌彬，〈中國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頁78。

<sup>213</sup> 張亞中，〈中國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季刊》，第3卷第2期(2002)，頁13。

後冷戰時期，中國最主要的威脅當然來自東北亞，美日新同盟關係為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提供了安全保障，反觀中國則從渤海、黃海、東海到南海都遭到美日安保的遏制。日本海軍位居世界第三強，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中國如果無法超越日本，根本無法成為亞洲的海洋強權，亦難以有穩固的區域霸權地位。在東南亞方面，儘管東協國家在經濟上有向中國傾斜的趨勢，但政治和軍事上依然和美國保持較密切的關係，東協國家並且與英國、俄羅斯、澳洲、印度等區域外大國簽有雙邊軍事合作協定。南海主權爭議更是中國與東協國家必須處理的棘手問題。就目前而言，東南亞國家似乎看不出任何將對中國採取「追隨政策」的跡象。

在中亞和俄羅斯方面，美國主導的北約東擴在 1994 年將中亞國家納入「和平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Peace, PTP)，直接意義在於壓縮昔日強權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空間，其間接意義則在於遏制中國向中亞發展的空間。北約東擴即便迫使俄羅斯加緊拉攏中國，但俄國與中國畢竟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文化與價值觀，冷戰期間彼此因為意識型態的短暫結合並不能掩飾兩個民族近代史上的不愉快經驗，從歷史上來看，俄國是中國最不能信任的鄰邦，即使是美國也早在 1949 年就認知到這一點。此外，中亞主要產油國家皆傾向和西方合作，一來因為自己無法開採能源，二來希望藉助西方資金加速本國的發展，三來希望引入西方勢力以抗衡俄國壓力，避免喪失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主權位置。與中國相鄰的三個中亞國家中，哈薩克與吉爾吉斯都與北約有和平夥伴關係的軍事互動，對中國而言，中亞鄰國並不真正可以信賴，它們對自身利害的考量遠遠超過雙方共同利害的認知<sup>214</sup>。

---

<sup>214</sup> 同前註，頁 17-22。

在南亞方面，美國藉由「反恐」改變外交戰略，積極佈局重新深入此地區，印度在放棄「對抗性」外交策略後，亦積極經營和美國的關係。因此，中國在南亞的最大安全利益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以促進該區域的情勢穩定為主。中國必須維護和平安定的周遭環境做為其發展經濟的基礎，中國南亞安全戰略的重點表現在對南亞各國實行全方位、不結盟、平衡性的「睦鄰外交」上，尤其在軍事上與印度建立「信心建立措施」<sup>215</sup>。近年來，中國睦鄰外交的內涵已經由原本簡單地與鄰國保持友好關係上升到更加強調「安鄰」和「富鄰」的境界<sup>216</sup>，這在中國對印度的睦鄰外交中亦得以看見。中國安鄰的主要訴求是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分歧，中印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雖依舊懸而未決，但是一連串的信心建立措施卻有效控制住邊界的情勢，中印 CBMs 具體的執行包括：邊界地區軍事人員定期會晤、軍事指揮官之間建立熱線聯繫、裁減軍隊、停止大規模軍事演習...等<sup>217</sup>。印度似乎感受到中國維持邊界穩定的誠意，印度國防部長在 2003 年也有「印中之間的糾紛已經有 99.9% 的解決，目前只剩下一些次要的問題還需要雙方繼續努力」的言論出現<sup>218</sup>，顯示雙方在邊界問題上已經有一定的默契。外界推測雙方在「法律原則」無法有效解決問題的共識上已將邊界問題的焦點集中在「為解決邊界問題確立指導性政治原則」方面。不僅如此，中國與印度在 2003 年舉行首度的海軍聯合搜救演習，也為雙方軍事合作關係開啓了另一扇大門。

在富鄰方面，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資料顯示，2004 年中國與印度雙方的貿易額已有 136 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印度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儘管此

---

<sup>215</sup> 鄭榮新，〈中國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之影響〉，頁 112。

<sup>216</sup> 吳頌彬，〈中國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頁 74。

<sup>217</sup> 張雅君，〈印巴核武試爆後中國的南亞安全政策〉，頁 20。

<sup>218</sup> 徐桂香，〈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12 卷第 4 期（2003），頁 44。

一貿易額相較於美中等其它大國之間的雙邊貿易額可以說微不足道，但是若與中印雙方在 1990 年僅 2.64 億美元和 2003 年僅 75 億美元的貿易額相較，則雙方的經貿關係已呈倍數成長<sup>219</sup>。

就印度而言，印度一直以來主要的外交政策和印巴衝突密不可分，積極而言，印度也期望能夠在南亞有所作為。1998 年印巴相繼核子試爆之後，印度的國家安全和外交策略產生明顯的轉變，由「對抗」走向「積極接觸」。因此和中國交好成爲印度外交上必然的選擇。早在 1970 年代，嚴重的經濟衝擊已經使得印度不得不尋求與美國以及其它西方國家改善關係。1980 年代初期，印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與美國的雙邊關係，美印高層開始互訪，美國在印度的投資亦大大增加。印度接受 World Bank 與 IMF 的貸款，貸款條件是重整經濟結構及改革總體經濟政策，印度政府開始減少干預市場，讓價格和收入符合市場機制，藉由一連串自由化和鬆綁政策，印度開始與資本主義體系接軌。1985 年起，印度政府許多自由化的具體措施陸續釋出，例如簡化發照、放寬價格限制、放寬外來投資、公有部門私有化...等。直到冷戰結束的這一段時期，印度可以說是被動性地和西方接觸。

1991 年，蘇聯瓦解對印度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印度在安全上頓失依靠；在政治上不結盟政策因爲兩極體系的崩解而失去依據；在經濟上則社會主義急速衰退，資本主義成爲主流。1990 年代中期，美國成爲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雙方互賴關係不斷加深<sup>220</sup>。美國在不斷增加對印度影響力同時，也不斷深化和中國的關係<sup>221</sup>，這使得印度的不安全感和「邊緣感」日

---

<sup>219</sup> 吳頌彬，〈中國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頁 78-80。

<sup>220</sup> 江啟臣，〈印度崛起的背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8 卷第 12 期（2005），頁 15-16。

<sup>221</sup> 胡敏遠，〈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5 期（2004），

深。美國忽視印度民主體制、縱容中國軍事擴張、同意出售中國超大型電腦高科技設備、嚴格管制和監督對印度的科技出口，均讓印度質疑。美國為確保中亞能源利益而在南亞政策上朝巴基斯坦傾斜，更讓印度無法忍受。不僅如此，冷戰時期蘇聯和印度的結盟關係也由於俄羅斯不再將印度放在對外政策優先位置而被棄置<sup>222</sup>，印度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開始自主性地選擇以核武作為追求國家戰略目標的工具<sup>223</sup>。

印巴相繼核子試爆後，印度驚覺若持續以對抗方式與中、巴對峙，國力發展將受到限制，在安全上也無法獲得真正的保障<sup>224</sup>。因此，印度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藉由改善與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大國的關係，降低印巴衝突的可能性<sup>225</sup>。印度積極向東南亞和東亞挺進，突破與中國的假想敵關係，並和中國進行軍事合作。國際戰略專家從未想到印度和中國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改變彼此的戰略思考。先前中國不僅暗助巴國發展核武，也在西藏部署針對印度的飛彈系統；修築從拉薩到青海、雲南、四川、甘肅的鐵路；在緬甸的海恩基(Hainggyi)、可可群島(the Coco islands)、阿基雅布(Akyab)、札迪基(Za Det Kyi)、墨吉(Mergui)、高克皮猶(Khaukphyu)進行空中雷達監控和建設海軍設施，更加強與印度周邊國家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緬甸、尼泊爾等國的軍事關係<sup>226</sup>。印度不僅和中國改善關係，亦藉由 9-11 事件積極修補核子試爆後被破壞的美印關係，當美國向全世界國家爭取反恐戰爭聯盟時，印度總理 Atal Bihari Vajpayee 立即站出來

---

頁 41。

<sup>222</sup> 陳鴻瑜，〈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2 期(2003)，頁 13。

<sup>223</sup> 張雅君，〈印巴核武試爆後中國的南亞安全政策〉，頁 23。

<sup>224</sup> 胡敏遠，〈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頁 44。

<sup>225</sup> 同前註，頁 50-51。

<sup>226</sup> 陳鴻瑜，〈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戰略意涵〉，頁 10。

表達支持美國的立場。

印度支持美國的反恐戰爭有多重利益考量。印度國內長期以來不斷遭受伊斯蘭恐怖組織的襲擊，背後支持這些恐怖組織的就是巴基斯坦，印度希望藉助美國的反恐力量抑制巴國對伊斯蘭恐怖份子的支持<sup>227</sup>，印度更進一步希望以「反激進宗教狂熱」為槓桿，將印巴衝突轉化為國際「反恐行動」的一部分，進而在印巴衝突的立場上占有不敗的位置<sup>228</sup>。此外，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對於亞太地區的安全體系有重大調整的跡象，南亞地區的戰略地位使印度成為美國亞太軍事部署的戰略據點之一。印度著名地緣政治學者 Madhav Nalapat 教授因此倡議成立一個由印度及美國主導、以亞洲民主國家和地區為主的「亞洲版北約」(NAATO)，據稱美國五角大廈支持此計畫者甚多，他們希望印度能成為美國未來潛在的軍事夥伴<sup>229</sup>。在和俄羅斯的關係上，印度也不因為和美、中關係交好而廢弛了印俄關係，印度深知不在美、俄之間選邊站反而可以抓住美、俄拉攏印度的胃口，使印度成為贏家。在新德里的盤算中，印度若能同時掌握住與美國及俄羅斯的良好關係，便能穩定印巴關係，或者至少能在南亞有效地牽制巴基斯坦的競逐地位。進一步而言，未來當美國與中國關係惡化時，正是印度市場取代中國大陸市場之另一契機<sup>230</sup>。

可以這麼說，印度在核試後於外交思維上有了大躍進，不再以對抗的思維解決安全問題，在外交上又如同二次戰後一般，和中國有了類似的思維，也以「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依歸，儘管印度

---

<sup>227</sup> 胡敏遠，〈從地緣戰略觀點研析「九一一事件」後印度的大國外交〉，《國防雜誌》，第 18 卷第 17 期（2001），頁 97。

<sup>228</sup> 胡敏遠，〈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頁 42。

<sup>229</sup> 徐桂香，〈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蒙藏現況雙月報》，第 12 卷第 6 期（2003），頁 37-38。

<sup>230</sup> 周茂林，〈解讀俄羅斯與印度聯合軍事演習〉，《戰略安全研析》，第 7 期（2005），頁 34。

採取「靈活外交」在時間上稍遲於中國，但是不可否認，印度踞有南亞次大陸的戰略中心位置使其在先天上比中國擁有更多籌碼走「平衡大國」的外交路線<sup>231</sup>，中國崛起亦為「印度崛起」提供了最佳的掩護。無論如何，印度在外交的新思維底下，也開始積極經營和中國的友好互動關係。

## 第二節 中俄關係：形成抗美同盟關係

中國和蘇聯在 1960 年代決裂，主因是雙方在意識型態上的差異日益突顯，以及 Nikita Khrushchev 對 Joseph V. Stalin 的批判引起毛澤東不滿所致。Mikhail Gorbachev 於 1989 年 5 月應邀訪問中國，鄧小平以「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終結長期以來充滿恩怨的中蘇關係<sup>232</sup>。同年的「天安門事件」及隨後的「蘇東波」巨變讓中國政權一度在國際情勢上岌岌可危，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所謂「二十八字方針」作為因應世局的基調；儘管以美國為首的 G7 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第一時間即聯合對中國實行包括經濟在內的各項制裁，但蘇聯當時不僅沒有參加對中國的制裁，反而積極推動中蘇關係向前發展<sup>233</sup>。1991 年蘇聯解體後，中國立即承認俄羅斯和其他獨立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派遣對外經貿部部長李嵐清訪俄，中俄雙方在莫斯科簽署「中俄兩國會談紀要」並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宣佈支持俄羅斯聯邦政府繼承前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sup>234</sup>。

---

<sup>231</sup> 周茂林，〈大象東進：後冷戰時期印度的戰略思維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4 期（2004），頁 19-20。

<sup>232</sup>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0 卷第 8 期（1997），頁 83。

<sup>233</sup> 李靜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學報》，第 2 期（2002），頁 101。

<sup>234</sup>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頁 83-84。

1992 年 12 月，俄羅斯總統 Boris Yeltsin 首次訪問中國，並簽署「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宣言」及 24 項相關協議，使雙方關係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此之前，中俄關係曾經一度短暫停頓，俄國獨立後實行一面倒的親西方政策，反觀中國也沒有將俄國置於其對外關係的重要位置<sup>235</sup>。中俄 1992 年的聯合宣言指出：「中俄相互視為友好國家」，並且「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兩國間一切爭端，相互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不利用同對方接壤的第三國領土、領水、領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並為此建立相應的對話機制」、「雙方不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軍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國締結任何損害另一方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的條約或協定；任何一方均不得允許第三國利用其領土損害另一方國家主權和安全利益」。此外，雙方也簽署了「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和加強軍事信任問題的諒解備忘錄」，Yeltsin 稱此次訪問「開啓了俄中關係的新紀元」<sup>236</sup>。

1994 年，江澤民應邀首度訪問俄國，其在雙邊會談中強調：「中俄都是大國，又是鄰國，我們兩國關係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後，逐步走向成熟。對抗和結盟都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才真正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發展，因而是最佳選擇」、「中國願同俄羅斯一道，站在面向二十一世紀的高度，共同構築兩國關係的未來，把兩國關係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使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精心培養和發展下去並帶入下個世紀，傳給我們的子孫後代」。江澤民在此次行程中也和俄國簽署「中俄聯合聲明」，將中俄關係進一步提升，定位為「建設性夥伴關係」，是「建

---

<sup>235</sup> 錢高陞，〈從中俄關係正常化論未來發展及對我之影響〉，《國防雜誌》，第 18 卷第 5 期（2002），頁 20。

<sup>236</sup>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頁 86。

立在和平共處各項原則基礎上完全平等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關係，既不結盟、也不針對第三國」<sup>237</sup>。

1996年，中國和俄羅斯再度簽署「中俄聯合聲明」，彼此關係進一步確立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的「戰略」意味長期性、全方位性；「伙伴關係」則是相對於「同盟關係」而言，「伙伴關係」是「朋友關係」而非「敵我關係」。中俄之間因此由暫時性、局部性的關係，轉變為長期性的全方位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形成的基礎在於雙方信任程度提高、彼此對國際問題的認知較接近、雙方協調機制相較於中俄和其他大國間更為完善等<sup>238</sup>。江澤民在簽約之後向記者闡述中俄友好關係的四點基礎：「第一，中俄毗鄰而居，互為最大的鄰國，增進信任、保持關係穩定發展，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第二，中俄都有巨大的國內市場，而且兩國目前都在不斷深化經濟改革，這為兩國合作提供了新的機遇；第三，中俄都是世界大國，又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兩國共同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發展，有助於世界更加繁榮與穩定；第四，中俄兩國人民有著傳統的友誼，彼此都希望成為好朋友、好鄰居、好夥伴，『這都是決定中俄關係走向的主導因素』」<sup>239</sup>，顯示出不論在安全、經濟、政治等各個層面，中俄之間均具有成熟的合作條件。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且主要以四項機制來實際運作：（1）中俄兩國國家元首每年分別在莫斯科和北京各會晤一次；（2）成立兩國總理委員會，每年分別於雙方首都各會晤一次；（3）雙方外交部長會晤機制，必要時隨時進行會晤磋商；（4）建立中俄領導人之間的電話熱線，就重大問題隨時交換意見<sup>240</sup>。

---

<sup>237</sup> 同前註，頁 87。

<sup>238</sup> 連弘宜，〈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東亞政策-析論俄中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況〉，《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2006），頁 93。

<sup>239</sup>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頁 88。

<sup>240</sup> 丁永康，〈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戰略關係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3），

中俄能建立起更緊密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就中國而言，中國主要考量幾點因素：(1) 美日新安保體制的確立與 1996 年 3 月台海危機讓中國在安全上倍感壓力；(2) 避免台灣和俄羅斯產生實質外交關係；(3) 實現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政策；(4) 穩定北部邊疆；(5) 推動與俄羅斯的貿易關係；(6) 以中俄關係平衡中美關係，藉由打「俄國牌」，增加對美關係的主動性和靈活性。

就俄羅斯而言，俄國主要考量幾點因素：(1) 重新定位外交政策，由全面親西方的外交政策走向振興俄國的大國外交政策；(2) 維護周邊安全環境；(3) 進入亞太經濟圈；(4) 參考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尋求俄國經濟發展的出路（冷戰結束後，俄國經濟一蹶不振，通貨膨脹居高不下，「休克療法」、自由經濟、美國經援，皆無法扭轉俄國持續惡化的經濟，在人民漸感不耐的情況下，俄共大有捲土重來之勢；Yeltsin 因此到北京取經，一方面推崇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一方面則希望「搞有俄羅斯特色的市場經濟」）；(5) 以俄中關係平衡俄美關係，尤其要讓美國及歐盟國家知道俄國對北約東擴的疑懼和不滿<sup>241</sup>。

2000 年 7 月，Vladimir Putin 以俄羅斯總統身份首次訪問北京，表示將承繼 Yeltsin 的對中政策，在現有基礎上促進兩國關係繼續向前發展，江澤民認為該次會晤是中俄關係「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重要會晤<sup>242</sup>。2001 年 7 月，中俄雙方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一方面將過去十年的

---

頁 88。

<sup>241</sup> 孫國祥，〈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頁 89-91。

<sup>242</sup> 李靜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頁 105。

中俄關係作了歸結<sup>243</sup>，一方面也為未來長遠發展的中俄關係在政治、戰略上奠定法律基礎。中俄追求建立一條和平邊界，讓兩國人民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並且為實現一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努力。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總計 25 條，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四不、一尊重、一承認」。其中「四不」指的是：(1) 不使用武力，不採取任何施壓手段，兩國間出現的分歧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包括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和互不將戰略核導彈瞄準對方；(2) 該條約的締結不針對任何第三國；(3) 該條約的締結不意味著中俄兩國的聯盟，尤其是軍事上的聯盟；(4) 不對抗。「一尊重」指的是：相互尊重各自的發展道路。「一承認」指的是：承認各自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相互對對方沒有領土要求。條約規定，中俄兩國關係是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是以法律形式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新型國家關係。條約還規定了兩國今後在政治、經濟、貿易、科技、文化和國際領域合作的原則和方向，是兩國發展長期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的指針<sup>244</sup>。

美軍在 9-11 事件後進駐中亞。事實上，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可以溯及 1997 年，9-11 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已經在中亞進行多次聯合軍事演習。美國在受到恐怖攻擊之後藉由「全球反恐戰爭」的策劃積極推行新的中亞戰略<sup>245</sup>，位居中亞戰略心臟位置的烏茲別克首先向美國靠攏，塔吉克和吉爾吉斯亦積極邀請美軍進駐，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威望受挫，「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向心力亦因此大打折扣<sup>246</sup>。

---

<sup>243</sup> 張錫模，〈俄中關係：管理俄羅斯的霸權衰退〉，《中國事務》，第 7 期（2002），頁 26。

<sup>244</sup> 丁永康，〈21 世紀初中俄戰略關係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2003），頁 90。

<sup>245</sup> 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2005），頁 137。

<sup>246</sup> 同前註，頁 138。

中俄關係在受到美國壓力的情況下受到制約，中俄一方面在地緣政治上更加堅定以「背靠背，穩定一翼」的「戰略聚合」(strategic convergence)，對抗由美國所主導的「單極世界」秩序<sup>247</sup>，一方面也認知到在現階段和美國的關係更重要於和彼此的關係，中亞複雜的情勢使得團結亞洲陸地國家的構想在現實中顯得不堪一擊。美國在中亞的直接軍事存在對俄、中所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而言是一項嚴重的全球與區域戰略挑戰，但是俄、中對於此一情勢卻未進一步抵制，美俄中三角由此產生了多種變化與多重競合的可能性<sup>248</sup>。

2005年8月，中國與俄羅斯在海參崴、山東半島及黃海等地舉行代號為「和平使命-2005」的聯合軍事演習，此次軍演是新世紀以來中俄第三次聯合軍演，也是歷來規模最大的聯合軍演。如同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認為：「這次演練將同時產生立即和長遠影響」。此次軍演可以從幾個面向加以觀察，就雙方而言，首先，中俄雙方欲藉由聯合軍演嚇阻美日。美國勢力進入中亞已經對俄羅斯和中國在戰略上造成極大影響，俄羅斯向來認為中亞是其勢力範圍，中國則面臨美國在亞太和中亞兩面圍堵的局面；再者，中俄雙方亦欲藉由聯合軍演增進彼此的關係。表面上看似熱絡的中俄關係實際上呈現「上冷下熱」的狀態，高層領導之間關係熱絡，民間、政府基層之間則關係冷淡，兩國彼此間的形象亦不佳，雙方政府部門均有工作人員抱怨對方不友好、不合作。中國始終無法和俄國建立起一個完全信任的關係，俄國對中國的崛起亦一直存在芥蒂，尤其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防範重重。此外，俄國欲藉由此次軍演向中國兜售武器。中國向來是俄國武器出口第一大客戶，俄國必須積極爭取中國的武器訂單以防一旦歐盟對中軍售解禁政策生效，俄國獨占中國軍事供給的角色將被打破。就中國而

<sup>247</sup> 丁永康，〈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戰略關係分析〉，頁 86。

<sup>248</sup> 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頁 150。

言，兩次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讓中國見識到美軍資訊化作戰能力，中國若再不提升現代化戰爭能力，一旦遭遇現代化戰爭，將只是任人宰割而已；可供其學習的只有俄國，美國、法國、英國則沒有興趣與共軍分享他們的心得。共軍聯合軍演的另一個用意，則是威嚇台灣，此次軍演演重點在海上封鎖、兩棲登陸、強制隔離作戰，不難看出具有針對性，很像是一次對台作戰的預演<sup>249</sup>。

俄羅斯獨立後在外交上大致可以劃分成三個主要階段，即 1992-1995 年以俄國外長 Andrei Kozyrev 為代表執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1996-1999 年以俄國外長 Evgeniy Primakov 為代表執行的東西方並重「全方位」外交政策；以及 2000 年至今以 Putin 總統為代表執行的更加重視獨立國家國協與更加強調東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

比較 Putin 總統和先前俄國外交政策的不同之處在於：（1）適度縮減對外政策目標範圍以達成目標與手段間的平衡。先前的「一邊倒」外交政策過度強調意識型態和戰略利益與西方的一致性，使國家利益遭受巨大損失，「全方位」外交政策則目標過於遠大，不符合俄國國力，使俄國在外交上失去依據；（2）固守核心利益而在其它領域容許作出較大讓步，避免在無法獲取顯著國家利益的情況下付出無謂的經濟代價；（3）對外政策緊扣保障國家安全及發展國家經濟這兩個主軸前進。Putin 總統於 2000 年 7 月批准面向二十一世紀「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念」，由該份文件可歸結出俄國新世紀的對外關係優先順序：（1）亞洲對俄國外交愈形重要，而中國顯然為此一區域外交重點；（2）俄中兩國「對國際政治的關鍵問題原則上態度是一致的」，俄與歐美在某些議題上則有分歧；（3）俄羅斯將發展

---

<sup>249</sup> 張如倫，〈中俄聯合軍事演練之意涵〉，頁 5-11。

與中國和政治關係相對等的大規模經濟合作<sup>250</sup>。新世紀之初，中國在外交戰略上亦將俄羅斯視為主要拉攏的對象。在國家安全方面，俄羅斯是中國漫長陸地邊界安全與穩定的直接作用因素。在國際政治方面，俄羅斯仍然在世界格局重組過程中扮演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保持地區和全球力量均衡、牽制美國等對中國壓力方面有著重要價值<sup>251</sup>。

「北約東擴」是中俄保持友好關係的一個主要動因。早在 1990 年 10 月東西德統一時，北約即已在實質上向東擴張，將東德領土併入其範圍之中。冷戰結束後，從共黨集團解放的波蘭、捷克與匈牙利率先於 1991 年 10 月提出加入北約的要求。1992 年的波士尼亞危機震撼西歐國家，中東歐國家領袖再度藉此機會持續強烈提出加入北約的呼籲。美國總統 Clinton 在 1994 年 1 月北約高峰會上首次表明北約東擴不再是 *whether* 的問題，而是 *when* 與 *how* 的問題，該次高峰會宣言也明白表示，北約期望並將歡迎擴張。1999 年北約慶祝成立 50 週年的華盛頓高峰會上，波蘭、捷克、匈牙利如願加入北約<sup>252</sup>。2000 年 11 月，北約高峰會首度移師前華沙公約國家捷克召開，並在布拉格會議中決議邀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加盟。2004 年 3 月，上述七國向北約正式遞交加盟文件，北約完成最大規模的擴充行動，會員國增至二十六國。隨著北約東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影響力挺進到原蘇聯的勢力範圍，俄羅斯的軍事威脅力量因此被限制在最低水平<sup>253</sup>，穩定俄中邊境因此對俄羅斯集中全部精力對付北約東擴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

<sup>250</sup> 連弘宜，〈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東亞政策〉，頁 74-92。

<sup>251</sup> 丁永康，〈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戰略關係分析〉，頁 94-95。

<sup>252</sup> 甘逸驊，〈北約東擴：軍事聯盟的變遷與政治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4 期（2003），頁 12-15。

<sup>253</sup> 丁永康，〈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戰略關係分析〉，頁 85-86。

中俄關係未來主要的限制在於雙方經貿表現難有顯著進展。中俄貿易與中日、中美貿易相較顯得微不足道，雙方亦沒有彼此投資的意願。中國一直希望將上海合作組織升格為經濟合作組織，但俄國對此不甚積極，俄國認為上海合作組織成為經濟合作組織後，中國對上合組織的影響力將大增。中國專家歸結中俄經貿發展遲緩的主要幾點因素：(1) 在經貿領域缺乏大型合作項目；(2) 中國假冒偽劣商品在俄國造成惡劣影響；(3) 兩國有實力的企業普遍不願意到對方開展業務；(4) 不規則的民間貿易給兩國經濟合作帶來各種難題。兩國市場經濟並不發達，特別是俄國人民的市場觀念並不成熟。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雙方貿易要達到預期的目標具有相當的困難度<sup>254</sup>。

### 第三節 俄印關係：印度靈活外交的主導

印度的「不結盟」外交政策在 1950 年代中期產生質變，由不向美國或蘇聯靠攏轉變成親近蘇聯。印度一直希望在大國之間占有一席之地，這樣的企圖最終還是必須藉由在兩極陣營中靠向一方才有可能實現。或許是對殖民者的反感，也或許是民族的獨立性<sup>255</sup>，印度選擇向共產主義陣營靠攏。1955 年，印度和蘇聯的領導高層互訪，雙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共識，特別是蘇聯在喀什米爾(Kashmir)問題上公開表示支持印度，使得雙方關係更形密切，蘇聯也開始向印度提供巨額經濟、軍事援助。1971 年，印度和蘇聯簽署「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雙方關係進一步具有「準軍事同盟」性質。1986 年，蘇共領導人 Gorbachev 訪問印度，印俄雙方發表「德里宣言」，宣稱兩國在全球利益方面具有一致的立場<sup>256</sup>。冷戰結束後，印

---

<sup>254</sup> 張如倫，〈中俄聯合軍事演練之意涵〉，頁 15-16。

<sup>255</sup> 胡志勇，《文明的力量-印度崛起》（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年），頁 79。

<sup>256</sup> 同前註，頁 211-212。

度和俄羅斯的關係一度處於停頓狀態，俄羅斯經濟待西方奧援，自然無暇再顧及俄印關係。

1993 年，俄羅斯總統 Yeltsin 訪問印度，雙方簽署「印俄友好合作條約」，重新拾起冷戰時期的友好關係。「印俄友好合作條約」取消原本和平友好條約中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條款，建立新型「戰略夥伴」關係<sup>257</sup>，俄羅斯再次表達支持印度在喀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並贊成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一員。1997 年，印度與俄羅斯宣佈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雙方關係進一步深化。Putin 上任後，俄羅斯的外交戰略由「大國外交」走向更加務實的「等距外交」，俄印關係也因此有了新的發展。2000 年，俄印簽署「印俄戰略夥伴宣言」。2002 年，兩國又簽署「關於進一步加強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德里宣言」等多項文件<sup>258</sup>。「德里宣言」可說是界定新世紀兩國關係的重要文件，雙方決定「要將彼此間的戰略夥伴關係提升到新的高度」，並同意「進一步推進雙邊合作及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以面對全球化挑戰並減輕其負面效應」<sup>259</sup>。2004 年，Putin 總統訪問印度，印俄雙方簽署了 11 項協議，期望在安全、政治、金融、能源、科技等各個方面有更進一步的合作<sup>260</sup>。2005 年，印俄舉行聯合軍事演習，儘管此次軍演也可以被當作是「大國建立夥伴關係熱」的一個現象，但就另一個角度而言，印俄聯合軍演也意謂「大國權力平衡」戲碼即將登場<sup>261</sup>。

就俄羅斯而言，印度無疑是其最忠實可靠的朋友，不僅在冷戰時期是如此，在新世紀之初依然是如此。在安全方面，印度和俄國地緣上並無接

---

<sup>257</sup>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國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2003 年），頁 89。

<sup>258</sup> 徐桂香，〈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頁 32。

<sup>259</sup> 蔡東杰，《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 年），頁 66。

<sup>260</sup> 胡志勇，《文明的力量-印度崛起》，頁 271-272。

<sup>261</sup> 周茂林，〈解讀俄羅斯與印度聯合軍事演習〉，頁 32。

壤，印度的軍事力量增強並不會對俄國安全造成直接影響，況且印俄雙方在戰略部署、軍事部署、建軍規劃、武器採購等方面也有著長期深入的合作<sup>262</sup>，俄印交好一方面可以破除北約東擴對其所造成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也可防堵中國軍事崛起後所可能產生的威脅，冷戰時期俄羅斯和印度聯手抑制中國即是前例。在政治方面，俄羅斯新世紀的外交不論是實行「全方位外交」或是「等距外交」，和印度維繫友好關係無疑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與美國共治全球、與西方平起平坐的大夢破碎之後，俄羅斯更加需要依靠印度以維繫其在大國之間的政治地位。在經濟方面，俄羅斯的科技成果與印度的軟體工業若能結合將甚具發展潛力<sup>263</sup>。此外，印度社會迄今依然沿襲冷戰時期的氛圍，對俄羅斯具有某種程度的好感<sup>264</sup>，俄羅斯和印度之間的友誼因此可以具有更加堅實的基礎。

就印度而言，俄羅斯一直是個重要的朋友，雙方具有全方位的合作關係。在安全方面，俄羅斯軍火在印度市場維持著半壟斷地位，雙方軍事交流有助於印度軍事技術的進步，俄羅斯提供的頂尖武器促成了印度軍備的現代化。印度雖然不必如同俄羅斯或中國一般視美國為安全威脅<sup>265</sup>，但是印度依然有巴基斯坦這個外在環境壓力並且有欲稱霸南亞的雄心。在政治方面，印美關係的提升勢必會對印俄關係造成影響，印俄之間由「唯一特殊」友好關係轉變成「一般特殊」友好關係。自印度決定經濟改革後，維繫和美國的關係相對而言顯得更加重要，美國不僅可以提供印度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和市場，美國亦可以左右國際組織提供印度奧援的意願。1994年5月，印度總理 Narasimha Rao 打破慣例先訪華盛頓才訪莫斯

---

<sup>262</sup> 劉復國，〈印度與亞洲新戰略態勢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4期（2005），頁42-43。

<sup>263</sup> 徐桂香，〈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頁35。

<sup>264</sup> 劉復國，〈印度與亞洲新戰略態勢分析〉，頁42-43。

<sup>265</sup> 徐桂香，〈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頁36-37。

科，已經充份顯示出印度重視印美關係的立場<sup>266</sup>。只是，印度和俄羅斯在政治上依然具有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西方民主價值在意識型態上未必能讓印度完全接受，因此和俄羅斯在某些議題上共同對抗美國依然是印度維繫和俄國關係的重要基礎。此外，印度也需要俄羅斯幫助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未來印俄關係發展受到美國因素影響甚鉅。美國鑑於冷戰時期的經驗並不太願意看到印度和俄羅斯走得太近。印度在經濟上對美國有期待，在印巴衝突上也希望獲得美國的理解，對於美印關係的重視溢於言表，俄羅斯則在經濟復興方面更是離不開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印俄關係因此勢必要被更加彈性的處理。印度在此方面的表現另人耳目一新，例如在 NMD 計劃爭議中，印度一方面支持小 Bush 政府的 NMD 計劃，一方面也附和俄國的立場，強調反對單方面廢除「反彈道飛彈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的立場<sup>267</sup>，又例如印度一直以低調的方式處理 2005 年的印俄聯合軍演<sup>268</sup>。此外，印俄關係在內部因素方面由於雙方的經濟實力皆不足，貿易關係上難以在短期內有明顯的突破，這使得印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制約<sup>269</sup>。

冷戰結束後，中國、印度、俄羅斯的結合一方面可以視為是傳統陸權的結合，一方面亦可以視為是「靈活外交」、「大國外交」、「睦鄰外交」的實踐。中國的「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隨著其經濟力的提升愈顯「得心應手」，其睦鄰外交甚至朝向「安鄰」、「富鄰」的目標邁進；印度在核

---

<sup>266</sup> 方天賜，〈印度實施經濟改革以來的外交走向〉，《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4 期（2001），頁 92。

<sup>267</sup> 同前註，頁 94。

<sup>268</sup> 周茂林，〈解讀俄羅斯與印度聯合軍事演習〉，《戰略安全研析》，第 7 期（2005），頁 34。

<sup>269</sup> 王良能，〈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國的觀點〉，頁 93-94。

子試爆後也放棄「對抗」的外交策略，開始以「平衡大國外交」、「靈活外交」為自身發展爭取更加穩固而有利的條件；俄羅斯則在一連串調整後終於能以更加務實的「等距外交」、「重視獨立國協成員」謀求其外交上的平衡。三個國家外交策略的改變與其說是權力平衡考量，不如說是經濟發展所需。某種程度而言，三國結合意味著他們欲接受美國的主流價值，而不是抵抗美國的「超強」權力。只是，中國、印度、俄羅斯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 40%，領土占世界陸地總面積 22.5%；在七個公開擁有核武的國家中，中國、印度、俄羅斯占了三席；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具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印度也極有可能在改革後的安理會取得一席。儘管現階段這三個國家依然難以抵抗與美國交往的利益，總體力量亦不足以抗衡美國，但是隨著三個國家的實力漸增<sup>270</sup>，未來此一三角戰略結合會不會從經濟發展的考量轉變成權力平衡的考量，則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

<sup>270</sup> 方天賜，〈中印俄戰略三角的發展及可能性評估〉，《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5 期（2005），頁 27-32。

## 第六章 結論

早在 2004 年，美國前國務卿 Henry A. Kissinger 在其所撰寫的〈變化不定的全球秩序〉(The Global Order in Flux)一文中即曾經提到：「…當今的熱門話題與同時代的其他國際巨變相比，顯得微不足道。世界事務的重心正向太平洋轉移，幾乎所有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成員都在調整自己的角色」。確實，世界權力的重心已經逐漸由西方轉移到東方。東亞區域研究因此愈來愈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蔡東杰教授曾經說過：「東亞相較於其它區域具有更複雜的權力平衡內涵」。對照起東亞大國競爭日益激烈與區域主義發展明顯遲緩的現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東亞確實沒有從權力平衡過渡到集體安全甚或是全球化思維之明確方向。鑑於東亞區域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日益增加以及權力政治對於東亞局勢的宰制力不減反增，本論文擬以權力平衡理論為途徑，研究東亞的權力政治結構，並且在戰略三角理論的框架下分析東亞的權力平衡發展。

權力平衡理論是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理論。權力平衡的意義甚多，學者 Inis L. Claude, Jr.即以爲：「權力平衡的問題不在於它不具任何意義，而在於它擁有過多的意義」；Ernst B. Haas 認爲權力平衡造成的誤解太多，主要原因是它的概念內涵沒有得到適當的澄清；林碧炤教授認爲人們常對權力平衡產生誤解，是由於權力平衡作為一項政策、現象、解釋各有其不同的內涵。謝奕旭對於權力平衡的定義可充份表達出權力平衡的意涵，其認爲：「權力平衡是一種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在追逐權力的互動過程，而此一過程是尚未發生戰爭與衝突前的狀態」。從政治的觀點看待權力平衡，可以分成主觀和客觀兩個面向。主觀的權力平衡是盡量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權力不平衡，客觀的權力平衡則是國際社會追求均勢的現象。「戰略

三角」是冷戰時期國際關係學者們用來檢視美國、蘇聯、中國之間相互關係的一個架構，Lowell Dittmer 是首先將「戰略三角」理論化的研究者，他認為「戰略三角」依據三方相互間友善（Amity）或敵對（Enmity）的關係可以分成「三邊家族」（M'enage a trois）、「羅曼蒂克」（Romantic）、「結婚」（Marriage）、「單位否決」（Unit-veto）等四種類型，三邊家族型代表三方均維持正面友善的關係、羅曼蒂克型代表主要的一方(pivot player)與另外兩方(two wings)維持友善的關係，與主要的一方維持友好之另外兩方則呈現相互敵對的關係、結婚型是兩方維持友好的關係，並與第三方交惡、單位否決型則是三方交惡的局面。

本論文舉出三個具有指標意義的戰略三角結構，分別是「美國－日本－中國」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日本－中國－東協」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中國－印度－俄羅斯」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期望能夠對東亞的權力平衡結構發展，作出最貼近事實的分析和預測。

「美國－日本－中國」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是現今東亞權力結構的主要形態。儘管中國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快速崛起有可能對美日關係構成威脅，但是 1996-97 年的「美日同盟再定義」已經為此一戰略三角結構奠定了基調，美日兩國選擇藉由彼此結盟以捍衛自身位於東亞的國際政治權力，而不是選擇和新興強權妥協並分享國際政治權力。將「美國－日本－中國」的三角關係套入戰略三角中，可以發現美國在美日關係和美中關係中具有主導權，並且在日中關係難以改善的情況下坐穩「羅曼蒂克」型中一方與另外兩方交好的有利位置，預料未來美國將重拾早先 Kissinger 等人的主張，對日本和中國採取平衡政策，以便在東亞獲取最大的利益。就現階段而言，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的不確定性讓美國的威脅感大增，在主觀的權力平衡是盡量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權力不平衡之前題下，美國選擇鞏固

美日同盟，並且對中國採取交往和圍堵的兩手策略，似乎是明顯而合理的選擇。

「日本－中國－東協」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可供觀察的是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競爭關係。中國以不輸出經濟成功發展經驗回應世人「模式威脅論」的質疑，足見由「誰」引領經濟發展確實對於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具有根本性的影響。儘管東亞戰後的發展被視為是以日本為首的雁行模式之實踐，但是中國在世紀之交的經濟崛起無疑已經對雁行模式的國際分工狀態以及日本在東亞的權力作用產生實質威脅。未來東協的態度以及東協是否對中共採取「追隨政策」是東亞日後由「誰」引導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究竟是在「體系結構變遷」的情況下成為東亞霸主，還是在「體系次序重構」、「區域霸權更迭」的情況下成為東亞霸主，或是有其它可能，亦是一個可供討論的議題。無論如何，日本和中國在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下競逐主導權的結果不啻在日本、中國、東協之間形成某種程度的「小三角」狀態。

「中國－印度－俄羅斯」所組成的戰略三角結構亦可以放在全球層次底下加以觀察。世紀之交，中國、印度、俄羅斯的關係日趨緊密，這一方面可以視為是傳統陸權的結合，一方面亦可以視為是「靈活外交」、「大國外交」、「睦鄰外交」的實踐。中國的「大國外交」和「睦鄰外交」隨著其經濟力的提升愈顯得「得心應手」，其睦鄰外交甚至逐漸朝向「安鄰」、「富鄰」的目標邁進；印度在 1998 年核子試爆後，也放棄了「對抗性」外交策略，開始以「靈活外交」、「大國外交」為自身發展爭取更加穩固而有利的條件；俄羅斯在一連串調整之後終於能以更加務實的「等距外交」（包括更加重視獨立國協國家）謀求其外交上的平衡。三個國家外交策略不約而同的改變與其說是權力平衡考量，不如說是順應時勢、配合經濟發展的結

果。某種程度而言，三國的結合意味著他們欲接受美國的主流價值，而不是抵抗美國的「超強」權力。只是，中國、印度、俄羅斯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 40%，領土占世界陸地總面積 22.5%；在七個公開擁有核武的國家中，中共、印度、俄羅斯占了三席；中共和俄羅斯都是具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印度也極有可能在改革後的安理會取得一席，三個國家的結合不免引人注目。儘管現階段這三個國家依然難以抵抗與美國交往的利益，總體力量亦不足以抗衡美國，但是隨著三國的實力漸增，未來此一戰略三角結合依然具有由鬆散而緊密、由經濟發展考量轉變成權力平衡考量、由「單位否決」轉而往「三邊家族」的方向發展之可能

美國前國務卿 Kissinger 曾經預測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體系將至少包括六個主要強權，分別是美國、歐盟、日本、中國、俄羅斯、印度<sup>271</sup>。對照現今「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此一預測可以說具有相當的可信度。六個主要強權中，除了歐盟外的其他五個強權皆得以對東亞權力結構發揮明顯而直接，至少是潛在而間接的作用。美國是在東亞擁有龐大利益的當今「世界霸權」，其在東亞的領導地位從戰後至今依然被牢牢維持，其未來支配東亞的抱負亦無庸置疑；日本和中國是位居東亞區域內的強權，在東亞權力競逐的舞台上，他們是不可或缺的必然主角；俄羅斯和印度因為地緣關係，對於東亞也具有難以估計的潛在影響力；歐盟和東亞的關係較為淺薄，六個主要強權中，歐盟相較之下對東亞並沒有明顯的企圖心。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Zbigniew Brzezinski 在其名著《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當中提到，東亞地緣政治的場景正在產生結構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包括：

---

<sup>271</sup> 胡敏遠，〈從地緣戰略觀點研析「九一一事件」後印度的大國外交〉，《國防雜誌》，第 18 卷第 17 期（2003），頁 94。

- (一) 中國已在興起，極可能稱霸一方。
- (二) 美國的安全角色變得越來越依賴與日本合作。
- (三) 日本正在摸索更明確、自主的政治角色。
- (四) 俄羅斯的角色已大大消退，從前由俄羅斯統治的中亞，已成為國際爭逐的標的。
- (五) 朝鮮半島的分立越來越難保持，使得韓國未來走向大受主要鄰國地緣戰略關注。<sup>272</sup>

就 Brzezinski 的觀點而言，對東亞具有實質或潛在影響力的五個強權中，美國霸權正在衰退、日本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中國正在崛起並且極有可能成為東亞區域強權、俄國霸權已經消失、印度則不在東亞權力平衡結構發展的主要考量範圍之內。

東亞權力平衡結構發展最主要的動因是中國經濟和軍事的崛起以及美國霸權的衰退。中國成為東亞區域強權已經是現實，美國在東亞的霸權角色實際上也越來越難以維持。在中國崛起見容於印度和俄羅斯而不見容於美國和日本的情況之下，未來東亞的權力平衡結構不脫出「美國－日本－中國」－「日本－中國－東協」－「中國－印度－俄羅斯」的複合架構發展軌跡，一旦中國崛起所產生的威脅讓印度和俄羅斯無法接受，則東亞權力平衡結構亦有可能有其它的發展，在美國霸權迅速衰退的情況下，由日本、印度、俄羅斯所組成的圍堵圈未必不是中國在未來所必須面對。除此之外，在中國崛起下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是否可能恢復、在區域整合運動下制度化的「多邊安全機制」是否可能建立(尤其是在日本具有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實力和企圖的情況下)，亦是未來東亞不無可能的發展方向。

---

<sup>272</sup>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文化公司，1998年)，頁210。

參考文獻：

中文專書

Gerald L. Curtis 編，高一中、黃俊彥、葉采青譯。2002 年。《美日關係的新觀點》，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Inis L. Claude, Jr. 著，張保民譯。1976 年。《權力與國際關係》，台北：幼獅文化

Joseph S. Nye Jr. 著，蔡東傑譯。2003 年。《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文化

K.J. Holsti 著，李偉成、譚溯澄譯。1988 年。《國際政治分析架構》，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aul Kennedy 著，張春柏、陸乃聖主譯。1995 年。《霸權興衰史—1500 至 2000 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Robert O. Keohane 著，蘇長和、信強、何曜譯。2001 年。《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Wayne Bert 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2005 年。《孰者勝出：美國與中國在東南亞之爭》，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1998 年。《大國政治》，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丁松泉著。2005 年。《中國崛起與中美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良能著。2002 年。《中共的世界觀》。臺北：唐山出版社

王良能著。2003 年。《印巴關係與南亞安全：中共的觀點》，台北：唐山出版社

王高成著。2005 年。《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王堯鈞著。2006 年。《進出戰略三角—認同台灣的國際政治學》，臺北：翰蘆圖書公司

王樹春編。2005 年。《冷戰後的中俄關係》，北京：時事出版社

王瑩著。2005 年。《日本對華 ODA 的戰略思維及其對中日關係的影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1999 年。《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向駿主編。2006年。《二〇五〇中國第一？權力轉移理論下的美中台關係之迷思》，台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江振寰編。2006年。《美國與20世紀亞洲的衝突和戰爭》，重慶：重慶出版社
- 西原正編，楊連仲等翻譯。2002年。《美日聯盟的新挑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 余杰著。2005年。《百年中日關係沈思錄》，香港：三聯書店
- 吳東林著。2002年。《巨變中的強權戰略》，台北：時英出版社
- 李建民著。2005年。《冷戰後日本的「普通國家化」與中日關係的發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新華經銷
- 李齊芳著。2001年。《中俄關係史》，臺北：聯經出版
- 周衛平著。2006年。《百年中外關係系列叢書：百年中印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胡志勇著。2006年。《文明的力量－印度崛起》，北京：新華出版社
- 胡春惠、宋成有主編。2003年。《東北亞發展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紅螞蟻圖書
- 倪世雄著。2004年。《中美國家利益比較》，北京：時事出版社
- 宮崎正弘著，李明峻譯。2003年。《美中對決的時代來了》，臺北：前衛出版社
- 張亞中、孫國祥著。1999年。《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臺北：生智文化
- 張啓雄主編。2002年。《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臺北：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畫
- 張敏秋主編。2004年。《中印關係研究：1947-2003》，北京：北京大學
- 張登及著。2003年。《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中的大國定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出版社
- 張歷歷著。2006年。《百年中外關係系列叢書：百年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曹雲華著。2005年。《新中國-東盟關係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莫大華主編。2002年。《亞太安全的理論與實踐：台灣的角色與作為》，臺北：遠景基金會
- 許志嘉著。2004年。《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臺北：生智文化出版、揚智文化總經銷

陳月娥著。2005年。《近代日本對美協調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陳勇著。2006年。《新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一體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鴻瑜著。2006年。《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臺北：翰蘆圖書公司

陳繼東著。2005年。《當代印度對外關係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陸俊元著。2005年。《地緣政治的本質與規律》，北京：時事出版社

傅建中著。1999年。《季辛吉祕錄》，臺北：時報文化

傅夢孜著。2005年。《中美戰略關係新論》，北京：時事出版社

傅驪元著。2005年。《亞洲的崛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喬林生著。2006年。《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北京：人民出版社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2005年。《轉型中的俄羅斯對外戰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黃興濤著。2005年。《美國的中國形象》，臺北：花神出版社

楊闖、高飛、馮玉軍著。2006年。《百年中外關係系列叢書：百年中俄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熊志勇著。2006年。《百年中外關係系列叢書：百年中美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熊沛彪著。2005年。《近現代日本霸權戰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劉建飛、林曉光著。2006年。《政治文化與21世紀中美日關係》，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潘光、胡鍵著。2006年。《21世紀的第一個新型區域合作組織-對上海合作組織的綜合研究》，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蔡東杰著。2007年。《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鄭海麟著。2005年。《台灣問題與中日關係論集》，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閻學通、金德湘主編。2005年。《東亞和平與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

戴曉芙、郭定平主編。2005年。《東亞發展模式與區域合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聯合報編譯。2000年。《中美交鋒》。臺北：聯經出版社

關中著。2003年。《認識美國霸權主義》，臺北：民主文教基金會

中文期刊

- 丁永康。2003年。〈二十一世紀初的中俄戰略關係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2期，頁81-97
- 丁樹範。2005年。〈美國國防部「2005年中國軍力」報告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4期，頁6-8
- 方天賜。2001年。〈印度實施經濟改革以來的外交走向〉。《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4期，頁81-96
- 方天賜。2005年。〈「中印俄戰略三角」的發展及可能性評估〉。《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5期，頁20-33
- 王少普。2003年。〈中國的崛起與對日關係〉。《世界經濟研究》，2003年第12期，頁4-9
- 王帆。2005年。〈中美之間的認識差異-美國視角分析〉。《外交評論》，第85期，頁75-80
- 王佳煌。2004年。〈雁行理論與日本的東亞經驗〉。《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頁1-31
- 王定士。2000年。〈戰略三角互動對俄中關係的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81卷第2期，頁101-134
- 王海運。2005年。〈深化中俄關係的戰略意義〉。《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3期，頁5-8
- 王毅。2005年。〈亞洲區域合作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第80期，頁56-60
- 王緝思。2005年。〈美國霸權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第84期，頁13-16
- 王樹春。2006年。〈論「經濟外交」視野下的中俄關係〉。《外交評論》，第89期，頁58-63
- 左鳳榮。2006年。〈順利發展的中俄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4期，頁35-38
- 任潭。2000年。〈美、日同盟安保新架構之研析〉。《國防雜誌》，第15卷第10期，頁26-34
- 朱奕嵐。2005年。〈從CEPA到區域政治經濟戰略-中國區域整合戰略與美國東亞戰略佈局之矛盾〉。《兩岸與國際事務》，第2卷第1期，頁49-80
- 朱雲鵬、林美萱。2002年。〈雁行理論是否仍適用於東亞發展〉。《國家政策論壇》，

第 2 卷第 3 期，頁 162-170

江啓臣。2005 年。〈印度崛起的背後〉。《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8 卷第 12 期，頁 14-18

江瑞平。2004 年。〈論中日經濟關係發展的新階段〉。《外交學院學報》，第 77 期，頁 93-98

何思慎。2002 年。〈「中國威脅論」與新世紀「中」日關係初探〉。《中國事務》，第 7 期，頁 35-52

何思慎。2005 年。〈中日世仇？難解的歷史魔咒〉。《展望與探索》，第 3 卷第 5 期，頁 6-9

冷曉玲、倪峰。2001 年。〈布希上臺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當代亞太》，2001 年第 7 期，頁 3-9

吳心伯。2001 年。〈東北亞的抉擇-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亞洲研究》，第 40 期，頁 8-25

吳志中。2003 年。〈地緣政治理論與兩岸關係〉。《國際關係學報》，第 18 期，頁 101-146

吳東野。2005 年。〈美日安保合作與東北亞安全情勢〉。《戰略安全研析》，第 1 期，頁 26-28

吳玲君。2005 年。〈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5 期，頁 1-27

吳玲君。2006 年。〈東西高峰會議與亞太多邊區域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 21 期，頁 141-148

吳寄南。2003 年。〈亞洲的「FTA 熱」和中日兩國〉。《淡江國際論壇》，第 1 期，頁 1-4

吳瑟致。2005 年。〈中國與東協建立經貿合作之策略研究〉。《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8 期，頁 82-101

吳頌彬。2005 年。〈中共對印度積極開展睦鄰外交〉。《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頁 73-92

吳福成。2002 年。〈亞洲的新震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5 卷第 7 期，頁 47-53

吳福成。2005 年。〈研析印度參與東亞合作之戰略〉。《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 28 卷第 12 期，頁 55-60

- 吳德美、曾聖文。2005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協經濟發展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頁57-91
- 宋學文。2004年。〈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2期，頁171-196
- 宋興洲。2005年。〈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第24期，頁1-48
- 李天軼。2003年。〈東亞區域經濟整合與日本的角色〉。《銘傳日本語教育》，第6期，頁153-175
- 李文志。2004年。〈全球化對亞太安全理念的衝擊與重建：理論的初探〉。《政治科學論叢》，第22期，頁31-65
- 李本京。2001年。〈「911事件」後華府北京關係新架構〉。《中華戰略學刊》，第90期，頁31-34
- 李向前。2000年。〈一個對現實主義理念和真正利益關係的考驗－關於80年代後半期中國的改革與中美關係〉。《黨的文獻》，第78期，頁68-74
- 李昌新。2005年。〈略論中日關係中的能源因素〉。《東南亞研究》，2005年第5期，頁11-15
- 李國雄。2002年。〈東協擴張性的區域主義中的中國角色〉。《國際關係學報》，第17期，頁1-21
- 李國雄。2003年。〈「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經背景分析〉。《立法院院聞》，第31卷第11期，頁70-84
- 李毓峰。2005年。〈從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看美中戰略競爭〉。《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1卷第3期，頁43-59
- 李靜傑。2002年。〈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俄羅斯學報》，第2期，頁97-114
- 沈大偉。2005年。〈新戰略三角：美歐對中國崛起的反應〉。《歐洲研究》，第5期，頁17-32
- 汪能安。2006年。〈「海權」與「陸權」本質上差異之探討〉。《海軍軍官》，第25卷第1期，頁54-63
- 肖長春。2005年。〈鄧小平對中美關係的論述及其現實意義〉。《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2期，頁61-64
- 阮銘。2001年。〈新世紀的台美中三角關係〉。《國策專刊》，第16期，頁9-11
- 佟鐵林。2000年。〈冷戰後美日關係的變化及其影響〉。《東南亞研究》，2000年第3

期，頁 50-53

周世雄。2005 年。〈中俄聯合軍演之戰略安全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 5 期，頁 20-23

周林。2006 年。〈中美經貿摩擦分析〉。《外交評論》，第 88 期，頁 88-92

周茂林。2004 年。〈大象東進-後冷戰時期印度的戰略思維研究〉。《國防雜誌》，第 19 卷第 4 期，頁 17-28

周茂林。2005 年。〈解讀俄羅斯與印度聯合軍事演習〉。《戰略安全研析》，第 7 期，頁 32-35

周學佑。2006 年。〈後冷戰時期美日同盟發展新趨勢〉

彼薩列夫。2005 年。〈從上海合作組織看「中」俄競合關係〉。《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頁 32-36

于有慧。2005 年。〈胡溫體制下的石油外交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8 卷第 3 期，頁 25-50

林正義。2001 年。〈美國新政府對台海兩岸政策觀察〉。《國策專刊》，第 16 期，頁 2-4

林正義。2005 年。〈胡錦濤北美行之戰略意涵〉。《戰略安全研析》，第 6 期，頁 20-22

林若雱。2005 年。〈評析中國於東亞高峰會之角色〉。《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4 期，頁 65-90

林華生。2003 年。〈日本推動東亞經濟整合的前景〉。《東南亞經貿投資研究》，第 22 期，頁 1-13

林碧炤。1991 年。〈論權力平衡〉。《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頁 1-19

林濁水。2001 年。〈後冷戰和全球化架構下的美國台海政策-從柯林頓到小布希「一中」典範動搖的因應〉。《國策專刊》，第 19 期，頁 2-4

邱坤玄。2004 年。〈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 35 卷第 2 期，頁 1-32

金榮勇。2005 年。〈形成中的東亞共同體〉。《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第 3 期，頁 33-56

施子中。2002 年。〈911 事件對中共推動「上海合作組織」之影響〉。《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4 卷第 1 期，頁 128-176

柯玉枝。2000 年。〈當前日本對中共 ODA 政策轉變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12 期，頁 17-35

- 柯玉枝。2001年。〈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第40卷第6期，頁31-52
- 柯玉枝。2005年。〈近期中日衝突之評析〉。《戰略安全研析》，第2期，頁20-24
- 洪鳳儀。2005年。〈中、印經濟崛起模式比較初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8卷第12期，頁44-48
- 胡敏遠。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對中共國家利益的影響〉。《國防雜誌》，第17卷第2期，頁19-36
- 胡敏遠。2003年。〈從地緣戰略觀點研析「九一一事件」後印度的大國外交〉。《國防雜誌》，第18卷第17期，頁91-102
- 胡敏遠。2004年。〈從結構現實主義論印度國家安全策略〉。《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5期，頁31-58
- 胡敏遠。2006年。〈從結構現實主義觀點論析中共在中亞地區的安全觀〉。《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2卷第487期，頁138-152
- 胡聲平。2004年。〈東亞區域整合與中國之立場及策略研究〉。《全球政治評論》，第7期，頁47-66
- 倪峰。2001年。〈複合型結構-對東亞政治、安全格局的一種解釋〉。《國際經濟評論》，2001年第4期，頁38-41
- 倪峰。2001年。〈論東亞地區的政治、安全結構〉。《美國研究》，2001年第3期，頁7-27
- 倪樂雄。2001年。〈中美衝突的本源因素及不確定性〉。《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7期，頁27-34
- 唐仁俊。2006年。〈地緣政治的發展與未來〉。《空軍學術雙月刊》，第591期，頁66-87
- 孫承。2005年。〈美國調整全球軍事佈署與美日同盟〉。《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2期，頁42-46
- 孫國祥。1997年。〈北京與莫斯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形成與探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0卷第8期，頁82-97
- 孫國祥。2005年。〈東亞區域整合之演進與願景：金貿、經融與安全面向的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1期，頁119-173
- 徐桂香。2003年。〈初探俄印中三國軸心聯盟〉。《蒙藏現狀雙月報》，第12卷第6期，頁31-42

- 徐桂香。2003年。〈試論中印關係的發展-以邊界問題與西藏問題為中心〉。《蒙藏現狀雙月報》，第12卷第4期，頁37-57
- 徐萬勝。2006年。〈論美日同盟與中日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4期，頁50-54
- 高飛。2004年。〈中國和平發展的俄羅斯視角〉。《外交學院學報》，第78期，頁51-57
- 張如倫。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與影響〉。《國防雜誌》，第17卷第4期，頁89-98
- 張如倫。2002年。〈「東協十加一」的戰略意涵〉。《國防雜誌》，第17卷第8期，頁38-49
- 張如倫。2006年。〈中俄聯合軍事演練之意涵〉。《陸軍學術雙月刊》，第42卷第485期，頁4-16
- 張亞中。2002年。〈中共的強權之路：地緣政治與全球化的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2期，頁1-42
- 張雨寧。2005年。〈以權力轉移理論為核心探討崛起中的中共〉。《中華戰略學刊》，第93期，頁94-129
- 張啓雄。2003年。〈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歷史月刊》，第190期，頁58-68
- 張登及。2001年。〈從宏觀歷史視野解讀美「中」軍機碰撞事故-一次對「現狀霸權」與「新興大國」相容性的考驗〉。《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5期，頁104-106
- 張雅君。2000年。〈中共與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基礎、阻力與動力〉。《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3期，頁1-26
- 張雅君。2000年。〈印巴核武試爆後中共的南亞安全政策〉。《中國大陸研究》，第43卷第2期，頁15-35
- 張雅君。2001年。〈上海五國安全合作與中共的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4期，頁33-55
- 張雅君。2002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性質、意涵與影響〉。《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2期，頁35-59
- 張雅君。2003年。〈反彈道導彈條約爭議與中俄關係的發展〉。《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頁27-55
- 張雅君。2005年。〈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頁139-184

- 張錫模。2002年。〈俄中關係：管理俄羅斯的霸權衰退〉。《中國事務》，第7期，頁22-34
- 梁玉國。2003年。〈中日敵對與和解的根源〉。《歷史月刊》，第190期，頁72-79
- 畢英賢。2001年。〈「上海合作組織」評議〉。《共黨問題研究》，第27卷第7期，頁1-3
- 許志嘉。2003年。〈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對中共政策的調整〉。《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頁79-102
- 連弘宜。2006年。〈世紀之交的俄羅斯東亞政策-析論俄中兩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運作現況〉。《國際關係學報》，第21期，頁71-111
- 郭武平、劉蕭翔。2005年。〈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3期，頁125-159
- 郭武平。2000年。〈跨世紀的中俄關係與兩岸關係〉。《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第12期，頁3-5
- 郭壽禮。2005年。〈中俄能源合作及大陸新能源戰略〉。《中共研究》，第39卷第3期，頁81-92
- 郭麗立。2005年。〈日本的「自主防衛」與日美同盟發展趨勢〉。《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2期，頁52-55
- 陳文賢。1998年。〈從權力平衡的觀點看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37卷第3期，頁19-34 +74
- 陳仲志。2005年。〈倫斯斐訪問中國大陸之行評析〉。《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12期，頁96-105
- 陳欣之。2006年。〈單極體系的形成、維繫與轉換〉。《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2期，頁111-140
- 陳俊仁。2005年。〈新霸權的崛起或新橋樑的建立？論中國與東南亞國協國家的未來合作與發展〉。《華岡法粹》，第34期，頁181-209
- 陳新明。2005年。〈中俄關係順利發展及其影響〉。《國際問題研究》，2005年第2期，頁6-10
- 陳維斌。2005年。〈誰是戰爭加害者？戰後六十年美日之間的葛藤〉。《當代》，第218期，頁32-51
- 陳錫蕃。2002年。〈近代中日關係中幾項重要文獻〉。《近代中國》，第148期，頁40-47

- 陳鴻瑜。2003年。〈中共與印度、巴基斯坦分別軍演之戰略意涵〉。《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12期，頁10-15
- 陳鴻瑜。2005年。〈東協的區域佈局和策略〉。《國際關係學報》，第20期，頁175-187
- 陳鴻瑜。2006年。〈2005年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第4卷第1期，頁5-11
- 傅高義。2001年。〈中國崛起與二十一世紀中美日關係〉。《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7期，頁16-26
- 傅高義。2003年。〈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單邊主義和變化中的東亞〉。《國際展望》，第481期，頁20-23
- 馮召奎。2006年。〈如何分析中日矛盾〉。《外交評論》，第90期，頁73-79
- 馮召奎。2005年。〈建設東亞共同體的十大關鍵因素〉。《外交評論》，第83期，頁9-18
- 馮紹雷。2003年。〈911前後的中俄經濟合作〉。《俄羅斯學報》，第3期，頁103-111
- 黃奎博。2000年。〈冷戰後中共與東南亞國協之政治合作〉。《國際關係學報》，第15期，頁173-214
- 黃奎博。2005年。〈「東協加三」與區域合作：東北亞與東南亞的連結〉。《國際關係學報》，第20期，頁93-123
- 黃虹堯。2002年。〈中共亞太多邊外交的探討-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例」〉。《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2期，頁34-45
- 黃朝翰。2006年。〈東盟-中國關係：一種經濟視角〉。《外交評論》，第89期，頁47-57
- 楊永明。2002年。〈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至1990〉。《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5期，頁13-40
- 楊志恆。2001年。〈中共及日本在東北亞的角色〉。《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卷第4期，頁29-55
- 楊志恆。2001年。〈美日新政權同盟合作的轉變〉。《國策專刊》，第19期，頁8-10
- 楊志恆。2002年。〈中國反制「美日安保」戰略之對日策略分析〉。《中國事務》，第8期，頁25-35
- 楊凌。2004年。〈中國對東協經貿概況及未來展望〉。《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7卷第9期，頁64-69
- 楊鈞池。2005年。〈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以美日保安條約為例〉。《復興崗學報》，第84期，頁165-189

- 趙文衡。2002年。〈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第41卷第6期，頁81-107
- 趙立枝。2003年。〈俄羅斯遠東地區油氣資源開發與中俄區域合作〉。《俄羅斯學報》，第3期，頁125-147
- 趙建民、何思慎。2004年。〈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論-兼論日、中、台新安全架構〉。《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頁83-104
- 趙哲一。2002年。〈「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與戰略意涵〉。《空軍學術月刊》，第544期，頁14-28
- 趙華勝。2006年。〈對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前景的幾點看法〉。《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3期，頁23-27
- 齊康。2000年。〈從日本戰後經濟的發展看美日關係的演變〉。《貴州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頁58-62
- 劉中民。2005年。〈海權問題與冷戰後的中美關係：矛盾的認知與艱難的選擇〉。《外交評論》，第85期，頁55-60
- 劉江永。2005年。〈日本戰略走向與中日關係前景〉。《外交評論》，第82期，頁84-92
- 劉廷忠。2005年。〈布希主義與中美關係〉。《渝西學院學報》，第4卷第2期，頁18-20
- 劉惜戈。2003年。〈中美關係與東亞地區安全〉。《國際展望》，第479期，頁58-59
- 劉復國。2005年。〈印度與亞洲新戰略態勢分析〉。《戰略安全研析》，第4期，頁40-44
- 劉華秋、王連成。2005年。〈2005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評述〉。《外交學院學報》，第81期，頁26-32
- 歐錫富。2001年。〈印美中與印俄中戰略三角〉。《國策專刊》，第19期，頁14-16
- 潘進章。2003年。〈911事件對美「中」關係影響之研析〉。《空軍學術月刊》，第559期，頁61-78
- 蔡佩蓉。2002年。〈從區域主義的實踐論中共與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28卷第12期，頁46-55
- 蔡明彥。2006年。〈東亞安全秩序建構：霸權穩定、權力平衡與多邊機制的思辯〉。《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頁1-17
- 蔡東杰。2002年。〈NAFTA與亞太整合進程的互動發展〉。《國際關係學報》，第17期，頁23-40
- 蔡東杰。2002年。〈全球化浪潮與東亞區域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1期，頁115-134

- 蔡東杰。2004年。〈東亞雁行結構的調整與變遷〉。《全球政治評論》，第7期，頁1-18
- 蔡東杰。2005年。〈當前東亞霸權結構的變遷發展分析〉。《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頁101-121
- 蔡東杰。2006年。〈複合三角結構與東亞權力平衡發展〉。《全球政治評論》，第13期，頁1-20
- 蔡增家。2002年。〈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4期，頁75-99
- 蔡增家。2005年。〈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2期，頁103-129
- 蔡增家。2005年。〈美日2+2安保諮商的政治意涵及其影響〉。《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3期，頁1-5
- 蔡增家。2006年。〈擺盪在合作與衝突之間：中國崛起下中日衝突的結構分析〉。《國際關係學報》，第21期，頁45-70
- 鄭瑞祥。2006年。〈透析印度崛起問題〉。《國際問題研究》，2006年第1期，頁37-42
- 鄭榮新。2005年。〈中共「新安全觀」對中印關係之影響〉。《陸軍月刊》，第41卷第478期，頁103-119
- 鄭端耀。2005年。〈國際關係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1期，頁115-140
- 鄧峰。2002年。〈美國對日本經濟復興政策的演變〉。《美國研究》，2002年第2期，頁47-63
- 戴萬平、吳靜茹、顧長永。2003年。〈後冷戰時期東南亞區域的霸權互動〉。《國際關係學報》，第18期，頁203-229
- 薛曉芃。2006年。〈中國對東亞地區主義觀念的轉變〉。《外交評論》，第89期，頁28-33
- 謝奕旭。2003年。〈論國際關係理論中的權力平衡理論〉。《復興崗學報》，第78期，頁107-135
- 韓更新、李保東。2005年。〈結構現實主義視角下後冷戰時期的中美關係〉。《瀋陽工程學院學報》，第1卷第4期，頁22-24
- 羅志平。2006年。〈歷史修正主義與新民族主義：日本修改教科書爭議的政治效應〉。《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1期，頁81-106

羅運璇。2005年。〈中美日關係的利益結構與中國的對外政策〉。《貴州民族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頁54-58

顧立民。2003年。〈新世紀中共地緣戰略思想〉。《問題與研究》，第42卷第3期，頁57-78

#### 英文期刊

Biwu Zha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Power, 1991-2004," *Asian Survey*, 45:5(2005), p.667

Ernest J. Wilson III and Adam Segal, "Trends in China's Transition toward a Knowledge Economy," *Asian Survey*, 45:6(2005), p.886

Jonathan D. Polla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3," *Asian Survey*, 44:1(2004), p.1

Jonathan D. Polla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4," *Asia Survey*, 45:1(2005), p.1

Joshua P. Rowan,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ASE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sian Survey*, 45:3(2005), p.414

June Teufel Dreyer, "Sino-Japanese Rival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Asian Survey*, 46:4(2006), p.538

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85:2(2006), p.129

Lowell Dittmer, "Asia in 2005," *Asia Survey*, 46:1(2006), p.1

Morton Abramowitz and Stephen Bosworth, "Adjusting to the New Asia," *Foreign Affairs*, 82:4(2003), p.119

Robert Sut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in 2005," *Asia Survey*, 46:1(2006), p.10